



开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时代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本刊评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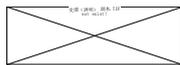
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是我们党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纲领性文件。

第一,明确了全党全国人民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报告开宗明义,鲜明地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报告指出的主题、旗帜、道路和目标,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阐明了全党工作的大局,指明了党的根本任务,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向世人表明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二,推进了理论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报告以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新思想、新概括和新论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一是对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报告对29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作了全面回顾和科学总结,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提炼出值得全党珍视的以“十个结合”为标志的宝贵经验,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二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报告用一个大篇幅,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了全面深刻阐述,在分析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的八个方面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以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表述,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精辟、凝练的概括,并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报告回顾总结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十六大以来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果,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崭新命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集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新的境界,党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第三,提出了治国理政和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和方略。报告根据邓小平同志“三步走”战略和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以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视野,完善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五个方面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描绘出更加美好和清晰的宏伟蓝图,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其他工作作出战略部署,确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报告第一次提出要将我们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党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召开,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史海钩沉

29 连云港市举办的第一次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

夏兴仁

31 毛主席水晶棺与东海水晶

王云 魏爱华

往事追忆

33 难得的一次外事采访

——陪同许耀林书记接待日本避风渔轮纪事 张学贤

34 在抗战中参军的父亲：“想到牺牲的战友，我就难过”

殷然

地方文化研究

36 呼唤少昊

——鸟王国的追念

李洪甫

39 板浦盐业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姚祥麟

人物剪影

42 淮海戏的名丑名旦——杨云发和朱桂洲

王士娥

史志小知识

45 港城历史名人(十一)

本刊编辑部

史志信息

46 李东主任在灌南调研

王正中 李锦华

46 市委党史工办获“知港城、爱港城、建港城”知识
竞赛一等奖

连史宣

46 《东海年鉴(2007)》出版发行

王文岩

46 张士杰书法作品入选市级机关首届文化节摄影书画展

连史宣

史海探秘

47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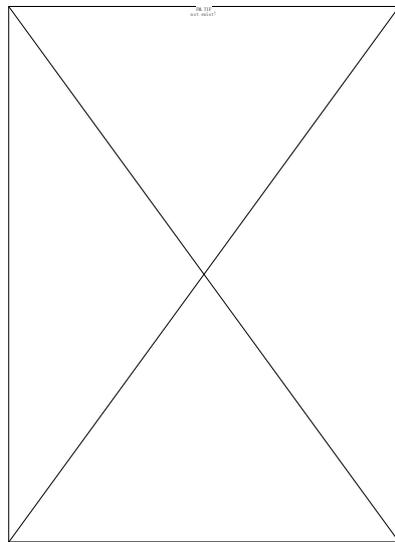
四封说明

封面：十七大代表市委书记王建华、赣榆县公安局局长王兴亚(摄影：樊晓姝)

封二：市委书记王建华在京接受多家媒体采访

封三：全市续修志工作推进会

封底：作品欣赏杨谷昌《雪豹》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关注热点服务决策

地址：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69号

邮编：222006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话：(0518)85825137 85804728

传真：(0518)85802365

印刷：连云港市市级机关印刷厂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出版日期：2007年10月



2007·5 3



树立四种意识 全力推进新一轮修志工作

——在全市续修志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强

为了总结我市前段时间市志修编工作,迎接省政府市志修编调研检查,进一步加快我市市志修编工作步伐,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我市市志编修任务,今天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全市续修志工作推进会议。下面,我就做好全市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要树立机遇意识。对于地方志事业而言,去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地方志工作条例》,结束了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进入了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的新阶段。对于在座各位而言,参加本轮修志是一次终身难得的机遇。当前,连云港市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年伊始,温家宝总理专程来连云港慰问视察,要求连云港市要做好规划,加快发展,把连云港的发展摆上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今年三月份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连云港发展问题,提出举全省之力发展连云港,建设连云港,使连云港市真正成为振兴苏北的龙头。当前,连云港市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朝着“全面奔小康、重振连云港”的既定目标迈进,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呈现了又好又快的好局面:1-8月份,全市财政总收入98.7亿元,同比增长81.9%,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0.6亿元,同比增长35.7%,其中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306.0亿元,同比增长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0.6亿元,同比增长16.4%;金融机构存款余额613.9亿元,同比增长95.2亿元;进出口总额20.4亿美元,同比增长17.9%;连云港港口吞吐量5677万吨,同比增长18.1%,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14.1万标箱,同比增长4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6.8亿元,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28.7亿元,同比增长44.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17元,同比增长16.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一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必须高质量、高效率地把工作做好。同时,《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综合志书每20年左右修一次,我们为能参与市志修编工作感到荣幸。对本轮修志而言,我们还肩负着站在历史的高度,全面总结连云港改革开放20多年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重任。为此,我们要珍惜这一次难得的机遇,全面落实

《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地方志工作的各项职责和工作保障措施,争取更好的工作定位,努力创新工作思路,使地方志工作在“十一五”期间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二要树立责任意识。编修地方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地方志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记载了前辈创造的文明成果。古人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名言,把编写史志摆上很高的位置。建国近60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时期,需要修好史志,传之后人,为民族文化续脉。就连云港而言,这一轮编修的市志,时限跨度上始1984年,下迄2005年,恰好是我市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全市上下谋求跨越发展的时期。20多年来,连云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辉煌也有教训,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客观地去编写,做到用辉煌成就激励人,用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历史教训警示人,为建设连云港的光辉实践树立丰碑,为全面奔小康、重振连云港提供历史借鉴。因此,我们一定要抱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强化编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这一轮修志工作。

三要树立质量意识。志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质量是志书的生命。首先要坚持高标准。要实现志书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内涵深刻、文风朴实、特色鲜明、图文并茂、印制精美并有创新。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效果,使新编志书充分体现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完整统一,真正成为连云港改革开放的真实见证,成为助推连云港崛起腾飞的经世之作。其次要向过程要质量。要把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始终和各个环节,量化工作标准,制定、完善、细化业务工作规范;要落实各级各部门的责任,通过明确职责,层层把关,压力传递,强化监控,保证质量;要组合使用目标管理、责任分解、指导协调、议稿评稿等各种措施,增强措施的操作性和有效性;要做好工作流程的优化、流程接口的衔接、流程的更新再造等工作。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以培养人才、锻炼队伍、提升素质为基本手段和根本措施,加强保障志书质量的根基工程建设。市地方志办要组织好修志人员业务系统培训学习,着力解决修志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要启动专(下转第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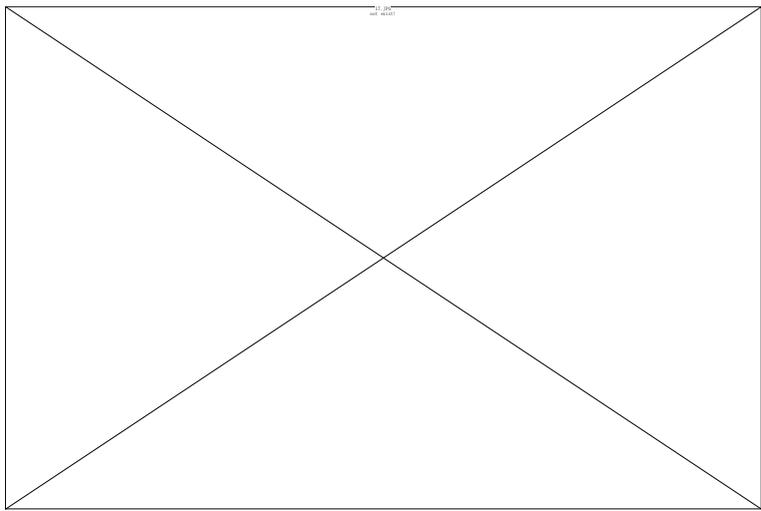


咬定目标 全力以赴

确保高质量完成新一轮修志任务

——在全市续修志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李 东



经市政府同意，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市地方志工作推进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前一段时期修志工作开展情况，查找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研究部署今后一段时期工作任务，推动全市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业绩。下面，我受市地方志编委会委托，向大家简要汇报一下我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

关于前一阶段工作回顾

2005年11月18日，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标志着全市新一轮修志工作全面启动。在近两年时间里，经过全市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全市地方志工作取得了预期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地方志工作运行机制。在去年5月份，国务院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为地方志工作依法推进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轮修志全面启动之初，市政府常务会专题讨论研究新一轮修志工作，对保障地方志工作运行的“一纳入五到位”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全市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之后，我们对全市500余人次修志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通过召开研讨会、上门交流等形式，普及地方志知识。各县区全面启动新一轮修志工作。各县区和部分市直单位采取举办培训班、召开篇目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对修志人员的岗位培训。市经贸委、市建设局分别组建有50多人参加的分志编修工作班子；市广电局组织退休、二线和在在职

人员7人专门负责续修志工作。目前，全市修志专职、兼职、聘用人员达到100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达到75%以上，有各类职称人数占到一半。全市地方志系统有1名同志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授予“特别嘉奖全国地方志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有2名同志受到省人事厅和省地方志办联合表彰，有1名同志获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近两年来，建立起覆盖全市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和队伍，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编委会组织实施和专家修志、各方配合、众手成书的修志体制和运作机制。

(二)确立了新一轮志书编修目标。在新一轮修志工作启动之初，市政府办印发《关于做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等4份文件，明确提出本轮修志的总体目标和完成时间：从2005年到2010年，续修并完成一部市志，以及4县3区和





开发区的 8 部县区志书。市志记述的断限确定为 1984~2005 年;县区志记述上限未作统一要求,下限统一为 2005 年。

(三)新一轮修志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新一轮修志工作开始之初,我们在总结本地和借鉴外地修志经验的基础上,精心编制《<连云港市志>(1984~2005)资料征集篇目》,之后又陆续制定编发《<连云港市志>(1984~2005)编写要求》等一整套业务指导规范。到目前,在市志 164 个承编单位(另有 7 个被牵头单位)中,市发改委、市卫生局、市工商局、市检察院等 22 个单位已向市地方志办提交分志初稿第一稿,有 38 个单位提交资料长编,26 个单位提交大事记,10 个单位提交人物、勘误、图照等。另据我们了解,近 80%单位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大事记和资料长编,进入了初稿撰写阶段。2006 年以来,市地方志办内部刊物《连云港史谭》发表有关地方志编修方面文章、信息等 100 余篇(条),编发《修志编鉴工作简报》和《连云港史志信息》16 期十余万字。今年 5 月份,市地方志办与连云港电视台联合拍摄《用心修志,用情著书》电视片在“直播连云港”中播放。近两年来,我们还与老同志合作撰写《连云港方志志》,审校《连云港广播电视志》(部分稿)、《东辛农场志》、《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志》等行业志、部门志、企业志,编写《风雨八十年》、《修志编鉴手册》、《地方志编写指南》等一批地情资料书和修志工具书。

(四)修志用志渠道进一步拓宽。今年初,我们开始筹建“连云港史志网”站,着力推进地方志的数字化、网络化、大众化。目前,我们与北京方正集团合作,从现有 1 亿多字的市县区志书、历年综合年鉴、党史等地情资料中,初步筛选出近 3000 万字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地情资料数据库。“连云港史志网”信息将涵盖连云港自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成后将是全市唯一以地情历史资料为主的官方网站,为社会各界提供检索连云港地情历史资料平台。

从 1999 年开始,市地方志办坚持每年编纂一卷《连云港年鉴》,收集和保存上一年度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信息资料。《连云港年鉴》自编纂以来,从内容到形式,从框架结构到品牌塑造,不断完善,年年创新,多次获得全国和全省年鉴评比大奖,不仅为修志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还为连云港争得了荣誉。

为进一步加强地方文献的收藏、管理、研究和利用,更好地发挥修志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作用,市地方志办已向市政府提请建设连云港市方志馆。

回顾近两年来全市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我们感到这首先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各县区、各部门要把地方志工作摆上日程、多予支持。各级政府 and 各部门领导也都把续志工作纳入工作规划和议事日程,并在机构、人员、经费和办公条件等方面给予保障。其次是不不断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的结果。回顾和总结 20 多年来地方志工作的历程,我们深切感受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关键;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志办组织”的工作体制,落实好“一纳入五到

位”,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前提;建立健全依法修志、规范行政、高效灵活的长效工作机制,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基础;大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保证;勇于探索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开创新局面,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动力;抓住“发展是第一要务”,努力完善志鉴一体,实现服务当代、促进发展、惠及未来,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方向。这些经验对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是全市地方志工作者不懈努力、艰苦探索、共同推动的结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主要有:个别县区和部门对地方志工作不够重视,“一纳入五到位”的要求尚未完全落实;部分县区和市志承编单位对续志工作抓得不紧、不实,编纂进度缓慢;已提交的稿件总体质量不高,距成书要求差距较大;全市修志队伍新手较多,整体素质不高,专家参与修志机制尚未建立;个别县区和市志承编单位机构、人员、经费等问题解决得还不够好,存在老年人修志、临时工修志现象。另外,在地方志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设上我们还面临不少困难,存在很大差距。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市地方志工作的发展,必须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克服和解决。

关于下一步修志工作的基本要求

今后一段时期,是全面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精神、完成新一轮修志任务的攻坚阶段,也是全面完成“十一五”计划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从全市发展大局出发,规划好、落实好今后一段时期工作,推动全市地方志工作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更好地服务于全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下一步工作和“十一五”期间全市地方志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围绕全市“跨越发展、崛起腾飞”工作大局,突出“修志、用志”两大主业,创建“地情资料、地方文献、咨询服务”三个中心,搞好“为经济发展、为全局工作、为领导决策、为社会大众”四项服务,开创“志、鉴、库、馆、服务开发”五业并举、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信息服务和智力支持。目标要求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精神,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律的地方志工作体制,健全依法治志、规范行政、科学管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建设一支政治强、思想好、素质高、业务精、作风硬的地方志工作队伍。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按时高质地完成新一轮修志目标任务。

基于上述总体思路、目标要求和工作重点,下一步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强学习,全面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精神。《条例》言简意赅,内容既丰富又深刻,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条例》精神,仍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地方志工作的重要任务。作为地方志工作者,要善于抓住机遇,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努力解决定位上、条件上、环境上的困难和问题,全面落





实《条例》赋予地方志工作的各项职责和保障措施,争取更好的工作定位,努力创新工作思路,使地方志工作在“十一五”期间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二)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新一轮修志目标任务。首先要加快速度。按照《连云港市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方案》时间要求,市志承编单位到今年底要完成分志初稿,2010年基本完成市志出版任务。具体要求是:已经完成资料长编的年底争取完成分志初稿,没有完成资料长篇的年底必须完成,明年6月前必须完成分志初稿。对照进度要求,目前还有不少市志承编单位工作滞后,甚至有极个别单位还没有将修志这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今年还剩下不到100天时间,年内我们既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完成,这不仅是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也是完成新一轮修志总体目标任务的要求。修志进度落后的单位必须要调整工作思路,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确保迎头赶上。从下个月起,我们将建立续志进度督查通报制度,按月通报全市续志工作进度情况。其次要提高质量。从前一段时间我们收到的分志初稿质量看,绝大部分“初稿”是介于资料长编和初稿之间,还达不到编纂的要求。这其中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是体例不符、资料不全、史实不清、综合提炼不够、资料取舍的着眼点不高,以致没有反映出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性,没有更好地彰显出连云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因此,作为一名修志工作者,必须要脚踏实地加强地情调研,广辟资料来源,总结正反经验,寻求内在规律,力争修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佳志良书。今后,我们将按照今天会上发给大家的《关于〈连云港市志〉(1984~2005)分志稿的审稿意见》,审查接收各单位提交的初稿,对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将退回各单位重新补充完善。第三要加强协作指导。为便于联络指导,我们将市地方志办参与市志编修的责任编辑与各个承编单位进行直接挂钩,今后对各承编单位的业务指导、稿件催收、信息反馈以及稿件编辑等工作均由责任编辑具体负责。我们还将所有承编单位分成15个协作组,今后修志业务交流和探讨活动将主要以协作组的形式进行。希望各个协作组牵头单位能够真正牵起头来,与责任编辑一起搞好业务交流活动。第四要加快县区续志推进步伐。按照《连云港市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

方案》要求,2009年县区要完成新一轮修志工作。目前大部分县区续志工作进展缓慢,远没有达到序时进度要求。希望各县区政府要进一步落实关键举措,尽快到位修志经费。县区志办要按照倒排工期的办法,对修志进度进行合理安排,要想方设法抽调、聘用一批修志人员,明确编辑人员职责,量化编辑任务。要加大稿件催收力度,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快编纂进度,确保在2009年底之前全面完成县区志编修目标任务。

(三)以人为本,加强修志队伍建设。修志人员的整体素质,决定地方志工作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修志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是全市地方志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将通过业务培训、学习交流、理论研讨、实战磨炼等途径,不断提高地方志系统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搞好机构、队伍建设,并力争在打破人才瓶颈,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成长上有新突破。各级各部门要从政治上、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特别是对返聘回来的老同志,要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把地方志工作做好。各部门、各单位之间要加强协调协作,动员、吸收多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地方志工作,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完成全市续志任务。

(四)开拓创新,积极开发利用志鉴成果和地情资源。修志为用,这是我们修志编鉴的真正目的。地方志是一大资源,是一种可以广为传播的信息媒介,其功能首先是服务当代,受益者应是全社会。我们将充分利用方志阅览服务、咨询服务、专题编研服务等多种形式,不断拓宽用志新领域,初步实现向领导决策领域延伸、向社会文化领域延伸、向大众教育领域延伸。只有这样,才能把地方志工作变成一个永续的事业,使之生生不息。当前,除了加快“连云港史志网”建设,确保年底前正式开通外,我们还将适时启动“连云港地情丛书”系统工程,从多方面开展读志用志和地情资源服务社会活动。

同志们,盛世修志,存录历史,惠泽千秋。希望全市广大修志工作者要统一思想,合力攻坚,扎实工作,高质量完成新一轮修志任务,为彰显连云港风采立言示绩,为连云港崛起腾飞助力添彩!

(上接第4页)家修志、外脑参与等机制,全力构筑人才优势。通过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开展高质量的工作,确保编修出高质量的志书。

四要树立效率意识。到2009年,要完成县区志续修出版任务;到2010年,要完成市志续修出版任务。对照这个进度要求,可以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领导特别是主管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必须要增强效率意识,认真高效地履行好职责,按照“一纳入五到位”(即将修志编鉴工作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工作条件到位)的要求,真正落实地方志工作的保障措施,为地方志工作创造一个可持续的、高效运行的工作环境。市地方志

办要加强面上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分类指导,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修志工作;要建立健全地方志工作通报制度,加强沟通联系,及时协调解决续志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广大修志人员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效率意识,以好中求快为标准,找准工作切入点,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市新一轮修志任务。

同志们,编修志书是为世修志,为人写史,为业存史,无上光荣。希望全市广大修志工作者珍惜历史,把握现在,着眼未来,提升工作水平,改善工作状态,把地方志这项清苦、艰苦、辛苦但又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的工作做得更有特色、更有生气、更有成效,为全市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题为编者后加)





南城与凤凰山

※张传藻

云台山古称郁洲岛,岛上早设东海县。它东西两侧的山头称为东海山。南城,位于云台山西端,和海州隔海相望。

一、凤凰山

相传汉代有“凤集东海”之记载,即凤凰曾落在东海山的东山上。凤凰是鸟中之王,是吉祥之物,古谚语有“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所以,南城是块福地、是块风水宝地。后来,东海山便改名为“凤凰山”。当时,汉昭帝在落凤凰之处建立“祭风寺”,可见他对凤凰的崇敬和膜拜到何等程度。“凤集东海”之事在当时全国震动很大,招徕各地显贵、豪绅、众多文人、墨客来此祭拜、赏景,为后来凤凰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凤凰山的山势走向是由西北偏东南方向,海拔 115 米,占地 200 余亩,有四个主要山峰组成,即:凤头、凤颈、凤脊和凤尾,整个一座小山犹如一只凤凰形成的山体,头南尾北。北部有一片平地,是“祭风寺”的遗址所在。凤凰山上存有各个朝代名家文人留下的大量石刻碑文,其大多集中在西山和在玉皇宫路边两侧的山岩上,其山上名胜古迹、石刻数量之多,在苏北较为少见,除此之外,周围的庙宇众多,人文景观独特,自然风景优美,这为以后旅游观光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凤凰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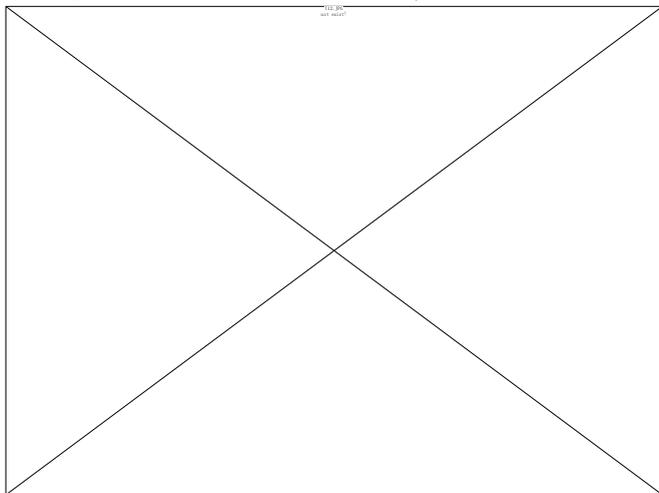
城池的建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战乱不断,外来入侵也存在着威胁,边陲防御显得十分重要。海州以东是大海,云台山是海中大岛,凤凰山离海州最近,它是海州前哨防卫的重镇,只有建起城来才能便于屯兵,便于防守,便于多方面的管理。其二,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增多,人员往来频繁,这儿又是近海船只的必经之路,所以城池建在云台山最西端的凤凰山是理所应当

然之事。在南北朝宋元徽二年(474 年),时任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民带领军民,就地取材,用当地石块垒筑城墙,建起城廓,城内圈入九个山头 and 两个湖及大部分土著居民,此城称“石头城”后定名为“凤凰城”,在当时边陲防卫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中起到很大作用。到了清嘉庆年间,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为了加强防御,阻止海上倭寇的侵袭、打击海盗的骚扰,和当时称之为北城的墟沟相呼应。海州知州谢元淮,从军事地理上需要,把凤凰城改名为“南城”,从此,南城便成一个重要的军事阵地。

三、凤凰城发展的主要阶段

凤凰城经过几次大的变化过程,才发展起来,至今成为苏北经济文化重镇。凤凰城在建城之前,这里的土著居民大多依靠渔、林、牧、盐为生,自打建城后,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外来环境的影响,逐步有所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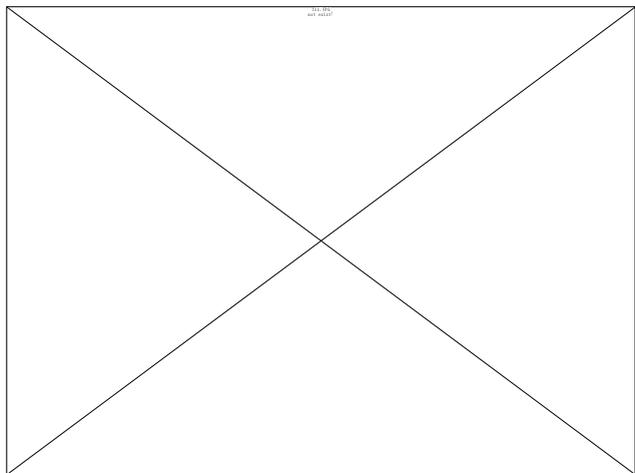
凤凰城第一次发展及变化,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



南城城隍庙

LIANYUNGANGSHITAN





普照寺

事频起,中原人纷纷南迁,当时,青、冀二州一些豪绅、商贾、大户人家为了躲避战乱,选择了凤凰城这块风水宝地,他们拖家带着,连同财产及家丁,众多人口迁到凤凰城,当时被称着“侨置青冀二州”,他们并在此设立政权,对地方进行管制。当时,凤凰城初建,环境优雅、气候适宜,太平盛世,无有战乱之扰。随着人员来往增多,这里就成为南北朝人员和物资安全的交流集散地,使得凤凰城经济得到了促进与发展,出现了交易和买卖,出现了诸多行业,出现了商业贸易。

第二次较大的发展是在明朝初期,朱元璋夺取政权建立明朝后,便排斥异己。当时同是义军领袖的陈友谅不听朱元璋的话,二人和,分歧很大。陈友谅占据苏州和朱元璋分庭抗礼,后来朱元璋打下苏州,将陈友谅及其亲信、部下全部俘获,杀的杀、关的关,其余人等凡是陈友谅的下属及有牵连的人,一律全家流放到苏北,结果,数以万计被流放人员,带着家小和部分财产细软迁到海属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在凤凰城安家落户,在岛上下苦力,打鱼、晒盐、伐木等。据有关记载,这次事件叫“洪武赶散”。后来,这些人开始做生意、开店铺,有的开起小作坊。由于南城人口增加,带来了资金、技术,也促进了南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三次较大的发展是在清代中叶,康熙 51 年(1712 年)。由于海水东退,南城与海州之间的小海变为平地,云台山与大陆连成一片,出现沧海变桑田的景象。南城和海州、板浦等城镇联系更方便,经济、文化、信息的交流更便捷,使南城经济发生了很大的飞跃,尤其当时板浦作为盐业中心的地位,对南城的影响更大,促进了南城的盐业、运输业、商业贸易等行业的发展。南城的经济繁荣,还表现在当时城内出现繁华的街市、道路、商行、店铺和规范的民居,使南城的经济发展跨出了一大步。

四、城内建筑——街道和民居

凤凰城于南宋时完善东、北、南三门,使城廓基本定型。后

来,东门(蓬瀛拱卫)、北门(秀邑云台)和城内庙宇大多数被毁,唯有南门(凤凰门)保存较好。现在城门上还保有“古凤凰城”四个大字。城墙是以碎石砌成(包括原有的全部城墙及民居墙体),这种建筑结构称“垒石为墙”。它于石头产状有关,由于当地海岛地质形成的岩石结构为片麻岩,它和花岗岩有着很大的差别。片麻岩是片状石块,大小不一,砌墙时,用大石垒墙,片石填补,用当地山上的黄白色黏土镶嵌。在石与石之间缝隙中,用适当厚薄的石片塞紧。严严实实,非常牢固。哪怕是铜钱大的石片都能用上。这样砌好的墙面,碎石整齐,结构裸露,不用扣缝,不用泥墙,而千百年不会倒塌、既不透风,又不漏雨雪,墙体较厚,冬暖夏凉。这种墙体构造有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它是五千多年前东夷文化的体现和延续。

从南门进入城里,是保存完整清代一条古街道,街长 3 华里 99 步,街宽 9 尺 9 寸,路面以条石铺成,路中心以一尺来宽的竖条石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龙的脊梁),共用 1339 块条石。龙脊两边稍有低坡,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使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龙骨中间的条石上记载着独轮车木制车轮压出的深沟,叫“车辙”,印证着二百多年来,街道上人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街市的繁荣,还表现在商业的兴盛,街两旁店铺林立,一家挨着一家,独特风格的古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典雅秀气的清代民居,青砖小瓦,乱石砌墙,斗拱出檐,门庭雅致……

古建筑民居一般都有两三道穿堂,三五进庭院,形成前店后坊,货仓库房。过道、迎壁、穿堂、天井、客厅、正厅、厢房、中宅、后园等等,全是按照传统格局建造。主屋即堂屋、住宅均为四梁八柱,横桁竖椽,青砖走檐,小瓦屋面,方砖铺地,板壁间山,门侧墙壁及檐口有砖雕吉祥图案,还有保存完好的风火墙、天香阁等,古色古香。

南城有江、杨、武三大姓。各家都有自家大院,建筑风格各有特色。登州侯府号称九十九间半两宅互通院,更是古建民宅之最。这种传统民居结构随着战乱和历次运动的冲击,现在能保存下来的越来越少了。

南城民居的最大特色是:建筑风格独特、地方气息浓厚,文化品位鲜明。它和南方江淮民居、北方齐鲁民居所表现的建筑文化风格有着明显不同。它是东夷文化在海属地区集中表现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五、庙宇和庙会

自汉始元三年(公元前 84 年)，“凤集东海”传说之后,汉昭帝在西山建立“祭风寺”开始,人们一直把凤凰山视为灵应宝地。隋文帝五年(公元 585 年)在凤凰山顶建造“玉皇宫”,为中国道教在东部发展奠定了基础。道教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组成部分。后来,南城便成了中国东部海属地区道教的中心。在凤凰城内外,历史上共建有二十四座庙宇,其中就有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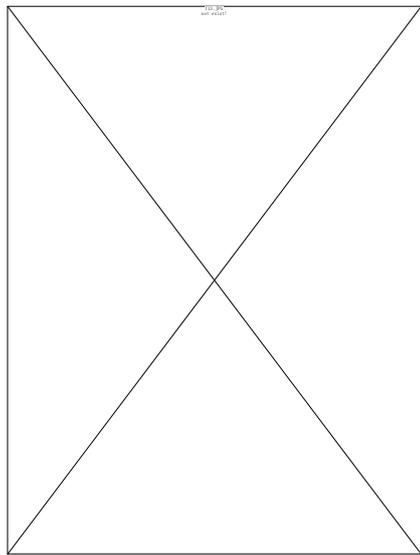
座是道教系统的庙观。有玉皇宫、东狱庙、南岳庙、三官庙、城隍庙、地藏庵、晏公庙、清源宫、碧霞宫、魁星阁、龙王庙、海神庙、真武庙、关帝庙、土地庙、石佛庵、大佛庙、武安宫、三元宫、普照寺、观音殿等。只有普照寺和观音殿是佛教庙宇。城隍庙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占地三千多平方米,有前、中、后三座大殿,共有房屋34间。城隍庙建在普照寺的前院,形成道佛合署,而且形成了庙压寺、道压佛的现象。

正因为凤凰山的灵应,自古以来,这里的神气最足,庙里的香火最旺。每逢香火盛会,附近方圆几十里来此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生日,玉皇宫香火会旺盛,正月十五是天官生日,又是三官聚会日,三官庙有香火会,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的香火会,三月十六是山神庙的香火会,三月十八是东狱庙(又叫天齐庙)的香火会,清明节是城隍庙的香火会,四月初八是碧霞宫的香火会,五月十三是关帝庙的香火会等等。香火会期间,卖香烛供品的,卖点心小吃的相应而生。这段时间,正值农闲和农村麦收之前,所以香火会期间又出现了农具及日用品交流形式,叫做“庙会”。南城的庙会定在每年的清明节。每逢庙会,四乡八镇包括外地客商聚集而至,除交流农具外,还有日用百货、手工艺品、吃穿用品样样俱全,说书唱戏,打拳卖艺五花八门都有。庙会逐年扩大,逛庙会的人越来越多,逢会期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给地方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并逐步形成一种民间风俗和庙会文化,这也是凤凰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一种方式。

六、凤凰山石刻

凤凰山中西部西山脚下,有一条石级小路,俗称“神道”,一直通向“山门”。山门是用三块很长的条石投榫而成的牌坊,有一丈多高,八九尺宽。在横石上又加盖人字型条石,凿成瓦棱形状,表示殿宇的屋顶。在东边的石柱上有“紫气东来”四个字,其余石刻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不清。走过山门,向北到“玉皇宫”,路东有一片大石坡,当地人称“集凤坡”,坡上有巨大石刻“凤集灵山”四个大字,落款为“纪辰阳书,元始三年桂月十五日”桂月即八月,此刻为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所题。有学者认为,此处石刻是后人仿作,待考。在集凤坡西侧有两处石刻,其一,“石上清风,山间明月”。其二是“众仙聚会,蓬莱仙石”。附近还有一些斑驳不清之石刻。在向北拐弯处,一片溪水,上方有一块巨石,是一块形如八卦的石壁,上面刻着“万缘桥”,上款为“邱真人建”下款为“王善人”。邱真人即元代道家邱处机,可能他在玉皇宫内修炼过,留刻于此,是否真实有待考证。玉皇宫门前不远处有个天池,宋绍熙年石刻逸岑书“天池”二字。天池西侧的大石壁上刻有唐天宝二年五月张咏题刻的“惟天为大”四字。石壁的顶部刻有“苍梧山”三个大字。云台山古称东海郁州,到唐代被称为苍梧山,可能是因为这儿是苍梧山的头部,故山名题刻在此。

玉皇宫的东南方“石海”,是一片大小不同的石块裸露山表,大大小小的石头,圆滚光滑,形如石龟回头向下,被称为“下山龟”。在石海南边有一块天然巨石,称作“上山牛”,牛腹处有两江总督阮元题刻诗一首:“怪石昂首号石牛,东山独立



由青石板铺成的“六朝一条街”

几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洒全身有汗流。绿草平铺难下口,长鞭任打不回头,至今鼻上无绳索,天地当栏夜不收”。可惜,石牛早年被毁。从玉皇宫向北,有一条古道直通祭风寺遗址,古道左侧有一山泉,据传这是当年道人饮用的水井,泉边有“玉液泉”石刻三字。凤鸣峰(凤脊处)有一石棚,据说,八仙曾来此聚会,棚壁上有石刻“八仙洞”三个字。凤鸣峰一侧有条凤鸣涧,每逢雨季季节,只见洁白的瀑布从山顶直流而下,并伴有清脆响声,人们称这为“响涧”,响涧的水流淌到凤凰湖中,成了凤凰山的一道著名风景线。

从山门往南,有一石刻“谷口”二字,意思关口。往前的坡壁上有一幅古老的壁画石刻,画面虽被风雨侵袭、自然风化、受损严重,但仍能看出些画的内容,画中有一株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上挂有果实,并有水滴等。在岩画往南岩石上的题刻有“蓬瀛仙境”、“气象雄阔、岱岳之亚”。十分壮观。上面还有一片天然形成的景观;一群像似海豹的大小石头,称叫“母子石”。前面到了“魁星阁”,它是十来米高的翘檐塔形楼阁建筑,原来阁的两边有一副对联“任凭三尺青峰动,狼毫七寸定乾坤”,现在早已荡然无存了。魁星阁又叫文峰塔、或文曲星塔,国内其它城市也有,地方建了魁星阁,就意味着这个地方魁星高照,能多出举人、秀才等文人,反映人们追求文化的愿望。

南城山上的石刻历史跨越千年,它是历代文人、名人、书家、道家经常光顾之地,无论是为了烧香求佛还是游山观景而来,总之,都能说明凤凰山的名气之大,环境之雅,是人们向往的风景优美的地方,这对弘扬和继承凤凰山文化、开发和促进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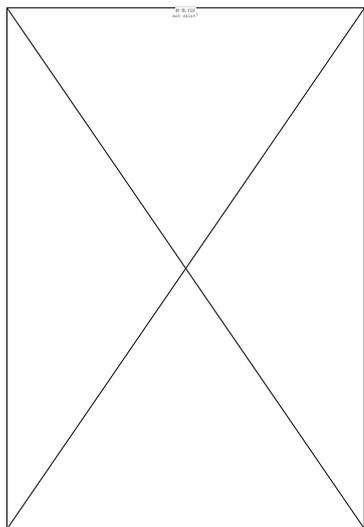
(本文部分参照市民俗博物馆原馆长刘兆元“南城凤凰文化”内容,并得到市博物馆刘洪石、刘洪二位馆长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感谢。作者单位:市国土局,孙建华协助整理)





中共淮北盐特区委书记——杜李

※许燕鎏



中共淮北盐特委书记兼盐警总队政委杜李

杜李,1916年生于河南省济源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五支队教导大队教导员,淮南游击总队总队长,太康、仪杨、来安县委书记,淮北盐场特区委书记,盐警总队政委,华东盐务局局长,轻工部供销总局副局长,食品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司长,大连医学院党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

解放初期,新浦有两个特区委机关,一个是中共新海连特区委书记(连云港市委的前身)隶属山东鲁中南区党委,一个是中共淮北盐场特区委书记,隶属苏北区党委。这两个特区在地理位置上也是相互交叉的,当时云台山东麓,包括北云台、中云、朝阳、大村一带都属于新海连特区。而猴嘴镇、台北盐场、板跳镇、台南盐场以及徐圩、灌西、灌东、新滩等盐场都属于淮北盐场特区。1946年11月至1949年9月,杜李任中共淮北盐场特区委书记。

受命于危难之时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12日向我苏皖边区大举进攻。我华中主力部队在苏中七战七捷和宿北战役共歼敌七万余人,给予进犯之敌以重创之后,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主动北撤山东。

当时盐场敌情严重,十分危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认为,素有“华中金库”之称的淮北盐场,是政府的重

要财源,绝不能拱手交给敌人,决定驻防盐场的华中部队12纵86团,留下两个连与盐场地方武装和机关精干人员,坚持盐场就地斗争。为适应战时需要,加强战时领导,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决定设立淮北盐场特区(简称盐特区),在党内成立中共淮北盐场特区委员会(简称盐特委),对盐场党、政、军、产、运、销和盐务行政工作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盐特委直属华中分局。

1946年11月中旬,就在敌情严重的危难时刻,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派杜李同志来淮北盐场,组织建盐特区党、政、军机构。同年年底,盐特委在盐场重镇陈家港正式成立,杜李任盐特区委书记兼盐警总队政委。

壮大军事力量 坚持武装斗争

杜李来到盐场时,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用于对付淮北盐场的兵力达5000余人,而我方实际兵力只有300人,悬殊近20倍。大敌当前,杜李同志和盐特区委书记一班人,把军事工作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盐场军事力量,组建三支武装队伍:一是扩建盐警团,在原86团留下两个连的基础上,从滨海总队划一部分人,逐步扩展到700人左右,组成一个团的建制,这是盐场的主力部队。二是武装工作队,这是在盐特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特种武装力量,担负着对敌据点的侦察、搜集情报和通讯联络工作,向敌占区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三是发动群众,广泛组织民兵队伍。

由于主力部队北撤山东,盐场总的斗争形势是敌强我弱,十分艰难。杜李同志在扩建武装队伍的同时,运用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战略战术,与敌周旋,进行了保和庄战斗,大德九圩战斗,堆沟战斗,小南沟战斗等大小战斗数十次,保留了根据地,保存了实力,最后配合主力部队,于1948年11月7日,淮海战役开始时,解放了全淮北盐场。

在历次战斗中,杜李同志总是指挥到前线,撤退在后线。据杜李同志爱人张明同志回忆,有一次敌人向盐场进攻,机关和家属队一起撤退,张明已怀有八个月的身孕,过河时,水深没到脖子,身子都要漂起来,这时杜李带着警卫员和一些战士从张明身边经过,连招呼都不打,就冲向前面去指挥战斗了。1947年5月24日,杜李同志命令机关、群众撤离陈家港,他带领部队阻击敌人,掩护转移。这时敌人枪弹向政委身边呼啸而来,而杜政委泰然自若,毫不畏惧,直到机关群众走远了,杜李同志才和阻击部队从容地撤出来。在战斗中,杜李这种临危





不惧、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具体事例还有很多,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广大干群,鼓舞军民的士气,深受人们的爱戴。

加强党的建设 狠抓思想教育

杜李来盐场组建盐特区委之后,根据战时情况和工作需要,盐特区委的机关设组织、宣传、联络、民运部和公安局,下设陈家港、灌东、堆沟、新滩、船舶5个区委会,区委会下设党支部。在建立健全党组织的基础上,紧接着在盐民、搬运工人和船民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据统计,1946年底,盐特区委组建时仅有党员150多名,至1947年底,仅一年时间党员人数就增加到1000多人。

杜李同志还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他及时地根据上级发来的文件和自备电台提供的新闻,针对干群思想实际,向大家作政治形势报告。杜李同志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他经常组织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党的斗争史,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并亲自作辅导报告。

为了更好地教育党员干部,在他的主持下,盐特委还建立一套严谨的组织生活制度,如每周一次的党小组民主生活会,每月一次的“两会一课”,每年一次的干部年关鉴定。虽然是战争环境,这些制度执行得都很严格。这样,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自我教育,保证在斗争中不断前进。杜李同志在对敌斗争的艰难岁月里,在物资、材料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盐场大众》报和《盐场杂志》,成立了宣工队和工人医院。这对盐场的对敌斗争和生产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爱护干部 大力培训干部

杜李同志很注意爱护和培养干部。1947年,农村搞土改复查,盐特区机关搞“三整”(整党、整干、整军)、“六查”(查历史、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查生活、查学习)的整风运动。有的同志提出,农村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我们盐特区整风运动却冷冷清清。还有的人说,特区干部当中地主出身和地主成分的有一百零几人,有的地方来函要人,为什么不送回去整一整?针对这些偏“左”思想,杜李同志在干部大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一个人的出身是不容选择的,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由于杜李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说服并抵制了形而上学的观点,这股“左”的思潮才没有扩展。通过整风运动,既教育了干部,锻炼了队伍,又保护了许多出身于剥削阶级而又忠心干革命的同志。

杜李同志具有远见卓识的眼光,在解放战争处于十分激烈和艰难的时刻,就预见对敌大反攻和全国解放后,必然需要大批干部,以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大发展的需要。因此,1947年3月,盐特区委正式作出《关于培养干部的决定》。按照决定精神,盐特区委先后举办了七期盐务干校,共培养出2000名左右的干部,满足了淮北盐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向新解放

的外地盐场输送了不少干部。

举办盐务干校,他自任校长,并亲自为学员讲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指导下,结合盐场群众工作的实际经验,为干校学员和机关干部系统地讲了《关于群众工作》,并印发给全盐场干部作为学习材料。后该材料经杜李修改充实,由出版社面向全国公开发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先后共印了3版,重印了13次。此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狠抓生产、运销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盐特区委肩负着坚持军事斗争,抵御敌人进攻和生产、运销原盐的双重任务。以杜李同志为书记的盐特委,号召盐工“一手拿枪、一手拿锹”,白天搞生产,晚上站岗放哨打游击。对干部提出“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与盐工一道不离盐滩,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做好战斗准备、生产和后勤工作。

在狠抓生产的同时,盐特委又成立专门机构抓运销,要求做到边产、边运、边销,保证生产的原盐不受损失。在运销过程中,加强了运销力量的组织和管理,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千方百计冲破敌人的封锁。在政策上,采取公运、商运、民运相结合,实行自由贩运,就场征税,或用现金支付,或用物资交换。

由于盐特区委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从1946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共产盐500万担,销盐600万担(多销的盐是攻克敌占区后抢运出来的坨地存盐),从而保证了军需民食,增加了财政收入。以销出的盐款,从敌占区换回枪弹、布匹、药品等战略物资,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十分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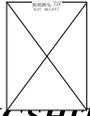
情深义重 永载史册

杜李同志在淮北盐场的三年中,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在十分艰难、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以坚强的党性、高深的理论修养、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军事斗争、党的建设、生产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与盐场广大干部群众一道,渡过难关,迎来胜利,他为盐场人民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离开淮北盐场后,还多次回来指导工作,看望老同志,关心修建烈士陵园,多次来凭吊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他与盐场人民情深义重。1991年,杜李同志在大连病逝,盐场人民深深怀念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盐场工作了八年,曾听过杜李同志的报告,更多的是经常听到许多老同志讲述杜李领导盐场干群革命斗争的事迹。九十年代初我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委工作期间,主编了《革命战争中的淮北盐场》一书,书中收录了杜李同志在盐场工作期间亲自写的文稿19篇(是从他的笔记本上抄录选用的),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档案。复读这些史料文稿,更使人对杜李同志敬佩、怀念。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委)





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党组织建立 80 周年大事要览 (1979—1991)

※ 本刊编辑部

1979年

全市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有关干部政策。

全市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逐步在农村试行。

市委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新时期连云港市的远景规划、近期任务、建设方针和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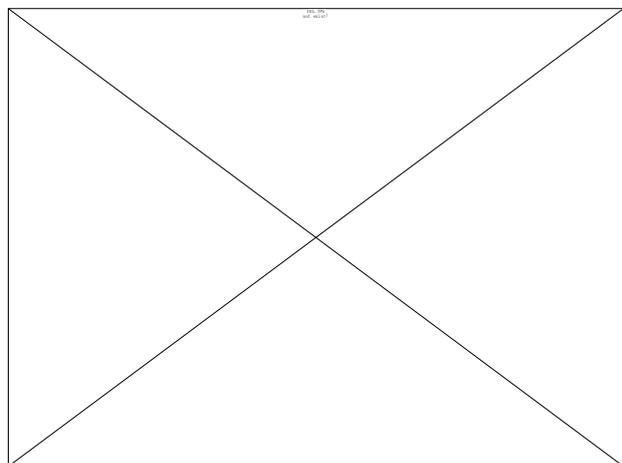
1980年

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学习邓小平关于改革和完善党与国家领导制度的讲话,积极端正党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时继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继续进行拨乱反正,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加强人民政权建设。

全市继续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继续把农业放在首位,促进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

1981年

中共连云港市委召开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



步安定”的重大方针,经济调整主要压缩基本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强调增收节支,严格信贷管理,提高现有企业效益,厂矿推行经济责任制,农村完善生产责任制。

市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以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推进文明、民主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1982年

全市广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狠抓党风、民风建设,狠狠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社会治安、社会风气有了好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全市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走私犯私、贪污受贿等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的“五讲四美”活动,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3年

江苏省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东海、灌云、赣榆三县划归





连云港市管辖。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抵达连云港视察,在听取了市委、市政府关于连云港市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情况的汇报后,对连云港的经济发展和港口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全市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区划调整,并按照新时期干部“四化”要求,调整、配备各县、区、市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抗击冰雹、暴风雨自然灾害,夺取农业的丰收。全市有19项农业科技成果获得江苏农林厅表彰奖励。全市工交企业大搞技术革新改造,179项技术改造项目已完成104项,新增产值9737万元,新增利税2351万元。

1984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连云港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委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进行简政放权、搞活企业、搞活流通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抓紧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农业方面继续落实和完善承包责任制,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使全市经济获得稳定协调发展。我国最长的公路隧道——连云港至宿城公路隧道工程开工。该隧道全长2641米,宽8.2米,高8.6米。建成后对于港口的运输,宿城风景区的开发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一行于10月下旬抵连视察,视察期间,对连云港的经济发展和港口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1985年

全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继续深入进行企业体制、计划体制、企业领导体制等配套改革,以老企业技术改造为重点,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农村在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农产品统购包销制度,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1986年

连云港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的《连云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我国最长的拦海大堤——连云港西大堤(全长6700米)主体工程正式开工。整个工程预计在1991年建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抵连考察,在听取市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特别要求重视教育、科技以及人才的培养。

1987年

在政治思想领域,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增强农业后劲和企业活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

节支运动,加强物价管理,进一步稳定市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的指示,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市级机关进行率先改革,同时要求严格控制非党常设机构的设置,建立健全审批制度。

1988年

坚持以党的“十三大”精神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统揽全局,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推进企业“一包五改”和综合配套改革。农村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深化各项改革,增加投入,推广科学技术,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新格局。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1989年

全市进一步贯彻落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清理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物价上涨趋势得到抑制。全市经济在治理整顿中得到发展。中共连云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连云港市委领导班子。

1990年

市委、市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重点抓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全市进一步深化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确定“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双层经营,控制和减轻农民负担,继续抓好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使农业在大灾之年仍获得了较好收成。

1991年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振奋精神,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富民兴连步伐。各级政府先后制定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措施。工业方面,各企业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搞好企业的20条具体要求,落实扭亏增盈措施,通过深化改革要效益。全市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支持开发区建设和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制定14条政策措施支持开发区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海属地区党的组织序列

※ 本刊编辑部

- 中共赣榆特别支部(1938.6-12)
书记 张树仁(1938.6-12)
隶属鲁东南特委(军队)
中共赣榆党团(1938.12-1939.1)
书记 刘寄萍(1938.12-1939.1)
隶属鲁东南特委。
- 中共赣榆县工委(1939.1-1940.7)
书记 刘寄萍(1939.1-1940.7)
陶君彦(1940.7-11)
隶属鲁东南特委。
- 中共海属工委(1939.1-4)
书记 余耀海(1939.1-4)
隶属中共苏皖特委。
- 中共海属中心县委(1939.3-9)
书记 张克辛(1939.3-9)
隶属中共山东分局。辖：
中共东海县委(1939.3-9)
书记 陈 飞(1939.3-7)
孙海光(1939.7-9)
中共灌云县委(1939.3-9)
书记 余耀海(1939.3-9)
中共宿迁县委(略)
- 中共临赣工委(1940.11-1941.2)
书记 邱也民(1940.11-1941.2)
隶属鲁南区党委四地委。
- 中共赣榆县委(1941.2-1945.8)
书记 邱也民(1941.2-1944.4)
王德贵(1944.4-1945.2)
杨大易(1945.2-8)
隶属鲁南区党委四地委。1942年3月改属中共滨海地委,1943年4月又改属滨海区党委三地委。
- 中共芦山县委(1945.1-9)
书记 雷 明(1945.1-9)
隶属滨海区党委三地委。
- 中共海赣工委(1945.3-8)
书记 杨荣杰(1945.3-8)
- 中共东海县工委(铁路北)(1941.3-8)
书记 段 林(1941.3-8)
- 中共海陵县委(1941.8-1945.9)
书记 段 林(1941.8-1942.6)
郑子久(1942.6-1944.4)
李 克(1944.4-1945.9)
隶属鲁南区四地委。1942年3月,改属滨海地委。1943年4月改属临沭中心县委。1943年10月改属滨海地委。
- 中共苏皖区党委第二地委(1939.9-1940.8)
书记 杨纯(1939.9-1940.8)
辖：
中共第二县委(东海铁路南部分和沭阳西部)(1939.9-1940.8)
书记 孙海光(1939.9-1940.2)
钱天素(1940.2-8)
中共第四(灌云)县委(1939.9-1940.9)
书记 余耀海(1939.9-1940.1)
吴 书(1940.1-8)
中共东海县委(铁路南)(1940.11-1942.12)
书记 宋云龙(1940.11-1942.12)
隶属苏皖边区党委。(1941年5月-1942年12月为中共淮海区党委)
中共灌云县委(1940.9-1941.6)
书记 吴书(1940.9-1941.6)
隶属苏皖边区党委。
中共东灌沭县委(1941.6-1942.6)
书记 夏炳桂(1941.6-10)
张克辛(1941.10-1942.6)
隶属淮海区党委。
中共灌云县委(1942.6-12)
书记 张克辛(1942.6-12)
隶属淮海区党委。
中共灌东工委(1942.6-12)
书记 陈少新(1942.6-12)
中共淮海地委第一中心县委(1942.12-1945.10)
书记 张克辛(1942.12-1945.10)
隶属中共淮海地委。辖：
中共灌云县委(1942.12-1945.10)
书记 吴 书(1943.7-1945.5)
钱天素(代,1945.5-7)
罗岱周(1945.8-9)
中共灌东工委(1942.10-1945.10)
书记 孙少新(1942.12-1943.5)
孙良浩(1943.7-1945.10)
中共沭阳县委(略)
中共第三中心县委(1942.12-1945.10)
书记 章维仁(1942.12-1945.10)
隶属中共淮海地委。辖：
中共东海县委(1942.12-1945.10)
书记 宋云龙(1942.12-1944.8)
万众一(1944.8-1945.3)
李铁民(1945.3-9)
中共潼阳县委(略)
中共宿北县委(略)





修志不嫌方凳冷 编书尤喜夏时长

——访《连云区志》主编张树庄

※本刊编辑部

个人档案

张树庄,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人,1941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曾先后就读于墟沟小学、中学,1962年毕业于海州师范,1981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小学、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教学研究员、督学等职。1990年后,走进了编史修志的队伍。

主编《连云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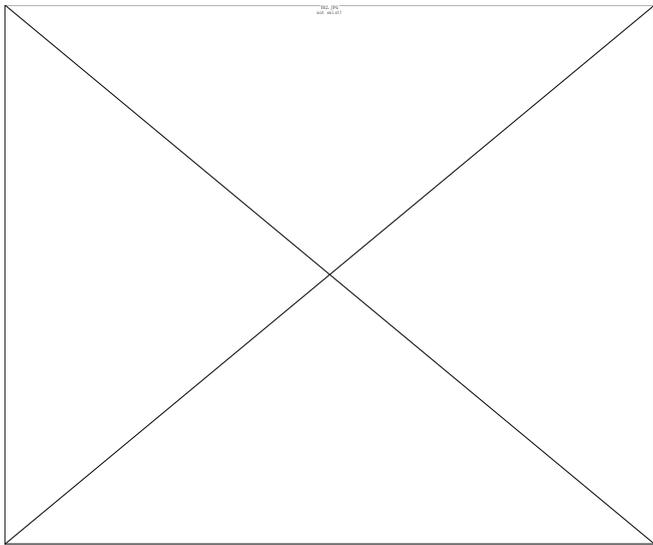
1990年5月5日,连云区政府下发了《关于成立连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张树庄为连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连云区志》主编,办公室副主任,开始了第一轮区志的编修工作。办公室设在区政府办公楼的顶层,办公室里只有4个人,且不稳定,逐渐有两人离去。编修地方志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此前,他虽曾通读过明《隆庆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云台新志》等书,但当自己担任主编社会主义新方志时,显得心中无数。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学习修志理论,学习新志书,学习同行的做法,在编修志书的过程中学习,甘当一个小学生。修志过程中,跑图书馆、档案馆,走访老人,函调知情人,一心沉下去,在书堆卷宗中,度过了4个春夏秋冬。经过4年的努力,至1994年5月,《连云区志》进入了总纂阶段,这时办公室只有两位同志,其中一位老同志即将退休,工作压力大,担子重,只张树庄一个人伏案笔耕,对志稿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并、转的总纂工作。1994年夏,天气炎热少雨,且高温持续时间长,六楼顶上暑气蒸人,只有一杯清水,一副老花眼镜伴其伏案笔耕,虽挥汗如雨,亦未辍笔。至9月初总纂完毕。接着,办公室的另一位同志也退休回家了,此后大量的修改、出版工作都由张树庄一个人来做。终于在1995年底,《连云区志》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我市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城市区志。该书的责任编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地方志》杂志社主编诸葛计先生在该书审核报告中这样评价:“《连云区志》志稿,观点正确,在体现地方特色方面作出了努力,显示了港口城区的特色,尤其

突出了抗倭、抗日前哨的历史特点,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资料较丰富,体例也完备,是一个接近完备的志稿。”1997年11月,《连云区志》荣获了全省地方志优秀奖。

编写地情书籍

1996年,张树庄为了配合连云区政府在连云区发展的需要,将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汇编成一本书——《锦绣连云》,该书全面地介绍了连云区地历史、地理、沧桑变化、文化古迹、风景名胜、海滨特产。通过桥头堡风情、黄海明珠连云港、古代交通及对外交往、巍巍云台海防重地、乡镇概况、山岛形胜、名胜巡游、港城名产、宾馆饭店等九个部分介绍了连云区锦绣壮丽的河山,日新月异的变化,描绘了连云区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雄姿。

为了进一步促进连云区旅游事业的发展,张树庄先后为有“世外桃源”之称的宿城写了三本书,从各方面介绍了宿城的风貌、特产、社会、经济。1994年写了《宿城》一书,当时条件简陋,书中的插图均为张树庄自己将所画的写生画稿。一次,为了补充一幅画,张树庄骑着自行车穿过连云港的“云台山



张树庄编撰的书籍





洞”去宿城，洞里乌黑，去时，跟在一辆大卡车后边，很快到了宿城。画了一幅写生画后，回来时，洞内无车，手电筒的光亮很微弱，结果撞到了洞壁上，重重地摔了一跤，在家里躺了一个月。2004年，为了开发宿城的旅游，为导游及游客编写了一本《宿城风景区导游词》，广为散发。2005年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近15万字的新著《世外桃源——宿城》，该书全面地介绍了宿城的自然风貌、历史传说、文化内涵、物产资源、以及建制区划的沿革等。其中“桃源揽胜”从世外桃源游、枫林红叶游、船山飞瀑游、仙庵悟道游、桅尖揽胜游五个角度带你进入世外桃源这一人间仙境。“道教与佛教遗迹”着重介绍宿城悠久的宗教历史及丰富的宗教文化。

1998年10月为连云区云山乡写了一本《云山概览》，全面地介绍了作为连云区西大门的云山乡的历史掌故、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时刻，应连云区教育局的要求，张树庄编写了一本《此是抗日大战场——连云地区抗战风云录》，他参阅了几十本书籍，走访了十几位老人，理清了连云地区抗战史料的线索，纠正和补充了史料中的错误和不足，完成了4.2万字的一本“连云区乡土教材”。此书在连云区学校及一些部门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小學生中间反响更大，让很大一部分青少年知道了这一段历史，记住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勇抗击日寇侵略的英雄事迹。今年清明节，万毅将军的儿子、儿媳妇，李欣的妹妹一行到连云港来缅怀连云港保卫战，李欣的妹妹、原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的李洪简看了此书，她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这本书确实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我把它带到北京去，给李欣同志再看看。”

整理文史资料

连云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张树庄为了能够把连云区历史上这些灿烂的文化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他甚至于废寝忘食，宵衣旰食地整理挖掘地方上的文史资料。至2007年在台湾出版的《海州文献》上发表了42篇文章，在台湾辛子方先生编的《海州乡土文化》上发表了10篇文章，在《连云港史谭（市情）》上发表了40篇文章。

张树庄撰文介绍了新县张恩沛的遗著《鸿雪联稿》，并与张义壮二人共同为该书作注，不久即将问世。撰文介绍了连云港市现存唯一反映清代科举考试的资料书《胸海蜃序录》，并在台湾影印出版（影印数量极少），将这一重要的地方资料书得以保存下来。

吴振勃（1770~1847）是清代乾嘉时期海州的一代名儒，一生著作颇丰，可惜都已失传，后发现在南京图书馆内还存有吴振勃先生著的《筠斋诗录》，共载诗613首。经吴家在海外的亲友联系，南京图书馆将此书复印了一套，在台湾的吴氏后人，将此书又影印了一些，分送海峡两岸及海外的亲友。张树庄有幸也得到一本。后经与在台的吴氏后人联系，张树庄决定为《筠斋诗录》作注。从2002年8月开始，至2003年5月，参阅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历史典籍，一部12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2003年底在台湾出版。该书只是赠送，寄到大陆来共70本，

《筠斋诗录选注》对原诗录中“其中惨淡经营有关名教之作”，对与作者影响较大、交往较多的时彦名俊的赠答之诗，对能反映作者生平履迹、社会活动、志趣爱好、抒怀咏志一类的诗作进行选注，共选诗262首。连云港教育学院的李德身教授，对《筠斋诗录选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本书对于保存地方典籍，研究乾嘉时期海州一带文人的著作意义十分重大，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缺，保存了大量的地方史料。灌云县的一位张兆雄读者读后，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华章捧读入其迷，选注筠斋我思。
白雪新声腾瑞气，阳春古韵发琼枝。
放歌两岸情缘结，落笔双枝肝胆披。
一卷诗书成大雅，名传海内识相知。

2004年9月，张树庄将平时研究连云地区宗教文化的文章，收编在一起，作为连云区政协文史资料，出了一本《连云地区宗教文化纵横谈》。该书分佛教篇、道教篇、天主教与基督教篇、民俗神篇四个部分，全面地介绍了连云地区宗教文化发展的历史、源流，对地方经济、文化的影响，并对有代表性的庙宇进行介绍。该书从纵的方面追述了连云地区宗教发展的源头，理清了宗教发展的脉络；又从横的方面对儒释道及西方宗教各自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和分析，挖掘了连云地区宗教文化的精华，收集、整理、保存了大量连云地区宗教文化方面的资料。全书内容丰富，引证广博，通俗易懂，值得一阅。

创刊《连云年鉴》

连云区在社会主义时期首轮修志结束以后，地方志办公室便解散了。近几年来，随着连云港市经济建设重点的东移，连云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轮修志又开始，因此，连云区政府又恢复了地方志办公室，张树庄重新回到了地志办。地志办面临的有两个任务，一个是续修《连云区志》，一个是创刊《连云年鉴》。经过一年的努力，从制定篇目，设置体例，征集资料，总纂年鉴稿，校订改错，编制彩页……一步步走过来，终于于2007年9月取得了方志出版社的出版许可。方志出版社认为这部年鉴稿“虽为创刊号，却以高标准编写，在参照同类书籍时也不乏自己的特色和亮点。”这本年鉴，是2004年、2005年、2006年三年的合编本。如何处理这三年的资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合编本年鉴，在处理不同年份的类似内容时，较易出现内容重复或资料缺失的情况。张树庄在编纂过程中尤其注意了对相关内容的把握，对大部分条目，采用先概述，再分述的方法，使读者对每一条内容既了解了全貌，也知道了不同年份的重要信息，不同年份的信息多则多写，少则少写，没有则不写，灵活机动。这样的处理，使整部年鉴没有形成为内容多次重复，无效信息反复出现的“大部头”书籍。方志出版社在审稿意见中认为这在合编本年鉴中具有一定的创新。

张树庄虽已退休多年，仍然伏案耕耘，从未辍笔。在他生日那天，写了一首七律《六十七岁初度感言》：

古稀已近愈繁忙，终日埋头沐翰香。
修志不嫌方凳冷，编书尤喜夏时长。
贤孙求学须无念，儿女奉公游有方。





新安镇攻坚战

纪念新安镇解放 60 周年

※王正中 李锦华

编者按：在灌南县英雄广场北侧的池塘南边，有一座用水泥沙浆砌起来的圆形大墓，提示牌上清晰地写着“解放新安镇烈士冢”。在这个大墓里安葬着华中野战军 11 纵 31 旅解放新安镇时牺牲的 80 多具烈士遗骨。值新安镇解放 60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为解放新安镇而壮烈献身的革命英烈。

1947年9月1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指出：“我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诸战场上，东起苏北，西至陕西南抵长江，已经转入反攻。长江以北诸省的伟大解放战争已经揭幕了。我们已经打到蒋介石的后方去了。”为了策应陈、粟大军第3纵队开辟淮北地区的行动，华中野战军指挥部决定第11、第12纵队，向华中第六军分区境内的新安镇，以及淮阴到沭阳线的五里庄、丁集地段的敌整编第44师发动进攻。第11纵的任务是攻克新安镇、武障河两据点，打开主力西进的缺口。

新安镇驻敌——国民党整编第44师150旅448团第1营（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共千余人。这股敌人是过去盘踞在响水口一带为非作歹的伪军徐承德部改编的，其成分多为海匪和恶霸之类的亡命之徒，以及地主、富农子弟和农村地痞流氓组成。他们对共产党和翻身农民怀有刻骨仇恨，在新安镇周围几十里内，大肆抢掠杀人，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新安镇据点内还有将近500人的还乡团，平时，由国民党整编第44师派军官将这些还乡团按班、排编组，进行军事训练，以提高他们的作战技能。战时，则由整编第44师的军官和老兵带领他们作战。因而，使敌人的作战能力得到了加强。

新安镇守敌的工事构筑与其它地方的大不一样，在新安镇大圩子里有核心据点；在核心据点内，又利用土圩、墙壁等掩蔽物体修筑核心工事，工事两侧有暗堡和独立散兵坑；镇内所有圩墙和屋檐下均开有枪眼，并对其进行了伪装；在主要交

通要道口，都设置了机枪掩体；在兵力上，各火力点之间都能互相支援，所有工事都以条石和水泥砌成，被称为“石头据点”、“模范工事”。新安镇北的武障河据点驻敌1个排，还有还乡团配合作战，共约60余人。

为了顺利攻克新安镇，华野指挥部决定：将第12纵队一个旅及炮团放在新安镇以南大新集一线，负责歼击阜宁、涟水方向来援之敌；11纵队第32旅位于顺和集、郑庄一线，负责歼击涟水方向北援之敌，保障31旅攻击部队南侧的安全。第31旅第91、第92团作为主攻部队，攻歼新安镇守敌；以第93团攻歼武障河守敌，负责对大伊山方向之敌警戒，以保障主攻部队北侧的安全。

根据第11纵队首长命令，第31旅首长决定：第91团由正北、西北向新安镇守敌发起攻击；第92团由正南、东南向新安镇守敌发起攻击；第93团以第三营攻歼武障河守敌。其余两个营则在武障河据点北侧设伏，准备打击大伊山之援敌。战前，第31旅副旅长朱云谦带领第91、第92团军事主官和担任主攻任务的各团、营、连干部，以及纵队侦察连部分人员，前往新安镇附近，进行战前侦察。他们利用夜色掩护接近新安镇敌据点，侦察地形和敌工事构筑情况。第92团第1营营长陆俊义率领1个步兵连随同前往，担任掩护任务。第93团第3营也组织各连干部前往武障河，侦察敌据点地形，基本查清了敌人的兵力分布和工事构筑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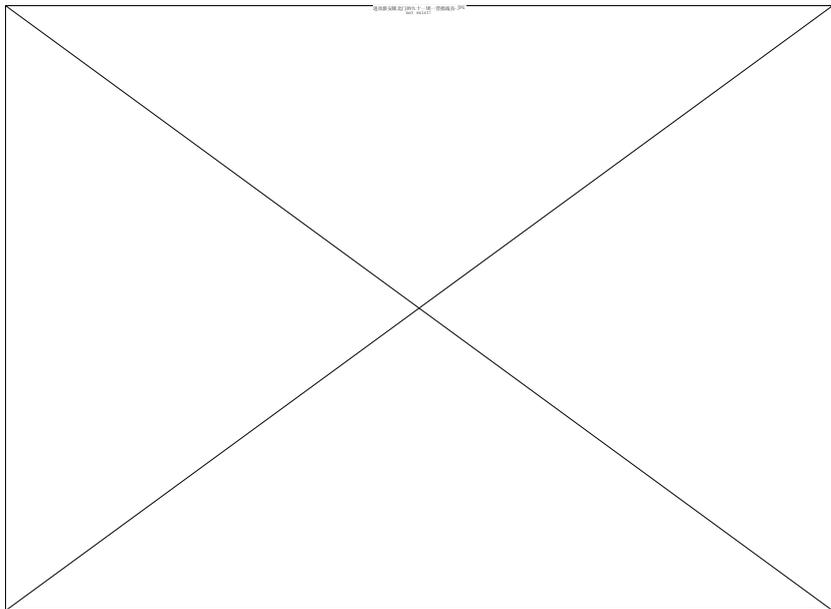
在我军对新安镇守敌开展攻击之前，我地方武装涟东县





里不要动。”我军突击队就紧张地构筑临时防御工事。

10月17日拂晓后，我军以山炮火力将新安镇北圩门峙云门楼和碉堡摧毁。上午8时，我军在31旅旅长段焕竞、政委刘毓标的统一指挥下，第91、第92团对新安镇守敌同时发起攻击。在火力掩护下，第91团2营第2连第3班班长王兴华率领战士，在敌火力下迅速架好桥，由第二连指导员唐余鼎带领的突击队，顺利地通过外壕，突破街北大圩子，进入新安镇大街。王兴华还赤手空拳地将敌企图封锁第1、第2连突破口的重机枪缴到手，保障了突击部队迅速向纵深发展。同时，我军92团对守卫在镇南之敌，发起新的进攻。我军炮兵向汪行那座大炮楼开了炮，在一阵阵轰隆轰隆



进攻新安镇北门的91团营指战员

的炮声之后，那座坚固的大炮楼，倾倒在半截碉堡了。炮楼里的敌人伤亡一片，其余守敌都丧魂落魄地逃向四牌巷和宣家大院。攻打南门和西门的我军乘势发起猛攻，夺取了南门和西门，蜂拥进入新安镇大街，和坚守在三牌、四牌、宣家大院及街心小地堡的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这时踞守在观音庵的敌人，还在作垂死挣扎。敌营长带着一队人马前来接应，在街上被我军阻住不能前行。91团第2营第5连，在连长杜柏林、指导员王刚的率领下，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果断地决定变佯攻为主攻，迅速攻占了观音庵，观音庵的守敌冒死突围出来，也龟缩到三牌巷宣家大院去了。与此同时，92团第7、第9连也突破了镇外大圩子防线，通过逐屋打洞，用小包炸药爆炸的方法，消灭了前进途中沿街地堡内的敌人，占领了十字街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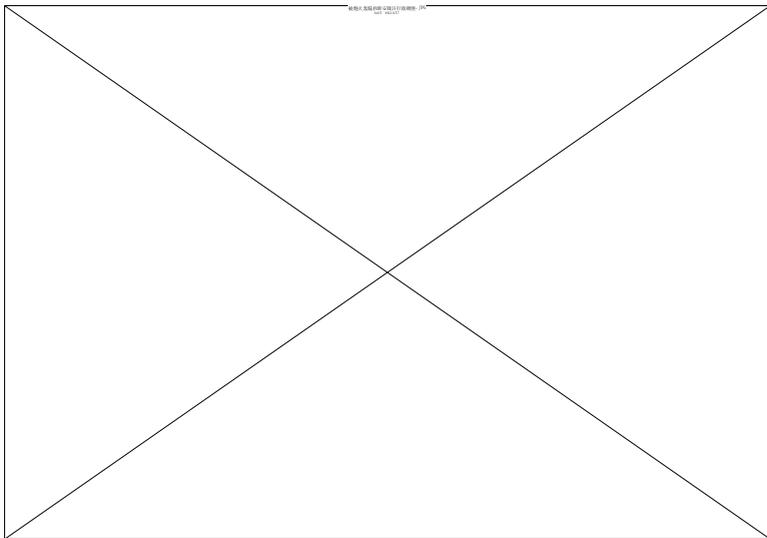
民兵总队在新安镇东南，灌云民兵总队在新安镇北、涟水民兵总队在盐河西，对新安镇守敌形成了包围圈。并负责歼击新安镇外围之敌。

1947年10月16日晚9时，我主力第91、第92团进入攻击阵地，进行土工作业。第91团第1营首先在新安镇头牌巷北，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守在峙云门上的一个排敌人，凭借着新安镇北圩门上高大的碉堡以猛烈的炮火进行顽抗。他们居高临下，使头牌巷街心和居民庭院，都被其炮火控制。我军虽多次组织猛攻，但始终不能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暂时和守卫在头牌巷碉堡内的敌人形成对峙状态。第91团第2营在第1营右侧，该营的第5连于当晚逼近观音庵据点，在庵西北侧进行土工作业。第3营为团预备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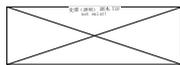
晚9时半，第93团第3营进入武障河攻击阵地，进行土工作业，组织火力，以迫击炮攻击敌碉堡。由于敌堡多为条石垒建，迫击炮无法摧毁。营首长又重新组织火力，并改进射击方法，用八二迫击炮直接瞄准敌堡射击孔，将炮弹打进敌碉堡内爆炸，获得成功。在炮火掩护下，第8连从南面、第9连从东面攻击，突破了敌人第一道防线，后遭敌顽抗，第8连伤亡较大。次日晨，第8和第9连突进敌武障河据点将守敌全部消灭。

深夜，新安镇四周，枪炮声、冲杀声、犬吠声不断。这时我军一支突击队，突然从奶奶庙东边的圩河上，悄悄的爬进去，逼近奶奶庙，进入赵家的住宅。躲避在这里的居民都大惊失色，我军指战员低声安抚说：“你们不要怕，也不要叫，蹲在这

隆的炮声之后，那座坚固的大炮楼，倾倒在半截碉堡了。炮楼里的敌人伤亡一片，其余守敌都丧魂落魄地逃向四牌巷和宣家大院。攻打南门和西门的我军乘势发起猛攻，夺取了南门和西门，蜂拥进入新安镇大街，和坚守在三牌、四牌、宣家大院及街心小地堡的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这时踞守在观音庵的敌人，还在作垂死挣扎。敌营长带着一队人马前来接应，在街上被我军阻住不能前行。91团第2营第5连，在连长杜柏林、指导员王刚的率领下，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果断地决定变佯攻为主攻，迅速攻占了观音庵，观音庵的守敌冒死突围出来，也龟缩到三牌巷宣家大院去了。与此同时，92团第7、第9连也突破了镇外大圩子防线，通过逐屋打洞，用小包炸药爆炸的方法，消灭了前进途中沿街地堡内的敌人，占领了十字街以南



被炮火轰塌的新安镇敌碉堡





的全部街道。九连连长张炳耀在追歼逃敌时壮烈牺牲。在我第91、第92团的南北夹击下，敌人全部龟缩到宣家大院敌营部核心据点、东街口火星庙、东桥口卫星据点内，负隅顽抗，死守待授。

10月17日下午3时，我军第91、第92团继续对敌核心工事攻击。经40分钟猛攻，第92团第1营第3连于下午4时半全歼火星庙之敌，连长张国生、政治指导员茅英、机炮连连长陈斯球光荣牺牲。第二营全歼东桥口之敌。在轻重机枪掩护下，第91团第1营、第3营对敌营指挥所宣家大院核心据点进行攻击时，遭到敌隐蔽火力点的顽强抗击，我军多次攻击未克，91团政治委员朱群亲自到第一线督战。第九连在突击受挫后，用八二炮摧毁敌隐蔽火力点，向敌核心据点攻击前进。17日下午，徐州国民党“剿总”得知新安镇告急求援，派来3架轰炸机，飞临新安镇上空增援，见我军已进入市区，正在巷战，飞机的战斗力无法施展，只得盘旋数圈，用机枪对市区盲目扫射一通后，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傍晚，敌营长王希畴在宣家大院指挥所内，召开了紧急会议，给部下鼓劲打气，他说：“援兵今夜明晨定将赶到，你们要坚守阵地，不准再后退一步，违者军法处置。”他给自己配备1个加强排，以保卫营指挥所。会后，他将保长周法勇留下，共谋逃跑事宜。

10月17日晚10时，新安镇街上的枪声时紧时松，我军的总攻还没有开始。龟缩在宣家大院据点内的敌营长王希畴对留守的一个排长说：“你守在营部，传我的命令，通知各连在战斗间隙要加强防御工事，千万不可疏忽大意。我带着加强排，出去侦察一下动静。”随后便叫周法勇带路，率领加强排，悄悄地从宣家大院后门离开营部，窜到文冠桥上，转弯经杨墩碉堡旁边，来到八佛庵后边圩河上，一个个迅速趟过圩河，一路落荒，经过和尚洼，直向张湾方向溜走了。

晚11时，守在宣家大院的敌人，见营长迟迟不归，意识到营长把他们甩下逃跑了。失去指挥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无心作战，企图突围逃跑，由于敌人突围，总攻提前打响，我军很快攻入三牌、四牌大街和宣家大院，一群没头的敌人，乱纷纷逃进宣家大院对门汪哑巴家的住宅。第91团第1营第1连连长田计带领第2排，政治指导员张仁贯带1个排，副连长吴山宝带第3排突击宣家大院据点，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攻克敌最后据点，俘敌1个运输排及还乡团200余人，我第2排排长马新和10多名战士英勇牺牲。

逃向张湾方向的一股残敌，刚到镇东的半路周庄就被我军拦阻围歼，全部缴械投降。至此，新安镇宣告解放。国民党驻守阜宁的44师485团接到新安镇同伙的告急求援信，当即出动。行进到佃湖时，获悉新安镇已被攻破，就退了回去。驻守涟水的486团接到新安镇同伙的求援信，既担心新安镇被攻克，失去屏障，又担心涟东、涟水的人民武装乘机进攻涟水，迟迟未敢妄动。后听说新安镇已被攻克，就完全放弃了北援计划。新安镇攻坚战从10月16日晚9时开始，到10月18日凌晨2时结束，历时29个小时，除敌营长率百余人漏网外，其余守敌均被我军击毙或俘虏，这次战斗，我军共毙、伤、敌55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迫击炮、六〇炮各2门，掷弹筒5门，

轻重机枪19挺，长短枪430支，各种弹药4万余发，军马5匹和许多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310余人，其中旅政治部主任许家屯负轻伤，到职不久的第92团政治处主任张之牧随第7连作战时，不幸壮烈牺牲。战后，11纵司令部授予首先突入街内的第92团第7连(突击连)为“新安镇战斗一等功臣连”荣誉称号；在第92团第1营第3连“叶挺连”的奖旗上，增绣上“新安镇战斗有功”7个字；授予第92团第9连“新安连”荣誉称号。第91团班长王兴华被记特等功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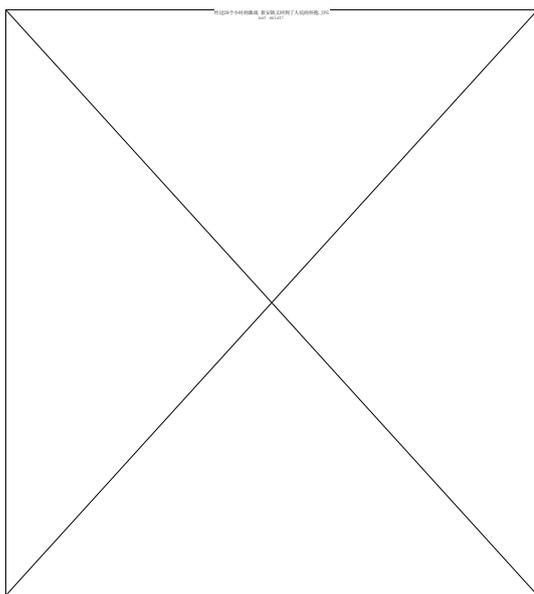
在新安镇攻坚战中，涟东、涟水、灌云、沭阳等县的群众和民兵、县区武装，积极配合第31旅部队作战，牢固地控制了盐河线，保障了攻坚部队的侧翼安全。淮阴和泗阳县的地方武装，配合第12纵队第35旅，将淮沭线上的中心据点，淮阴北面的五里庄和丁集据点包围，全歼守敌2000余人，控制了淮沭公路120余公里，解放沿线近百个村镇，牵制了敌人的兵力调动，保证了新安镇攻坚战的顺利进行。为配合华野主力解放新安镇，中共涟水县委组织高沟区队、公兴区队、武工队和乡队民兵数百人，于10月16日-17日，对新安镇以西的段口、惠庄、王渡、小前庄及西合兴庄、盐河与六塘河堤段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展开全面大搜捕，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两天内，共捕获敌土杂武装人员610人，缴获长短枪42支，子弹1700余发。

新安镇战斗及淮沭攻势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敌人对淮海地区的分割局面，使淮海解放区重新连成一片，至此，华中野战军与进军淮北的陈、粟大军，隔运河相望，东西呼应。

新安镇解放后，中共灌云县地方武装进驻新安镇，并成立中共新安区委，张义祥任区委书记。

新安镇解放，使我军控制了盐河线，奠定了开辟灌东地区的基础；也是灌东地区由坚持转向反攻的标志。从此，灌南地区进入大反攻和收复失地的新阶段。

(作者单位：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



新安镇重回人民怀抱





一个老八路的

军旅生涯

※ 陈丹林

在建军 80 周年前夕,我走访了临海市离休老干部江希德伯伯。江老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火中度过青春岁月。他出生入死,把革命军人对党的忠诚,镌刻在庄严的八一军徽中,融进共和国鲜红的旗帜里。面对我们这些和平年代成长的晚辈,江老说起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现将他的追述,整理成下面文字,献给读者朋友。

—

我的老家在连云港市原云台区张巷村,离连云港港口 20 余里,近海靠山,家有两亩山坡地。我仅上过三个月的学,十岁以后就帮父亲砍柴,做农活。底下还有弟、妹,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常下山打短工。

1938 年秋天,日本鬼子占领连云港,控制附近的盐场,造成吃盐困难。活跃在这一带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决定袭击鬼子的盐场炮楼。

太阳落山后,七八个青壮汉子,翻山来到我家山坡小屋。他们穿着便服,戴小草帽,扛着长枪,向我父亲买了一些柴担,把枪藏入柴内重新捆好,挑着柴向炮楼方向走去。炮楼里,早有游击队员打入内部,趁着夜色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日伪盐务小队队长及十几个日伪兵。游击队胜利归来,又敲开我家的门,喝了茶水,出劳金叫我父亲帮挑缴获的枪枝,送到山顶,匆匆翻山而去。

新四军游击队夜袭炮楼,惊动了日本鬼子。村里的大地主“张小老爷”勾结日伪,他怀疑我父亲与这事有牵连,让狗腿子吊打我父亲,挥皮鞭要他说出实情。父亲咬住牙关回答:“不知道”。狗腿子得不到证据,只好放人。

不久,日本鬼子大队人马来搜山。村民们扶老携幼逃进偏僻的山洞,狗叫人哭,火光四起。我家的两间小屋被烧毁,八岁的小妹妹在逃奔途中遇到日本鬼子,鬼子兵一把夺走她抱在怀中的鸡,一脚把她踢下山,连翻了几个滚,受惊又受伤,一病不起,两个月后就离开人世。家破人亡,饥寒交迫,日本鬼子又抓青壮年当劳工,何处有活路?

“要想活路,就去‘八路地’。”一个山东老乡指点说。老乡姓庞,是抗战前逃荒来苏北的。他会吹唢呐,常去红白喜事人家帮忙吹奏,是老熟人。老庞介绍说:“山东老家已是‘八路地’,八路军打鬼子,保护老百姓,发展生产种庄稼,不愁没饭吃。我们投奔八路去!”

父母亲忍痛送我上路,老庞推一辆独轮车,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载着被褥行李。我充作他的弟弟,在前面背纤拉车。过了铁路,在渡口遭日伪岗哨盘问。老庞说:“我们是一家人,逃荒出来,现在回老家。”哨兵见我们衣衫褴褛像乞丐,就放我们过去。穿过敌我双方都要经过的“阴阳地界”,进入一集镇,见到一群八路军战士正忙着推车、挑运,墙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幅标语。当时不认识“帝”字,读不下去。我拦住一个战士就问:“老总,这里是‘八路地’吗?”那举止文雅的战士就说:“老乡,不要喊老总,称同志,这里也不叫‘八路地’,叫‘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你从哪里来?要找谁?”

我说:“苏北老家被鬼子毁了,我是‘逼上梁山’来投奔的”。

那战士微笑地说:“欢迎!来山东上梁山的都是好汉。”这时,老庞已把妻子、儿女托付给岳母,和我一起到李家蒿山





东军区报名参军。1942年4月,我穿上军装,成了八路军游击大队的战士,那年我18岁。

二

参军后,我接受思想教育,提高了觉悟,懂得为革命扛枪打鬼子,为劳苦大众谋解放。我参加军事训练,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部队考虑我年龄小,调我到军区警卫班,还担任送信、传达等工作。

我认识了军区首长罗荣桓政委、肖华主任。记得七一党的生日,军区开大会演戏,肖华主任站在桌子上作报告,嗓门很响地说:“坚决粉碎日本鬼子的‘扫荡’,还要打到大城市去,解放全中国!”罗荣桓政委在梁店村召开干部会,我和警卫班同志负责在外面站岗,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讲话:“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的抗日,已经第六年了,抗战一定会胜利,反法西斯战争也一定会胜利……”激昂慷慨,极大鼓舞了我们斗志。

抗战的相持阶段,异常艰苦。八路军打游击,流动性大,一个地方最多住一两个月,有时只住十来天又转移。吃干粮行军,风餐露宿。每人都有针线包、自己缝补军装。实在无法缝补的破军装,就撕成布条,打草鞋。我曾患了痔疮,被送进一个设置在破庙里的医院医治,稍有好转就出院,跟着队伍走,夜里照样刺刀出鞘,站岗放哨。

记不得参加过多少次战斗,经常迂回打伏击,切断敌人后路突然袭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

印象深刻的是胶东公路上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冬日里得到情报,一支日本鬼子运输军需品的汽车队要经过山坳。部队与民兵就预先埋伏在山坡上,在公路上埋好地雷,用一段大树横在公路上设路障。鬼子车队来了,为首那辆车上的日本兵,忙停车搬树,想不到引发地雷连连爆炸。抓住战机,我们居高临下,一齐开枪射击,朝车队投掷一颗颗手榴弹,一霎间,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日本鬼子车队遭到致命打击,瘫痪在公路上。一声军号响,我们冲下山,收缴车上的武器后,点火烧汽车,我掂着缴获的十多支枪撤回。

不一会,一队日本鬼子追来,不见我们踪影,就朝山上乱放炮,由于负重爬山不便倒地隐蔽,臀部被榴弹炮片击中,划破棉裤,血往下淌,卫生员急忙拿出急救包,还好只伤了皮……这次战斗后,我成为警卫班长。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10月初新四军北上与八路军会合。根据党中央发展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罗荣桓政委率领大部分八路军北上东北,留下的队伍就编入新四军。我又成了新四军军部的警卫战士。

记得一天夜里,陈毅军长夫人张茜骑马来到驻地,刚巧我担任警卫。放好马,喂了草料,就领她去见陈军长。陈军长问我:“小同志,你参军几年?”我马上立正说:“报告首长,我参军四年了。”陈军长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莫紧张,马喂过吗?”我说:“刚喂过。”陈军长点点头,笑了笑说:“好,马不能饿,人也不能饿。”说着递过两个馒头,让我趁热吃。那时,在一个小村庄,陈军长的房间里点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照着墙上那幅军用地图。

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阴谋发动内战。根据毛主席“针锋

相对”的战略方针,为加强武装力量,1946年2月,部队抽调我和几个同志去东北,调运被苏联红军缴获的武器。

我们换上便装,扮成商人,从烟台坐客船到大连,再乘火车到丹东。凭新四军介绍信,在苏军仓库领取大批枪枝、弹药,还有小钢炮。说起来还真有意思,崭新的日本造武器,全由投降缴械的日本兵装运下船,他们的家属还唱歌欢迎我们。昔日气势汹汹的侵略者,今日俯首弯腰,任你指派。

运武器的是油轮,用粗缆绳系着大拖驳,货仓有五六十平方米,装得满满的,由我一人押运。掌舵的船老大是身份未公开的地下党员。船在丹东码头启航,从鸭绿江驶进渤海。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几艘巡逻艇出没在海中,夜里用刺眼的探照灯,搜索海面,一有情况就发布口令,让过往船只停航,扣押、炮击就随之而来……我与船老大商定,即使被巡逻艇发现,也不停航,作最坏打算。当然上策还是“智斗”。于是白天隐蔽,黑夜熄灯行船,船老大经验丰富,专绕偏僻水道走。

二月,春寒料峭,风大浪急,船不停地在海上颠簸。我第一次乘海船,晕船呕吐不止,无法饮食,军大衣根本不能挡风寒。迷迷糊糊中,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担负的重任,让船上的报务员不停地与岸上联系,终于联系上渤海军区副司令员。经过一天两夜,船驶到羊角沟埠头,副司令派人来接收武器,还用一营兵力,占领铁路,挡住国民党部队,连夜装运武器进入解放区,我胜利完成了任务。上级首长表扬我说:“小江,你立了大功。”他安排我住军区招待所休养几天,但什么美味都难吃下,睡在床上,只觉得屋顶还在晃动……

那年我23岁。

四

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放弃了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那时,我在华东野战军某部,任通讯班长。

记得打胶济路那个晚上,传达任务,我派通讯员小张送信过铁路。归途,国民党的飞机在铁路线上空盘旋,投入照明弹,又开枪扫射,小张中弹掉下马。夜里九点钟,还不见小张回来,正在焦急时,小张骑的小青马跑回来,吁吁地叫,不停地跳跃踢腿。我感到情况不妙,立即带领几个战士,跨上战马,小青马明白我们的意思,跃在前面领路找主人,带我们进了一个村庄,找到负伤的小张。小青马走近小张,跪下前腿,等他包扎好坐上马背才起身。一行人骑马返回驻地。想不到战马还如此通人性。

三五山一役,我们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万余人。整体过了春节后,解放潍坊。1948年春解放山东首府济南,活捉已化妆逃跑出城外的王耀武。大军挥师南下,打下兖州城,淮海战役揭开战幕。我们部队开到碾庄一带,包围黄伯韬兵团。从徐州到宿县方圆六十里都是战场,枪炮声密集,硝烟弥漫,满眼是断墙残垣,废汽车、弹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

我们奉命抢修东倒西歪的汽车,都是美式十轮卡,化了大力气才开动,交给炮兵团使用。又整理炮弹,为装备炮兵服务。

徐州被围,断粮。每天都有几百敌兵冒险出来投降,一见馒头抢着狼吞虎咽。领导让我做接收俘虏工作。这些俘虏兵大多是国民党从穷苦人家抽壮丁拉来的,我们一做思想工作,他





们往往幡然醒悟,表示不给国民党卖命,掉转枪口,成为解放战士。少数愿意回家的,我们就发路费开路条,送他们走。记得一个俘虏留下还是回家犹豫不决,那天晚上,我端了一盆洗脚水送到他床前,他顿时热泪盈眶说:“小时娘为我端脚盆,想不到今日你们共产党的兵,也给我这个俘虏端脚盆。大兄弟我不走了,我要参加解放军……”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与副班长在徐州西边的一个小镇拍了一张合影,我们穿着军装,全副武装,胸前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显露出革命军人气质。

八年未回家,趁着部队整休,请假返故乡。我一走,音讯全无,此时见到妈妈喊一声,她泪流满面……第三天碰上村里开大会,村干部让我上台讲话,我就在会上讲了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讲了只有跟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乡亲们为我鼓掌。作为人民子弟兵,我感到无上光荣。

归队后,上级调我到后勤部军械处政工科任政治干事,那年我26岁。

五

大军南下,军械处随部队驻合肥城外。我们整理武器、弹药、装备,组成临时军火库。披着军大衣,轮流站岗,与支前民工一起搬炮弹装车,军情紧急时,常饿着肚子,干得满头是汗。国民党的飞机,每日在头顶上盘旋丢炸弹,一见民房起火,我们就冲上去扑火。一次敌机丢下氧气瓶那样大的硫磺弹,火势凶猛,离军火库仅20米。我与保管员迅速窜了出去,张开大衣扑火,身上的衣裳燃着了,两个民工被烧得在地上打滚,众人奋力灭火,终于化险为夷,保住了军火库。

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部队结集在芜湖长江渡口,军械处征集一千多条民船,供大军渡江。百万雄师,所向无敌,我们走宜兴,到湖州,1949年5月解放杭州,野战军与浙西、浙东游击队胜利会师。我又忙着征军粮。

1949年7月,谭震林书记组织省委工作队,动员二百多排级以上干部,转入地方工作,下乡剿匪,巩固政权。我转业成为地方干部,当过乡长、厂长、校长、主任、书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身上穿的军装渐渐褪色,然而,我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个兵,嘹亮的军号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采访附记

江老充满深情地追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十分感人,引起我们的深思。这时,电话铃声响,是他的一位老战友打来的,两人相互问候,长时间交谈。趁这一空隙,江老的儿子、儿媳评论起他们的父亲来。

“老爸虽然没有大学学历,离休前职位也不高,但是他经受革命战争的考验,入了党,经过人民军队这个大学校的培育,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成了一个出色的政工干部。他作风正派,善做思想工作,平易近人,无论在那个单位,都受到同志们的尊敬,亲切地喊他‘老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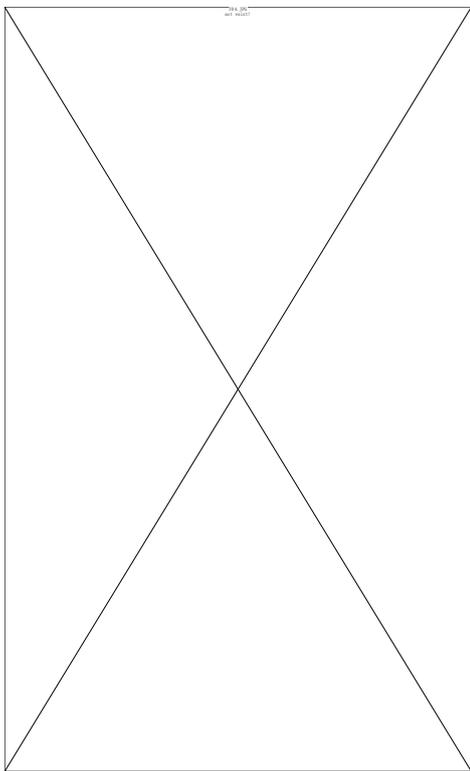
“老爸还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家里。记得小时候,我们几个兄弟,看完电影《地雷战》后,学着电影中的日本鬼子说的话:‘八格牙路,统统的杀。’想不到这一下激起在临海养老的奶奶蕴藏在心中的怒火,她气冲冲地说:‘你们说鬼子的话,丧尽天良!’说着抡起拐杖要打我们。老爸上来劝阻:‘妈,你消

气,孩子不懂事,我有责任。’就把我们喊到他屋里,给我们讲日本侵略者在老家的暴行,他年仅八岁小妹妹的惨死;讲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扫荡,在南京的大屠杀……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牢记民族恨。”

“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把艰苦奋斗的精神印进老爸的心中。他从不为自己的工资、待遇、住房提什么要求,有人无意间说他,‘从军队转入地方太吃亏了。’老爸回答:‘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是太幸运了,人家为了建立新中国,把生命都搭上。说自己吃亏,我会脸红心不安’。”

“屋里那些家具,又土又旧,是老爸从建德捐到金华又捐到临海的,总舍不得换。他说,改革开放富了起来,你们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不反对。但又下‘命令’:结婚不许大操大办。”“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锤炼了老爸的钢铁意志。在岗位上他吃苦耐劳,是有名气的‘硬骨头干部’。年近80时,查出得了肺癌,动了大手术,刀疤几乎绕胸部一圈,他顽强地挺了过来,人虽消瘦,依然很有精神。出院五六年来他乐观地坚持锻炼身体,参加老干部台球比赛,还获了奖。”

江老接完电话,回到我们中间。我提出看看他的军功章。江老高兴地又从又土又旧的床前柜里,取出十多个军功章,它们来自不同时期,由不同的部门颁发,是江老军旅生涯的见证。其中有“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还有两年前中央军委给参加过抗战的老同志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弥足珍贵。望着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军功章,我不胜感慨:光荣属于江老,更属于培育他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那所大学校——伟大的人民军队!





关于二轮修志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董忠

目前,全国上下都在开展新一轮修志工作。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首轮修志,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形势、任务、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二轮修志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此,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现提出求教于同仁。

关于营造依法修志环境问题

2006 年 5 月 18 日,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地方志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是地方志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以此为标志,我国地方志工作迈进了新的纪元。学习好、宣传好、执行好《条例》,对确保二轮修志的顺利开展和繁荣发展地方志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因此,当前各级修志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在埋头进行二轮修志的同时,应抓住《条例》颁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各种手段,营造良好的依法修志环境。

首先,要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体广泛宣传,要通过专题学习会、座谈会、知识竞赛等活动进一步宣传、学习《条例》,提高社会对《条例》的了解和对修志工作的认知度、认同感。《条例》颁布以来,特别是今年 5 月份以来,各地结合纪念《条例》颁布一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我市也在《连云港日报》、《机关家园》网站上刊登了公益广告,介绍《地方志工作条例》内容和修志知识;在市区主要路口、公共场所悬挂横幅标语;召开《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一周年座谈会;拍摄《用心修志,以情著书》专题电视片,在市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这些宣传活动在全市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对修志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其次,要加大督查力度,确保《条例》的贯彻落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各省地方志办公室要把对“《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列入工作日程,并抓紧落实,不能只停留在会议上、领导的讲话中。在督查方式上,可以请人大、政协对《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视察,可以由政府部门对《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至少应由上级地方志部门到各地进行检查。督查的内容包括:《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情况,二轮修志的开展情况;重点督查地方志工作的“一纳入、五到位”情况,特别要检查县区修志工作的结构、人员、经费的落实情况。

第三,各级修志机构和广大方志工作者要有强烈的“依法修志”意识,做依法修志的楷模。一是进一步明确《条例》中规定的各级政府和地方志部门在修志方面的职责,树立“不尽责就是不作为”的理念。政府要实现由“被动修志”到“主动修志”的转变,地方志部门要实现由“我要修志”到“要我修志”的转变;二是牢牢把握《条例》中对修志业务方面的要求,比如第六条对志书质量的要求、第十二条对志书验收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志书著作权的规定,都要在工作中认真落实,以体现我们在依法修志,做依法修志的表率。

关于组织形式问题

完善的组织形式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修志工作也是如此。首轮修志已经探索了一些成功的修志组织形式,但由于新一轮修志形式、任务和要求的变化,二轮修志的组织形式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编修体制。首轮修志中创立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编委会和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的修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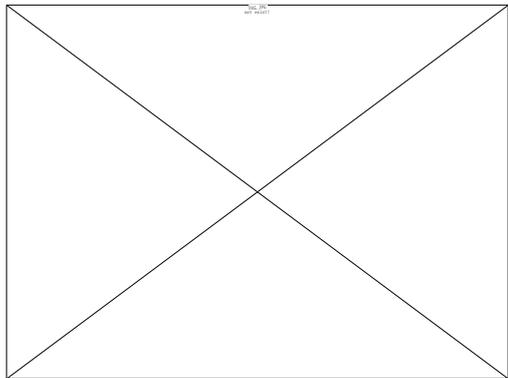
体制,为保证三级志书编纂任务的完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这种体制运行的特征是通过领导和会议来推动的。一个地方修志工作进展情况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当地领导对志书编纂重视程度,在组织上往往采取会议推动的方法。其结果,不仅各地之间由领导重视程度不一样,修志进程不同,就是在同一个单位,常由于领导的变动而直接影响修志进度。因此,随着《条例》的颁布,应变修志工作“依靠领导”为“依靠法制”,建立“法制保障,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编委会和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的新体制,真正做到依法修志。

其次,各级地方志部门要整合内部资源,形成全员参与的修志格局。本轮修志与上轮修志不同在于,上轮修志时大多数修志机构是单独设立的,而现在多数是史志合一,地方志工作职能由一个处室来承担。一部二三百万字的志书仅靠一个处室的两至三人承担,而且还有时间要求,显然不大现实。因此,各级修志部门特别是市、县两级要整合部门资源,让机关具备修志能力的同志都参与到本轮修志中,形成“全员参与”的修志格局。对此,我市进行了探索,成立了《连云港市志》(1984~2005)总编室,下设“一部四室”,即编辑部、政治部类编辑室、经济部类编辑室、文化社会部类编辑室、自然地理部类编辑室;每个编辑室2~3名编辑(共12名);每名编辑明确若干篇目,从业务指导到提交分志评审稿,责任到人,一包到底。这样做,既壮大了修志力量,又锻炼了队伍,还可以避免单位内部因忙闲不均所引起的矛盾。

再次,要整合外部资源,形成协作互助的良好局面。一是,聘用社会上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来承担部分修志内容(如方言、民俗等),以弥补自身人才和力量的不足。聘用人员可采用“坐班制”或“一事一聘制”。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有些地方志部门把聘用的专家学者和老同志作为二轮修志的主力军,笔者认为这相当不妥,不利于工作的推进、队伍的锻炼、事业的发展;二是,根据各方志承编单位的工作性质,成立协作组,每组明确一个组长单位和一名编辑担任联络员,加强部门间协作、交流。

关于篇目设计问题

篇目是一本志书的蓝图和内容的概括。它在志书编写的



起步阶段,是收集资料的提纲;在编写过程中,是编写的依据,志书成书后,又变成了目录。制定好篇目是编写好志书的首要环节,也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二轮志书篇目的设计,总体上应做到“一条主线、二个坚持、三个有利于”,即围绕改革开放主线,坚持志书体例、坚持不断创新,有利于内容的完整、有利于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有利于志书的编写和利用;防止四种错误倾向:一是仓促上马,论证不足,设计的篇目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指导修志工作的开展;二是认为要反复论证,迟迟拿不出来、发不下去;三是人云亦云,特色不够,平庸无奇;四是将资料征集篇目等同于成书篇目,拘泥呆板,不能根据情况变化适时更新。基于目前各地的志书篇目已经成形,对如何设置篇目在此不想赘述,笔者仅就两点再谈一些认识:

一是改革开放篇目的设置。二轮修志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做好这一时期的修志工作,不单单是编一部书,更重要的是通过认真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实践经验,为新时期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借鉴。因此,改革开放篇目的设置尤为重要。目前改革篇目设置大致有三种具体方法,即集中、分散和集中加分散。笔者以为宜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设置方式。理由是集中设置可以集中鲜明地反映改革开放的主要进程、主要措施和主要成果,有利于突出新时期的时代特点;与分散相结合写,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是与各行各业各部门紧密相关的,有利于突出改革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具体安排是首先在专记中设改革章,进行总体记述,与首轮志书相区别,突出新时期的时代特点;其次是在凡涉及改革内容的分志篇目下设章,并作为第一章,记述行业的改革情况。开放内容可以通过设立“开放型经济篇”、“开发园区篇”来进行记述。《连云港市志》(1984~2005)就设了上述两个篇目。“开放型经济”作为第13篇,下设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招商引资、对外经贸、国际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协作等5章内容。“开发园区”作为第8篇,下设国家级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港出口加工区以及省级10个开发区等内容。

二是关于反映地方特色问题。志书没有地方特色,就会形成“千志一面”,要形成特色首先要从篇目上反映,我们在设计《连云港市志》(1984~2005)篇目时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作了一些探索。如根据旅游业是我市的支柱产业,而花果山则是旅游中的重点景区,同时也是《西游记》的原型地,我们把花果山从旅游篇中分出,设立了“花果山篇”,而且前置为第五篇;再如,结合我市是沿海开放城市的特色,设置了“陆桥篇”、“港口口岸篇”,以展示我市的地方特色。此外,我们还设立了“专记篇”,记述连云港被列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成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启动海滨城市建设、东陇海产业带开发等内容,也充分展示了地方特色。

关于规范问题

地方志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它有特殊的体例,独立的内容,独特的编纂方法,因而有





自己的规范性要求。在首轮修志中,对于志书的规范有了一些明确的要求;二轮修志开展以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又起草了《关于编写第二轮地方志书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各省地方志办公室对于新一轮修志都下发了文件,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广大方志工作者也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市在新一轮修志工作启动时也印发了《修志编鉴手册》、《连云港市续修志行文规范》、“关于《连云港市志》(1984~2005)大事记、各分志资料长编、补遗和勘误资料、专记资料的编写要求”,有力地指导了二轮修志的开展。

笔者以为,上述规范主要是对志书内容的规范要求比较多,目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应对二轮志书的体式进行规范。志有志体,这一点,在首轮修志中处理的比较好,三级志书都是统一的篇章节体;可是二轮修志开展以来,在一片创新声中,志书的体例出现了三种形式:篇章节目体、条目体、篇章节与条目结合体,而且各自都认为自己的体式最好,引来争论声一片。笔者并不反对创新和争鸣,创新和争鸣对出精品良志有百利而无一害。笔者以为编修志书是一件很严肃、很严谨的事情,志书的体例应该统一,至少一个省内应该统一。因此,对于上述三种体式,应择优而用之(笔者以为,如果志书层次较多,可以采用篇章节目体与条目结合体相结合的体式);即使都可以用,也应由中指组,至少各省修志机构明确其中一种,以便执行。否则,将来二轮志书出版后,从体例上看可能会像地方志机构的一样五花八门,给人感觉不严肃、不严谨;另外,等到下一轮修志时,我们的后人又该如何参照?

关于规范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规范的一致性,以避免各级政府或地方志部门制定的规范相互抵触,造成在执行中的混乱。二是规范的执行力问题。由于许多规范缺乏法律的刚性约束,执行起来遭遇无限期拖延或不了了之。因此,重点要在规范的一致性和执行力上下功夫。笔者以为,修志中但凡涉及全国性规范的,应由中指组提出、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涉及省及规范的,应由各省地方志办公室提出、各省政府办公厅发文,且不得与全国的规范抵触。同时要加大对规范检查力度,确保制定的规范条条落到实处。

关于“好”与“快”的问题

最近,朱佳木同志提出:“对于修志来说,要做到‘又好又快’就要把质量放在数量、进度的前面”,这是修志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各级修志机构和广大方志工作者应认真领会把握。

笔者以为,“好”的问题实际是强调志书质量问题。质量志书的生命,二轮修志应该把质量放在首位,这一点,已成为修志同仁的共识。要保证质量,首先要建立质量标准,一般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观点鲜明正确。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特别要突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既要讴歌三个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又要客观适度地记录各项事业兴衰成败的过程和教训;二是体例完备严谨。要做到严守志界,横排竖写,述而不论,详略得当,生不入传,述、记、志、传、图、表、

录诸体并用等;三是资料翔实可靠,达到全面、系统、真实、实用的要求;四是特色鲜明,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行业特色。五是语言规范严谨。其次,要建立三大机制,确保质量。一是建立以主编责任制为龙头的一系列责任机制,包括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责任,撰稿、审稿人责任制等;二是建立严格的审查验收机制,包括分志稿和整部志书的审查验收都要有明确的规定。最近,我市根据工作需要制定了“《连云港市志》(1984~2005)分志稿评审办法”,明确了分志稿的质量标准和三审制度(初审由各单位自审,复审由承编单位组织同行业的专家学者进行,终审由总编室通过“主编-编辑”审稿会的方式进行);三是建立严格的激励机制,奖罚分明,做好的要奖励,不好的要处罚。

“快”的问题强调的是速度问题,即何时完成二轮修志问题。本轮修志不能像首轮修志那样,一本志书修2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出版的志书有的还存在史实不清、行文不规范等质量问题。笔者以为,本轮修志应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编纂效率,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早出书,出好书。为此,首先要制定一个好的“编纂方案”,对资料收集、长编和初稿的撰写、编辑校对、审查验收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提出明确的时间要求,做到职责明确、环环紧扣、有序推进。我市在编纂方案中就明确提出“《连云港市志》各承编单位在于2006年底前完成资料收集和资料长编编写,2007年底前完成初稿撰写,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市地方志办公室进行总纂并完成初审,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终审修改、出版发行”;其次,要加大培训和业务指导力度。由于参加本轮修志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参加过首轮修志,所以,抓好二轮修志人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是决定新一轮志书能否“又好又快”出版的关键所在。培训和业务指导,从内容上讲,包括修志的基本知识、资料的收集、资料长编和初稿的撰写;从对象上讲,包括主编的培训、编辑的培训及撰稿人的培训;从形式上讲,可以采用专题培训、以会代训、研讨式培训等;从环节上讲,一般是在启动大会后即举办基本知识、资料的收集以及资料长编编写培训班,中间结合督查进行分类指导,最后结合推进会举办初稿撰写培训班;第三,把二轮修志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考核体系,进行年度考核,严格按序时进度推进;第四,加强督查力度,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2006年10月,我市利用5天时间分8个组,对县区和市直100多个市志承编单位进行了“拉网式”督查,并在市政府《督查简报》上发出督查通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总之,在二轮修志的推进过程中,不能指望一次启动大会、一次培训就解决问题,而要动员会、督查会、推进会并举,各种培训和业务指导齐抓,才能处理好“好”与“快”的关系。不能因为强调“好”而没有速度,仍然10年乃至20年谋一书;也不能强调“快”而不讲质量,导致志书出版后问题成堆。应做到“好”中求快,“快”中求好,达到二者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影响第二轮修志质量的五个因素探源

※包宇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二轮修志目前进行的如火如荼,这是可喜可贺的事,笔者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正好赶上这项功在千秋,名垂青史的盛事,深感荣幸!接手此项工作已有一年,唯感觉有几个弊端,影响修志的质量,或影响修志大业的序时完成,在此提出,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及时寻找出医治此弊端的良方。

弊端一:众人成志,变成数人修志

众手成志、部门修志,是志书编纂工作最基本的特点,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部门行业越来越多,势必要求编纂志书时的资料搜集工作要广泛发动各单位参与。但是,目前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广大单位发而不动,编纂工作大会开过已有一年,而各承编单位提供资料却之声寥寥无几,虽经百般催促,仍一味推拖,作为区志编纂工作人员,不能做量体裁衣的裁缝,只好去做无米之炊的巧妇——自己去找米下锅,好多部门的资料是自己一个人去搜集,自己去编纂,如此,编纂志书成了志编办人员的事,成了典型的几人(数人)修志。显然,这样编纂的志稿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局限性。

弊端二:专业修志,变成门外汉修志

编纂人员的主动找米下锅,势必造成门外汉修志。笔者深有体会,我首先接手的是“规划布局”部分的编纂工作,主要翻阅我区各时期主要的“总体规划文本”以及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翻阅,摘录,接触的是大量的“规划理念”、“规划指导思想”、“规划布局”、“专项规划”……大量的新概念,新名词,尽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难免不说外行话,做外行事。再说各承编单位,由于对这项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它安排一些挂职干部、新参加工作的人员,至于熟悉业务,精通事实真相的人员,往往都是业务骨干,不能抽出做这件“可有可无”的事,结果导致门外汉修志的弊端。笔者尽管目前编纂出“规划布局篇”的初稿,心里仍不踏实,生怕我这个门外汉闹出笑话。另外,从目前我们接触的材料来看,还有些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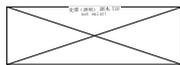
门外汉是无法插手的,你想做也做不了。我们期待着部门专业人士参与修志。

产生以上二弊的原因很多,但其根本一点还是与当前人们责任意识的缺失有关。表现之一:原始资料存档意识淡薄。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单位因部门撤并,机构调整,人事的变动,造成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遗失,甚至有部门将整柜子的材料当成废纸卖掉,以至于档案馆该部门材料寥寥,让你连“米”也找不到。我们强烈呼吁:为了方便下一轮的修志工作,当前各部门、各行业要加强存档意识,必要时纳入工作考核范围。

表现之二:修志工作责任意识模糊。到目前为止,从部门领导,到各岗位职工,对编纂志书的责任意识模糊,部门分管领导强调不够,承办人员事不关己,造成材料征集工作迟迟不得进展。因为这项工作目前没有纳入年度工作考核,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与干坏一个样,长此以往,不仅影响志稿的质量,而且影响修志工作的进度。故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修志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考核,这是解决当前催稿难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弊端三:泡沫信息,真假难辨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同时处于泡沫信息包围之中。我区有藤花落古文化遗址,关于该遗址考古发现的信息在网络上有上百篇之多,可是要搜寻下来,比较一下,只不过几十条,其余都是各种形式的复制品,斩头去尾者有之,改头换面者亦有之。而有新意者少,卓见者稀。究其原因,现在人心浮躁,很少有能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考察一件事,大都急功近利地在媒体上剪一剪,拼一拼,贴一贴,抄一抄,结果弄出了大量肥皂泡的东西。要想将这些材料编纂入志,就必须要做大量的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工作,这就要求编纂者要细心考查。另外,新闻媒体报道的水分含量太大。据一位做新闻的朋友披露内幕,有一些新闻工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写出的报道稿要根





据新闻的需要将数据调整一番,才能发表出去;更有甚者,有些老兄既不调查,也不采访,将别人发表过的材料搜集起来,来个乾坤大挪移,半年的产值说成一个季度的,将一个季度的产值,写成一个月的利润……新闻界有个灰色的幽默“报道呀,都是水;发稿呀,玩点鬼,哄得领导,咧着嘴;气得老百姓,直蹬腿!”遇到这样的资料,更让人无所适从。我们在采用数据时,要用原始的台账资料或者年度统计报表。当然,这要翻阅大量的档案材料,所以,档案见底之说,是修志人员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课。

我区朝阳镇有位已故的清末贡生叫张学瀚,据说他在民国年间,让人用竹筐抬着走遍云台山的山山水水、港港湾湾,村村巷巷。每到一处,用丈量或步量的方法,量出路程长短、面积大小等,并记录下来。然后,考证其历史遗迹,名人逸事、风俗资源。最后赋诗赞之。后材料结集出了《云台导游诗钞》一书。为今天人们考查云台山地区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这种事必躬亲的研究精神,告诉我辈修志者,“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弊端之四:因循成志,形式呆板

二轮修志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借鉴成志,这将使修志工作有着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模仿。但也存在过于拘泥地模仿,机械地抄袭之弊端。要求在借鉴成志时,要独观大略,无须事无巨细。例如《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志》(续志)采用的是按部门及行业分类,每节志稿里又有机构沿革、职责功能、工作业绩、受到的奖惩等几个方面,可谓面面俱到型,易于在资料征集过程中,由承编单位编写资料时采用,但在汇入总稿时,因其内容臃肿,篇幅过长,而不得经过编纂人员有目的选取使用。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志》采用的是“年鉴体”,属于选取亮点式材料组合,其内容亦可以短小精悍,符合现代人快餐式的口味;其弊端在于材料取舍时,有时会以偏概全,人们通过志书,了解到的只是一鳞半爪。采用年鉴体的编写方法,在资料搜集过程中不易操作,承编单位很难吃透编纂者的意图,提供资料时无所适从。以上不同特点的志书都给我们的修志借鉴提供了很大自主的空间,对于如何在志书中反映面上的闪光点以及线上的发展变化过程,要根据材料进行恰当的取舍,做到“纵向一条线,横向一切面”,具体地说:纵向上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将主要事件排列起来,以记叙发展变化过程;横向上,以下截止日期为标准,稍详细记述单位及部门的现状,这也就是对志书“略古详今”特点的个人化见解。志书的修编要与时俱进,重点篇目要不惜浓墨重彩,如我们《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经济建设”篇应该是重头戏,与之相比开发区的文教卫体,民政信访等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的内容,则是从属地位,篇幅就不要过大。对于详写篇目,不仅要有面上的概括,而且要有点上的详述,例如在写国家级开发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的建设过程时,可以请几个当时主要经办的老领导,写一些回忆录,以体现“创业艰难百战多!”同时提高了志书的可读性。在写“招商引资”篇时,可以以个案的形式插入几例我区大型外资企业落户的经历,一则是现身说法地体现我区筑巢引凤的成绩,同时又是一张无形的招商名片,吸引外来商户。以上这些,都是借鉴其他开发区

志书的优点和长处从而形成自己特色的。活学活用,借鉴而不泥古,是我们正确对待成志的态度。

弊端之五:数字堆砌,缺乏可读性

志书是供人阅读的,所以,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志书的生命。志书又不能离开数字、表格,仅这些东西,又把志书弄得面目可憎。为了让人们很好的阅读它,接受它,力避数字堆砌,表格单调。弥补此弊端方法有:一、加大图片采用量,使之图文并茂。图片能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争取让图片说话。二、增加志稿内容的人文含量。与兄弟开发区相比,我们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坐落在风景优美,历史文化积淀较为丰富的中云台地区,这里有藤花落古文化遗址,有田横及五百壮士避难海上的田横岗,还有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原型汉东海孝妇祠,还有李太白登山望海哭晁衡的太白涧……不同时期文化遗存几十个,所以,开发区历史文化遗存单列章节来记述,为旅游资源的开发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我区的孝文化(娘娘庙恢复)、忠文化(田横衣冠冢、五百义士墓),宗教文化(长春庵、崇善寺、兴国寺)这将是另一块招商引资的名片——文化招商。除了历史遗存和自然景观之外,对开发区的进区企业,也在人文方面进行挖掘,如大型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宗旨、厂徽、厂标以及名牌商标,均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另外,企业的文艺团体,文化名人以及所开展的文体活动,皆是具有灵性的东西,编纂好这部分志稿,定能增强志书的可读性。三、增加志稿的人情味。在“劳动管理”篇里涉及到开发区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劳动力安置问题,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开始是土地带人,将因建设征地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村劳动力安置在区属企业里,当时劳动服务公司创建了许多经济实体,由于安置量过大,区内无法解决,运用支付安置费,联系区外企业的方法进行劳动安置。随着安置企业的停产倒闭,大批被安置的农民纷纷失业,安置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却浪费了大量的拆迁补偿费。进入了第二阶段,拆迁补偿一次性发放到位,失地农民可自谋职业。劳动人事部门组织就业培训,提供就业服务,鼓励自主创业。农村劳动力被解放,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谋职业者出现了大量的工商个体。这样,就业压力大大缓解。第三阶段,开发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没有忘记曾为开发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民兄弟,2005 年开始出台政策进行对历次开发建设被征地“农转非”部分人员基本生活补助。开发区拿出 2 个亿资金,前三年每年 800 万元,以后每年 450 万元,受益人口近 7000 人。纵观这段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开发区建设发展造福于民的宗旨,体现深厚的人情味。

综上五弊,原因各异,有因政府组织发动不力,致使不能众手成志而数人修志的;有因对修志的专业性认识不够,致使不能专业修志而是门外汉修志的;有因泡沫信息充斥,编纂者没有科学的态度,致使材料取用不实,真伪难辨的;有因编纂者过多借鉴成志而缺乏创新,致使志书形式呆板,内容空洞的;有因过于堆砌数据而缺乏人文精神,致使志稿干巴无味,没有可读性的。这些都是影响志书质量的根源,我们要想方设法从不同的角度在工作中加以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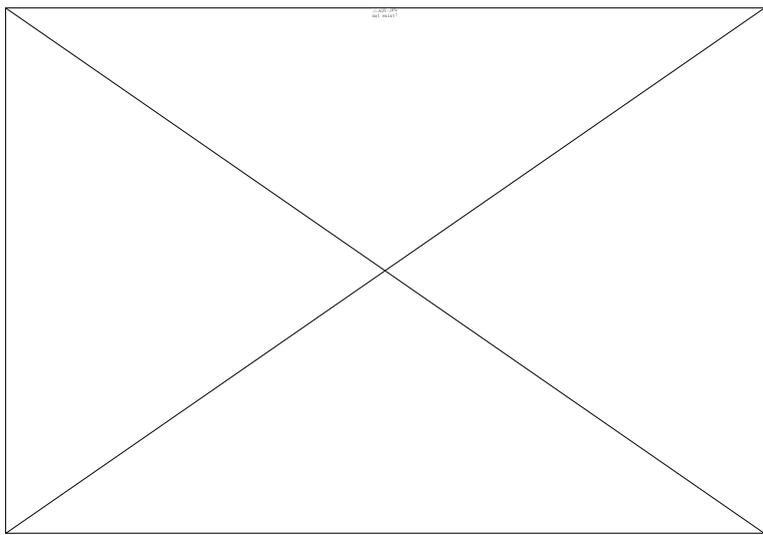
(作者单位:《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编纂办公室)





连云港市举办的第一次全国 《西游记》学术讨论会

※夏兴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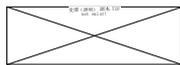
花果山三元宫

自从鲁迅、胡适等学者考证了名著《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淮安地区的吴承恩以后，淮安的学者开始研究《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家乡。1958年，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来连云港视察工作时，口头捎来毛主席的指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老家花果山水帘洞就在新海连市云台山。”从那以后连云港地区的学者开始从明代海州地区属淮安府管辖的历史和经济、人文等关系中，探索研究了吴承恩的生活圈，认为只有连云港市云台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中孙猴子老家花果山水帘洞的背景。我市学者李洪甫教授已开始写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为了扩大《西游记》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影响，江苏省委宣传

部决定在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之际，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由省社科院牵头成立了筹备组，进行筹备工作。

1982年3月，根据省委宣传部的通知，连云港市委宣传部派了郑遵武副部长、吕从亮科长、市博物馆李洪甫研究员和市文联夏兴仁副主席四个代表到南京参加省社科院召开的筹备会议（此项工作应由市社科联承担，因当时尚未建立，故由市文联临时承担）。会上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刘洛，省社科院刘冬、吴圣昔，《江海学刊》的姚白桦、曹明、郝然，省作协李克因，淮安县刘怀玉、陈民牛、连云港市郑遵武、吕从亮、李洪甫、夏兴仁等同志组成筹备组，刘冬任组长，负责《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经过几次会议研究，省社科院又派吴圣昔、郝然同志来连云港市具体商讨。会议定于1982年10月在淮安县和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时间十天左右，前五天在淮

安县开幕，后五天在连云港市闭幕。会议规模120人左右，邀请的代表以文革前后发表过《西游记》研究论文的作者和长期研究《西游记》的专家教授为主，会议主题是讨论《西游记》这本书，但在预备会议上，省社科院许符实院长又提出“淮安地区的《西游记》的研究者要侧重研究《西游记》创作的人——吴承恩，连云港地区的《西游记》研究者应侧重研究《西游记》的地，即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中的花果山水帘洞地理背景和人文史料。首次提出了《西游记》应用研究的创意，为运用古典名著，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和开发旅游事业，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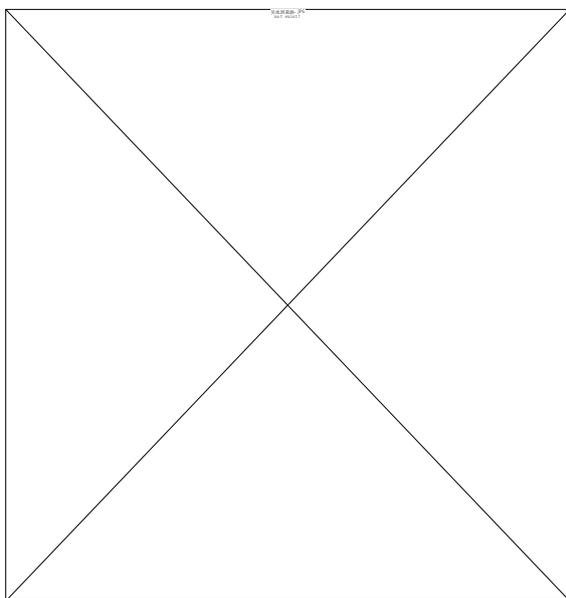


江苏省领导和连云港市、淮安县领导都很重视全国首次《西游记》的学术讨论会,在市委书记和市、县长的亲自过问下,市县都成立了筹备会议的领导班子和具体工作小组,为开好这次会议,作好充分准备。

1982年10月5日,全国首次《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淮安县隆重开幕,省委宣传部陈超部长,省社科院许符实院长,连云港市刘余隆副市长、郑遵武副部长,淮安县的唐县长等出席并致辞,来自全国的一百多位代表欢聚一堂,隆重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并参观了吴承恩的故居和吴菊翁、吴承恩的墓地文物展览。代表们情绪很高,一致认为对《西游记》作者研究很有收获,吴承恩一生穷困潦倒,留下了妇孺皆知、雅俗共赏,名扬中外的古典名著《西游记》,成了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他逝世四百年后,举行这样隆重的纪念会,也是对他的崇敬和告慰。

1982年10月6日,首次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连云港市举行。根据刘冬等代表的建议,会议地址设在靠海边的连云饭店举行,以便代表们望海游海,观山登山。6日早上由市外办派来了两辆大日野和两辆小日野客车,市公安局又派了几辆警车去淮安县,将全体代表接到连云饭店,当晚设宴招待,让代表们品尝连云港特产海鲜和新产的花果山啤酒,宴会后安排看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我市热情的接待,让与会代表赞不绝口。

在讨论会上,来自全国近20个省市的高等院校,社科单位新闻媒体的专家、教授和《西游记》的研究者计一百多位代表畅所欲言,提交论文70多篇,进行讨论交流。作为东道主,连云港市由研究员李洪甫教授率先主讲的《吴承恩〈西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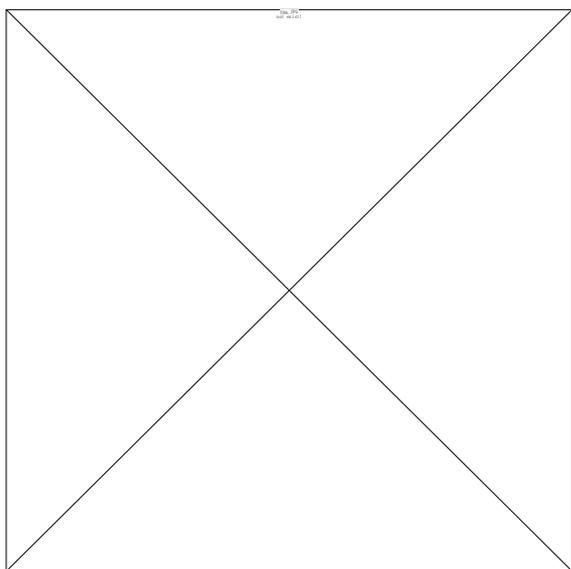
吴承恩墓碑

与云台山》,引起与会代表极大的兴趣。讨论期间,大家带着思考的问题和猎奇的心情,畅游了大海和明代曾在海中的云台山的花果山水帘洞以及传说中的《西游记》景点,对吴承恩以云台山为背景创作《西游记》,孙悟空老家花果山水帘洞特定的艺术环境,形成了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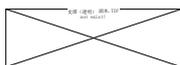
参加连云港市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的大多数是全国著名的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教授和学术权威,如:人民日报社的“红学家”李希凡、诗人作家袁鹰、东北师范大学“西学家”苏兴、广西师大的“西学家”胡光舟、辽宁大学的教授高明阁、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王永生、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刘毓、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朱其凯、河南师范大学的教授邢治平、安徽师大的朱彤、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总编何满子、浙江杭州大学的教授赵明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新、苏州大学的陈君谋、徐州师院的李时人以及山西省社科院的孟凡仁、陕西省社科院的瞿有明、江苏省社科院的陈辽、吴圣昔、欧阳健、白坠、姚政等学者,都有学术论文和专著在会议上讨论交流,提供的论文和专著质量很高。会后结集出版,成果显著。

连云港市委市政府对这些名人光临我市十分重视,亲自接见并陪同他们参观我市文化遗存和风景名胜(耿杰民市长、刘余隆副市长亲自陪同李希凡等名人参观游览),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李希凡、袁鹰等代表回到北京后,还寄来亲笔信,表示谢意,并盛赞这次学术讨论会开的很成功。

(作者单位:市文联)



花果山迎曙亭





毛主席水晶棺与东海水晶

※王云 魏爱华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皆悲。党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决定，制作一具水晶棺，把毛主席的遗体像列宁和胡志明那样保存下来，让大家瞻仰。

9月11日，连云港市东海县突然来了一位北京特使，他带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地质总局要求东海县迅速调运优质天然水晶为毛主席制作水晶棺的特殊任务。

东海县不仅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水晶矿产地，其水晶产量和收购量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而且水晶质量也是全国第一，主要成分二氧化硅含量高达99.99%，为世界罕见，号称“东海水晶甲天下”。所以，当党中央、国务院把调运国内优质天然水晶为毛主席制作水晶棺的任务刚下达国家地质总局时，地质总局便毫无疑问地把这一历史性的光荣任务落实到了东海县。当时代号为“一号任务”。

中央对制作水晶棺的用材要求极高，不仅要求无丝毫杂质，每立方米不超过2个气泡，而且由于水晶熔炼后制成大型板块的技术不过关，考虑到会多次失败，水晶的数量要求达到30多吨。如此之多的晶块要从数万块矿石中逐一精心挑选出来，任务十分艰巨。

曾任江苏省地矿系统东海105矿选矿车间主任的朱万珍回忆说，当时105矿的水晶库存不足，大量矿石需要现采，而东海水晶矿属于流沙矿，老百姓又称为“鸡窝矿”，也就是说，矿藏十分分散，一直是群众性采矿，然后105矿统一按斤收购。在这种情况下，东海县委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

于是，盛产水晶的安峰、平明、房山、白塔、石梁河、青湖等十几个公社都被动员起来，开始了一场集体化的全民开采。青湖公社每天出动1000多人采石，石梁河公社14名社员来到田头安营扎寨，房山镇芝麻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克友和7名党支部委员带领第四生产队全体社员日夜苦战，采到了大批水

晶矿石，其中一块重达400多公斤。

与此同时，105矿选矿车间的工人们也紧急行动起来，开始了日以继夜的奋战。当时任105矿选矿车间支部书记的袁兴全，谈起30多年前为毛主席选矿时的情景，仍然显得非常激动。

袁兴全记得第一批任务是5吨优质水晶，要求6天之内完成。按照这一要求，工人们必须一天干5天的活才行。为此，他们连续干了6天6夜。选矿车间内灯火通明，150多名选矿工埋头于200瓦的选矿灯下，精挑细选，顾不上睡觉，顾不上回家。选矿车间外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200多名辅助工在进行粗选，摆放，给车间内送矿石，一条龙流水线操作有条不紊。连食堂都不敢懈怠，包子、馒头、米饭，花样翻新，全力搞好后勤工作。

朱万珍说：“我们几乎6天6夜没睡觉，因为毛主席逝世，大家太悲痛了，一边干活一边眼泪就簌簌下来了，我们对毛主席真是太热爱了。车间里95%的选矿工人是女同志，所以一片哭声。”那几天，600平方米车间里的气氛是肃穆的，是繁忙的，大家铆足了劲为“一号任务”做贡献。

袁兴全说，“我们那时候只讲贡献，不讲价钱，矿里看大家辛苦，每天补助每人五角钱，但没有一个人去领。”

选矿工人加班加点，终于在6天之内选好了第一批5吨特级、一级天然水晶，从白塔埠机场用军用飞机空运到北京。

第二批任务是7天选出8吨优质水晶。选矿是件技术性很强的细活，必须把粗选的毛料，用特制的小铁锤剥掉外皮，然后用肉眼凭经验去判断晶体里有无杂质，反复挑选，层层把关——每块水晶都要经过选料人自查、矿里职工检查、质检人员抽查、入库时再查四道验收工序。最后还有国家有关方面专家一一检验，负责把总关。时隔几天，第二批矿石如期用火车运往北京。





从1976年9月到11月15日,从东海用飞机和火车直接运到北京的特级和一级优质天然水晶共25.2吨,此外,又从东海调运5吨水晶去上海新沪玻璃厂,5吨水晶到锦州。

朱万珍说:“这是一次不计代价的政治任务,水晶矿石淘汰率相当高,达到75%以上,一块拳头大的二级水晶,要按往常,就是成品了,可是制造水晶棺的水晶要求太高,二级水晶还要‘骨头里找肉’,带交口的部分不能要,带花纹的像工艺水晶的部分不能要,这样再敲掉几部分,只剩下指甲盖大小的一级、特级水晶,其余水晶全部弃用。300多吨水晶矿石只选出了35.2吨可用水晶,我们都把这叫‘杀鸡取卵’。当然了,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状况下,成本是不考虑的。”

朱万珍清楚地记得选矿任务完成的时间——1976年11月15日夜12点,他们一夜未眠,次日一早6点天还没亮,105矿的工人就敲锣打鼓去县政府报喜。20多天的日夜奋战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谁不欢欣,谁不激动?

1977年5月,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建设指挥部给105矿全体选矿工人颁发了表彰证书,证书上写道:“东海一〇五矿选矿全体同志:在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建设中,你们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贡献,特此予以表扬。”

这张表彰证书,30年来,袁兴全一直珍藏着。袁兴全说,东海人民献出的不仅仅是水晶,还有一颗颗水晶样的心啊!

另一支制作水晶棺的队伍也同时行动了。这个任务中央下达给了北京玻璃总厂、上海新沪玻璃厂和锦州155厂。北京玻璃总厂负责水晶棺盖和前后堵头的研制,上海新沪玻璃厂和锦州155厂负责水晶棺两侧和底部棺板的研制,最后将这些部分整体拼装。

北京玻璃总厂决定首先由608厂尽快提出棺体造型、水晶棺内照明系统以及和遗体保护相配套的控制系统工作方案。603厂和605厂共同研制棺体的光学玻璃和水晶板材毛坯;608厂还要负责水晶棺棺体的光学冷加工(研磨、抛光、成型)和瞻仰厅照明设备光学元件的加工、安装和参加整体调试。

曾在605厂技术科理化实验室任职的曹金瑞工程师是江苏海安人,当时他为躲地震带着妻儿回了海安老家,毛主席逝世十多天后,被紧急召回,参加了水晶棺的研制工作。

他回忆说,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用10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水晶棺的全部研制工作,他回到厂里时,605厂的相关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即刻加入了这场“会战”。

水晶棺棺盖成品的厚度要求为30毫米,长度要求2.4米,宽度要求约1米。这样大面积的水晶板对于当时只能做小块水晶薄板的605厂而言是个技术难关。技术人员经过多次实验,制成一块长、宽均符合规格的水晶板,但是厚度仅有10毫米,未能达标。返工!曹金瑞说,当时正值1976年的寒冬腊月,工人们穿着厚厚的金属防热服,一干就是一宿,经常大汗淋漓。

第二个试制品在自然光的照射下,用肉眼可见的气泡和瑕疵多得不可胜数,只好再判“死刑”。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经验丰富的老技工徐兆彩发明了“打砣—模压—拼接”新工

艺,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10个月后,他们终于制成了达标的水晶板。

关于整个水晶棺所用的材料,曹金瑞回忆说,开始实验时想选用海南水晶,后来又决定选用纯度更优的东海水晶。所有材料的各项指标都是由605厂理化实验室逐一验定的。这些指标包括:剩余应力(即水晶棺随着周围气温硬度发生变化的情况),气泡情况,是否有白点以及“云块”瑕疵。这些高指标只有东海水晶才能达到。而实验的一次次失败,造成优质水晶用量极大。

所有的板材完成做工后,由北京玻璃研究所完成水晶棺整体的黏结、镀膜等最后的工序,水晶棺制成了!

据全程拍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的《中国劳动保障报》高级记者安佑忠回忆,毛主席的遗体在一个代号为769的地方存放了快一年后,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才制成移进毛主席纪念堂。8月19日晚上,毛主席遗体移放到水晶棺里。8月20日开始有人瞻仰。

作为制作水晶棺的功臣,曹金瑞、杨俊英等605厂工作人员被特许近距离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105矿车间支部书记袁兴全作为代表,在县委副书记姜其温的带领下,和黄川公社党委书记黄承光、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东海县建筑部门的一位姓李的同志一行四人也乘车北上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他们是东海县首批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也是全国最早获此殊荣的人。

看到毛主席安详的遗容和晶莹剔透的水晶棺,回想起带着感情挑选水晶、研制水晶棺的日日夜夜,大家无不心潮澎湃,不知不觉中,双眼已被泪水模糊。

如今,走进庄严肃穆的毛泽东纪念馆,就可以看到在泰山磨光黑色花岗岩基座上,由东海水晶制成的水晶棺正在为毛泽东遗体的保存、防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的水晶棺还有效地克服了一般水晶体反射光线、影响视线的缺陷,看上去透明度很高。大家知道,凡物体表面达到一定光洁度,就会产生类似镜面的反射光效应,水晶也不例外。在国外,列宁、胡志明的水晶棺由于没能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棺体只能做成上大下小的倒梯形,以尽量避免视觉反射。我国科研人员发明的真空镀膜工艺,让光线尽可能避开水晶晶体,而不产生反射。

当然,毛主席水晶棺的奥秘还远不止此。为了便于人们瞻仰,水晶棺内光的强度必须大于外部。为此,中科院开发出一套投光仪,其光源在距水晶棺4米之外,用光纤制成传光束,传输进水晶棺内,传输的光线被滤掉了红外线、紫外线,以免对遗体有丝毫损害。更为奇妙的是,水晶棺内的光线,从遗体两侧照在水晶棺顶板上,那里有两排人们不易察觉的反光板,由它们把光线反射到遗体上,人们只觉得棺内通体明亮,却不知光来自何方,堪称一绝。

此外,由于东海水晶导热快、比热小、硬度大等特殊的性质,使得毛泽东水晶棺还具有防震、防湿、防腐、防热、防菌、防止遗体失水过多等独特的天然功能。

(作者单位:苍梧晚报社)





难得的一次外事采访

——陪同许耀林书记接待日本避风渔轮纪事

※张学贤

在我一生中,有一次外事采访活动,那就是1956年陪同市委第二书记许耀林同志接待日本渔轮在连云港躲避台风,并为新华社代发一条简讯。

时间在1956年夏季,某天中国气象部门发布一条强台风警报。当天下午,国家有关部门就接到日本方面的急电,说明有60多艘渔轮正在海上作业,要求到靠近的江苏连云港和山东的青岛港避风。

市委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急电后,当即作了慎重的研究,鉴于我国尚未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接待过程中可能发生一些复杂情况,决定由市委第二书记许耀林同志亲自出面,同时,市委又接到新华社南京分社来电,要求市委安排人员代新华社发一条接待日本渔轮躲避台风的简讯。由于我是宣传部的通讯干部,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有幸陪同许书记一道接待日本避风渔轮。

许耀林书记,山东日照人,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先后任滨海军区敌工干事,第一武工队政治指导员,陇海武工大队政治委员,在新海连边沿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曾受到山东滨海地区党委和军区的通报表扬。1948年11月7日,随同谷牧同志前来接管新海连地区,1952年起先后任中共新海连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代理书记、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副书记。

我调市委机关工作仅有半年,和许书记接触不多,但每次见面,许书记都会微笑地点点头,给人一种亲切感。在去连云港的途中,我开始有点拘谨。许书记一面看有关材料,一面亲切地和我交谈。先问我有没有出过海,有没有见过日本人。而后慢声细语地告诉我:日本军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但日本人民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这次接待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由于中日还没有建交,所以我这次出面是以新海连市渔民协会会长的身分出现,不要叫书记职务;连云港是军港,在接待中还要谨慎细心,不排斥在这些日本渔民中混有刺探我国情报的特工;接待日本渔民,要有会讲日语的翻译,市委商定请锦屏磷矿崔毓珊同志当翻译,崔毓珊同志解放前在锦屏磷矿曾为日本人干过事,但解放后思想转变很快,要求进步,向党靠拢,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要充分信任他。最后许书记再三叮咛,

明天可能出海,要我注意安全。许书记的细心交代和亲切关怀,让我感到特别温暖,一切顾虑都打消了。

第二天早晨,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许书记和连云区委书记徐河均、市水产局长王太纲以及连云港港务局的负责同志乘港口引航船到锚地看望日本渔民。先后登上两艘渔轮,详细询问了日本渔民的生活情况和困难,要他们放心避风,并约请日本渔轮派代表上岸参观座谈。

当天中午十时许,在连云港港务局礼堂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开始日本渔民代表神情有些紧张(可能是怕中国人算日本军国主义老账),直到听了许书记代表渔民协会的讲话,看到中国工作人员热情友好的态度,特别是当场定下对日本渔轮短缺的柴油、淡水和部分食品满足供应的清单之后,才眉开眼笑,争着发言,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渔民协会的关心和支持。其中有个日本渔民,在日军占领时到过连云港,还大谈其感受。他说,我对连云港口岸很熟悉,不用引航也能安全靠岸。过去连云港码头到处都是垃圾,码头工人衣衫破旧,面黄肌瘦;现在港口整齐清洁,工人都穿上工作服,身体很健壮,赞扬中国政府会管理,关心劳工,使港口大变样。

时近中午,连云港港务局做几道菜招待日本渔民。我利用吃午饭的时间请许书记审阅我为新华社代写的稿件。当得知我要等到电讯稿发出去才能回来吃饭时,许书记道一声辛苦了,并告知有关同志为我留下热饭热菜,让我感动不已。当时我饿着肚子使劲往半山上爬,赶到连云港邮电分局已是中午十二时,正在值班的同志粗读文稿,知道事情重要,决定推迟下班时间,帮助我把电文发出。

第二天早晨,这条近300字的简讯以新华社电讯的名义发往全国,通告世界,表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热情友好地接待到连云港躲避台风的三十多艘日本渔轮,并尽力帮助他们解决急需的饮水、食品和柴油等物资。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过去51个年头,许多事情逐渐淡忘了,惟有陪同许耀林书记接待日本避风渔轮以及接待过程中许书记给我亲切关怀、细心指导的情景,还清清楚楚地记在脑海里。

(作者单位:市委统战部)



在抗战中参军的父亲：

“想到牺牲的战友，我就难过”

※殷 然

我的父亲，1928年6月出生，属龙，今年恰是80虚岁，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也可叫他达到80岁了。在那灰红、褪了色的由第一任新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的《兵役证》上，记录着他的名字并明确地写上他参军的时间：1944年8月至1947年11月，部队：灌云盐警团、陆军104团，军事专业：步机枪手，职务：步枪手。对于父亲，今年8月1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面对一个早年参军的父亲，面对一个普通朴素的父亲，面对已经两鬓斑白的老父，面对有着艰苦的“当兵经历”的老父，我此时感慨不已，一种无形的意识提醒我，写一点关于父亲当兵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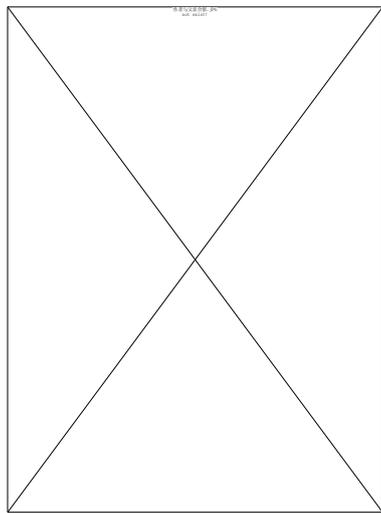
我的父亲叫殷可林，家住灌云县南岗乡（原叫陡沟区南岗乡）殷口村。听他讲，他16岁参军，即1944年8月，已是抗日战争的后期。他说他是被我的祖父动员去参军的。我的祖父早年也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也较早。国难当头，我的祖父参加革命不久，就动员我的父亲也去参军，去为抗战、为解放战争作贡献。

父亲说：那个年代参军很简单，几乎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说愿意革命，愿意为人民、为祖国献身就行；愿意打鬼子、灭汉奸就行。他第一天晚上被我的祖父领到部队，就算参军了，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员了。到了第二天，就开始和敌人打仗了。父亲是陆军，属于地方性部队，是当地区县委领导的地方性武装，但正规编制番号也在上面。他说：有一个第一天晚上和他见面，一起参军的战友，第二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这是很不幸的事。但那个年代，谁只要当了兵，就不怕死，就不把“死”考虑得重要了。那个时候，日本鬼子处于防御阶段，我军开始局部反攻了。所以战争形势对于我军有利。父亲的部队主要是打击路过敌后的敌人和有步骤地消灭地方汉奸势力。

听父亲讲：那个年代，当兵的确苦，主要生活艰苦，吃的、穿的都不好，能吃到粗粮（如：粗加工的玉米、小麦、山芋干）就不错了，更谈不上大米、白面了。他当兵前2年没有吃过一次大米饭。武器也是很简单、陈旧，多数是上级从日本鬼子缴获发放，或从汉奸那里缴获来的。有时候为了迷惑敌人，晚上行军时，还故意用木棍拴在没有拿到真枪的战士身上，以说明我军武器齐全。在一个晚上，他们攻打敌人炮楼，为了营造声势，他们专门从老农那里购了陈旧的鞭炮点燃，以让敌人知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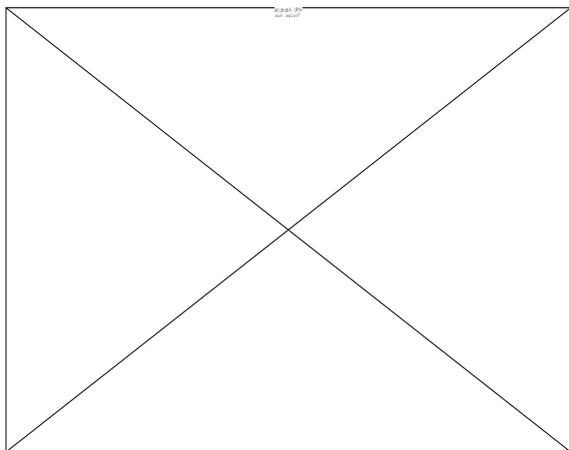
军火力尚可。他说，那个年代，军民感情的确深厚，如同鱼水情一点不假。一个晚上，他们部队分成几个小组撤退。他那个小组来到了伊山北面（可能是现在的灌云县仲集那里）村庄的一个老农家，那个老农起初很害怕，以为是汉奸装扮成“共军部队”，不敢接待。后来，一听他们解释，看证件，探“口气”，老农确信是自己的队伍，才热情地接待他们。尽管没有好吃的，但他毕竟把自家仅有的一斤多玉米面拿出来弄饼，又煮了一些黄豆，供父亲他们吃。事后，父亲那个小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那老农说，“暂时我们部队无粮还你，也没有钱给你，就打了借条给你，待战斗（战争）结束一定折价还上。”说着，他们小组的组长就将写好的借条、让老农收下。那个老农不肯收，说：“人民军队为人民，打鬼子，打汉奸，我们应该支援，俺那点玉米、黄豆不算什么了。”但，最后还是被他们动员收下了那个借条。可见，当时的军队军纪多么严格，群众与军队感情多么深厚。

在战争年代，父亲也负过伤。那是在1947年5月，一次打沭阳某集镇的战斗中，正开始冲锋时，他头部被敌人榴弹炮弹片击中，当场流血昏倒。被担架队队员抬到一个老农家，由部队卫生员进行包扎。随后，在那老农家养了两天伤，就随部队



2005年9月，祖孙三代合影





父亲悉心珍藏的《兵役证》

出发了。当时,部队卫生员只开了一个证明,是用灰白色的小字条写的,证明父亲在那次战斗中负过伤。

自从那次负伤后,父亲一直感到头痛疼,特别在寒天、阴雨天更明显。可能是那时医疗条件差没有及时疗养,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所致。由于那时部队行动不稳定,生活上时饱时饥,时冷时热,致使他早年就患了胃病,至今他还习惯用炒熟的姜糖治胃痛。但他也不在乎这些。他说,比起那些当场牺牲的人来说,算是幸运多了。以后,他们随部队,在灌云县城周围与国民党残余部队、地方流亡土匪又打了几次小仗。

他说,后来他们部队不少人南下渡江打老蒋,父亲本来也报名要去。可惜,部队首长说:你负过伤,不去为好。再加上我的奶奶需要人照顾,又向部队说过此事。部队最终决定让父亲留下,复员到地方,参加土改。自那时起,父亲就脱下军装,在农村参加土改,当村干部,当生产队干部,当农民,直到现在。全国解放后,部队开始发放、补发兵役证,我的父亲顺利地拿到了由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的《兵役证》,那张对于他来说是很珍贵的证件,至今他还完整地保存着。

父亲拿到这样的兵役证,感到很光荣、很自豪。他说:他毕竟在青年时代为国家当过兵、打过仗。当部队和民政部门开始登记发放军人残废证时,父亲却因为那“负伤证明”遗失,未能拿到残废证。按规定,父亲那次负伤,把卫生员开的“证明”要是保管好,收藏好,起码能评上三等“残废军人”。可惜,他当时把那个“负伤证明”带回家后,被我奶奶放在碗底上,弄湿后,奶奶以为不是“重要”、不是“值钱”的东西,就扔掉了。这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一大后悔。今年50多岁的我大姐说:如果那“证明”不遗失,父亲现在会多拿不少补贴呢。对于父亲,也是一种后悔之事。他后来到处“奔波”,找了许多战友、同乡写了书面证明,还是没有起“效用”。因为,部队和民政部门只能认“原件”。自那以后,父亲也就安下心来,不再为那事“奔波”了。他说,办不了残废证,这无所谓,比起那些死去的战友,比起家乡大江南下渡江作战牺牲的人(注:在我们村有渡江作战牺牲的人),他感到自己还是幸运的,还是幸福的。他时常对我们说:他一想到牺牲的战友,我就难过。

父亲虽然没有拿到补发的军人残废证,但,我们家庭都因

父亲有着“参军”的经历,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不少优待和照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母亲患病住院,听我大姐说,在县城医院住了近两年,医疗费用全由政府减免掉。在那个生产队“大集体经济”的年代,我家每年也得到政府补助给父亲不少工分。所以父亲说:虽然没有拿到残废证,但政府对我们不错,是对得起我们的。改革开放后,父亲拿着“兵役证”到民政部门办理了定期领取补助的手续、证件,从每月拿17元到现在每月领取300多元,从未间断领过。有时候还领过临时补助的大米、白面、衣物等。在晚年,他还被民政部门几次邀请到老军人疗养院(灌云大伊山北)进行疗养。

前年(2005年),父亲领到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一枚,同时还领到一次性优抚金1000元。他说,领到这样的纪念章,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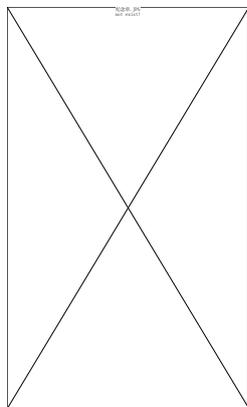
父亲有时看到电影上反映战争年代的镜头,感叹地、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说:其实真正的战争比那还要艰苦,战斗比那还要残酷,敌人比那还要狡猾,还要厉害。共产党打下的江山,都是千千万万像他那些牺牲的战友和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要求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我妈去世早,在我2岁时,就因病离我们而去了。从那时起,父亲一个人将我们姐弟四人带大成人。如今各自成了家,过着和谐的生活。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未续娶,现在他仍然一个人过。我们要求他到我们任何一家过,他都不肯。他说,自己能过最好,不想麻烦你们。他说主要也想活动活动。自己动手,何尝不可?到实在不行再说,再“麻烦”你们。我经常抽时间回家看看老父,经常叮嘱他要注意保重身体。

父亲对我们教育也很严,常对我说:凡事要想开些,要多做好事,要好好工作,要好好做人,要向好人好事学习,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这就是一个已经80岁的老军人的朴素话语。我为有这样一位普通的当过兵的父亲而自豪。但我很少向人说起我的父亲,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一个抗战中参军者的儿子。愿我的父亲健康、愉快地安度晚年。

(作者单位:市国税局)



父亲领到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呼唤少昊

——鸟王国的追念

※李洪甫

我国最早的一部区域地理书《禹贡》里，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讲述：四五千年的上古时期，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岛连云港地区的云台山因盛产美丽的羽毛而闻名，因此云台山脉又称“羽山”，即《禹贡》所称：羽山的山谷里，鸟类有着五彩的羽毛。在众多的鸟禽里，凶猛的鸷鸟，主宰着这个鸟的世界，它是东夷族首领少昊的象征。“少昊，姓己或说姓嬴，名挚”，生活在海上云台山岛的少昊先民，源于原始宗教中的动物崇拜意识，他们奉鸷鸟为自己的祖先，对鸷和各种各样的鸟，部落中规定禁杀、禁食、禁用等严格的戒律。以至“群鸟从师万数”。——跟从万数的群鸟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鸟的队伍。强悍的鸷化作美丽长尾的风鸟，在高山深海之间，继续统治着这个鸟的天下。数千年后，文思飞扬的《山海经》为它发出诗一般的赞美：“东方海外之大壑，少昊之国”；汉代的儒学大师许慎叹羨这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是“东方君子之国”。

人类学家依循史书和古文献的记录，参证考古学的比勘，走近少昊方国——崇拜鸟、模拟鸟的这个部落的领袖，以及与众不同的特殊成员头上都插着长而美丽的羽毛。他们所画的人面图像、眼睛、鼻梁也描摹鸟的形状，甚至在他们的用具上

都模仿鸟的神态而制作图案，并且以鸟名为官名，分掌各职。《左传》用赞羨的笔墨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公元前524年，云台山所在的郯国的君主到鲁国去朝拜，宴会之间，在鲁国做官的孔子向这位少昊的后裔郯国君主请教他们的官职制度，并向少昊为什么要用鸟作为官职的名称。我们从郯子对祖先的追溯的长篇叙述中，看到各个官职皆用玄鸟、青鸟、丹鸟、睢鸠等鸟的名字称呼。如凤鸟管历法，祝鸠为司徒，荒鸠作司空，睢鸠当司马……还有的鸟名官职负责民事、分掌工、农……这些官员的任命，是依据当时人类对各种鸟的习性、职能以及和农业关联的认识而决定的。比如负责掌管春分、秋分“司分”的“玄鸟”就是“鹤”。负责掌管夏至、冬至“司至”的伯赵氏，就是鸠，即今之布谷。用某种鸟命名的官员以及他们的民族，都以这种鸟为图腾和族徽；甚至奉为祖先……

翻检少昊的史册，还有一篇壮远而高迈的少昊礼赞尤其惹人注目，他的作者居然是那位幽怨满怀、能够七步成诗的建安才子曹子建。也许，在曹植的心目中，少昊的弘远和贤能比洛神的俊逸和美曜更加令人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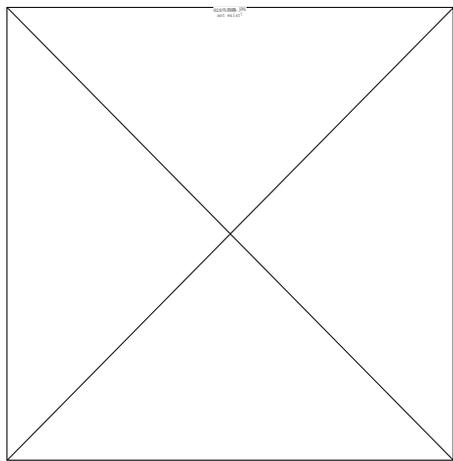
少昊，从古史传说走进信史正册；从《左传》、《尸子》和《拾遗记》的记录走进孔丘、司马迁和曹植的笔端。

少昊王国的中心在连云港

几千年来，伴着那汹涌的波澜和不息的海潮，云台山间栖息着一个动物世界里的鸟王国，也维系了人类对鸟王国的神往和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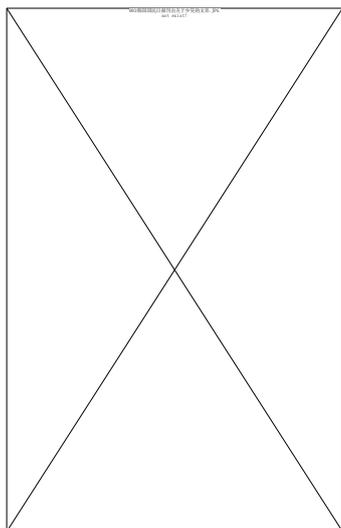
少昊对它的各个分支都赐以各种羽毛装饰，作为威严的象征。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原的周王朝建立以后，统治势力达到了东方，少昊遗国被迫向朝廷贡奉美丽的长尾羽毛。直到明代，云台山区给朝廷的贡奉，每年有“翎毛四万一千一百九十根”。

少昊是一头鹰鸷，少昊氏的动物崇拜是鸟。连云港市胸山出土的画像石，是我国早期的画像石之一，画面上，俊美的凤鸟赫然在目。



鸟图腾图





韩国国民日报刊出的关于少昊的文章

将军崖岩画的c组中,鸟图腾崇拜的形象十分鲜明,鸟头人面的头顶上刻有三根长长的羽毛和美丽的装饰圆球,状如鸚鸟的面盘,与史籍记载的鸟王正相契合。鸞为鹰一类凶猛能击杀搏打的猛禽。据鸟类学者周本湘教授的研究:鸟类中唯有这类鸚鸟能够和人的眼睛一样双目单视,其他的鸟所看到的物象皆为复视。这应当就是鸞被奉为鸟王国图腾崇拜的原因。周本湘教授还认为:“这种‘鸞’,是鸚形目的‘鹰鸞’,其形似鹰又似鸚。”此鸟至今在云台山中还常常见到,而在候鸟迁徙时则更多。二涧、大村、朝阳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埋藏着的丰富的鸚鸟头形鼎足,正是先民们鸟崇拜意识的集中反映。

少昊的“昊”字,就是一个头顶太阳的人,少昊氏的天体崇拜是太阳——

云台山东磊姆河顶还有一块太阳石,坐于少昊族人祭祀太阳的地方。石长7.5米,宽2-4米,右上方刻一直径为25厘米的圆圈,内镌一鸟形图案,它是反映少昊天体崇拜的族徽,族徽下方还刻一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我国历来以鸟象征太阳,汉代绘画的太阳图中大多画一只金乌,古人说太阳落山叫“金乌西坠”,就是把太阳比作金乌。云台山太阳石上画的鸟图太阳,正是这种认识的起源。太阳石的附近,有一龙潭山涧,古称“凤凰窝”,相沿已久。这使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凤鸟适至,故化于鸟”以及少昊国官员“凤鸟氏”的史迹在这个日出之处的遗存。

少昊领导着一个定居在农业部落,少昊氏的地母崇拜尤其执着——

在方圆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山地上,遍布着将军崖岩画、太阳石岩画、孔望山岩画、大伊山岩画、东海蛇纹卵石岩画等近10处祈求地物收成社崇拜原始遗迹……

正当少昊受到多方关注的时候,鸟王国在历史隧道另一端似乎在表述着某种感应。

根据中云乡文化站退休干部,多年的“博物馆之友”王继澄同志在华盖山南麓发现的陶片、鸟头形器钮以及石器工具,我们勘察了出土现场,认定这里埋藏着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尤

其重要的是,观察地层的剖面可以得知,地表20厘米厚的耕土层下面就是45厘米厚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各种遗物都埋藏在这层灰色的土壤中。文化层下为黄砂土层,再下是海淤层以及黄土层。

龙山文化的典型代表物鸟头形鼎足在这个遗址里出土有60个之多,长7厘米、宽4厘米,呈半圆锥形体。用指甲捺印纹表现的粗壮有力的鸟喙以及两侧用圆孔表现的鸟眼睛,形象逼真、神情威武,极像鹰鸞的面容。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灰陶鸟头形器钮,高4厘米、宽3厘米,鸟嘴微张,圆圆的眼睛用黑色圆点表示,惜颈部以下残缺。鸟头形鼎足的大量出土以及鸟头形器钮的发现和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石刻鸟头图案一样,都充分、鲜明地反映了居住在古代云台山地区少昊氏族先民的鸟图腾崇拜,他们以鹰鸞为鸟王,奉鸟王为祖先。

从遗址中采集到的石斧、石镞等生产工具形制也颇具特色,为云台山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断代提供了类比依据。此处遗址地层的层理十分清晰,对黄海岩岸地质、地理及至动物、古人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5年之后,在这里的同一个地点,清理出来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的住址,人们期望它是少昊方国的一座原始城堡……

云台山的少昊鸟王国披戴着上古的文明,展示着煌煌风采。

少昊的东迁分支

人类学家指述日本、朝鲜种族的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位美国教授声称:与高加索族有关;海同博士提出:与俄罗斯人相像;尼克研究员认为:应和印度的多达人以及澳洲的土番比较。难怪著名的哥温教授感叹:世上种族的混乱,总找不出比日本更甚的了。

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日、韩种族在意识、生产、生活乃至文化等方面均十分规范地袭承少昊氏。少昊崇日,昊字就是一个头顶太阳的人,韩国的国旗与少昊祭日处东磊太阳石图案就有着明显的相通。而日本从国名到国旗皆与太阳有关,日本民族将日主神作为最关重要的“天照大御神”,高丽卵生始祖神话中,也特别强调有日光的照耀。

少昊是创造稻作文化的农业部落,出于丰收的祈望,崇尚“社”。《左传》记载少昊地域有一千处社神,连云港的将军崖、孔望山以及徐州铜山丘湾的社祭遗迹一直保存至今。朝鲜半岛则长期地把“社”作为地方的基层单位。日本不仅到处有社,且把社神奉作“国常之尊”。笔者曾于1983年提出连云港等东部沿海山地是世界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众多的论证中,以将军崖岩画中的禾苗图案为例指出其对穗神的崇祀,这种崇祀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日本神话中的5个男神,有一个叫天穗日命,日本皇孙也称作“米多王子”。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通口曾以气候寒冷否认苏北为稻作文化的传播源,而假轮虫化石,扬子鳄遗骸在连云港地域的发现,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古代苏北地区的气候相当于今之江浙地区,气温比今天高3-4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250毫米,最宜于水稻的种植。少昊王国对所属的各个部族都赐以羽毛作为威严的装饰,包





括东迁入海的分支,你看:日本岛最早种植水稻的农业部落所刻划的有羽毛装饰的鸟头人面,朝鲜半岛至今仍然保留下来的羽毛送死的葬俗,新罗王贵族诞生的神话居然也是鸟蛋的孵化……

少昊以鸟为先祖的图腾崇拜受到日、朝民族最深刻、最广泛的袭承。朝鲜半岛南北皆有“插二鸟羽”的习俗。韩国大田市出土的青铜锄上还刻有一个以尾羽装饰的人像。日本崇尚鸟图腾的实物有更多的出土:鸟形人画、鸟装祭司……现存载述日本神话最早的《日本书记》还将鸟和太阳当作二者同生的“大神”。日、朝民族鸟崇拜的共同之处是将鸟生始祖紧密地和太阳联系:“因奉天祖命降居,见鸽翎相交,遂悟婚媾,生大日灵尊,素盞鸟尊……”

尤令人惊异的是,日、朝民族对少昊人特殊的拔牙习俗之沿袭竟无丝毫的移易:不分男女,拔牙均在青春期内进行,所拔的位置也完全相同。至于少昊氏的纹身,则在《三国志》的《倭·韩》中有着十分清晰的指述。朝鲜半岛上积石为封的葬俗也与少昊地区的石棺葬有着鲜明的共通。

大量的少昊文化遗存在日、朝地区的出土成为少昊东迁的实证,东迁分支在磨棒、有肩石铲等石器工具以及陶器的质地、纹饰乃至工艺风格上的严谨的继承,无不标示着少昊氏的种族烙印。

笔者通过汉代古籍的勘正,还曾推断日本之倭人等于“远方的郁人”,亦即“迁徙的郁夷人”,郁夷即云台山间的隅夷、羽夷——直到今天,云台山间的郁姓还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族。二十五年前,笔者提出少昊之中心不在曲阜应在羽山,曾遇到激烈的反对,如今,这一观点除了大量地被征引外,连少昊陵所在地曲阜的学者们也同意不能把少昊之虚确认在曲阜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是可贵的。1999年7月,日、韩地区的许多报纸、电视台相继报导了笔者关于日、朝种族起源的推断,并且指出:少昊东迁分支的起源地与新亚欧陆桥门户地位的复合,是巧合;但更重要的,是史实。

鸟王国的思念

很久很久以前——用地质家的话说,大约是18亿年前,浩瀚的大海就围抱着连绵的云台山岛。成千上万的飞禽栖息在此。后来,造物主又使海岸线发生重大的变迁,云台山的主体与陆地相连,鸟群退回到至今仍沐浴于汪洋之中的前山岛、达捻山岛、车牛山岛、平山岛。虽然,数量已大大地减少,但是,据现代鸟类学家的考察,各种鸟还有20目,40科,128种。

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鸟王国,然而,它是一个衰落的王国,国土和国民都在减少,我珍视今日的鸟国,但我更思念那唯一被载入中国古代史的少昊鸟王国。

我追緬这位被列为三皇五帝之一的少昊氏,一个庞大、健全而勤政的国家机器使我为之惊讶:在这个名为少昊的国度里,国王有着无比的尊严,统帅着相当于民政、司法、财税、工程、农事、气象、历法的管理官员。

这个机构严谨、官员们各司其职的王国,曾被春秋列国所钦羨,也为孔夫子所叹服……

它还是一个与动物世界的鸟国相依共处的人类世界中以鸟为图腾的王国。这使我想到今天世界各国都特别看重的生态维系,想到动物的保护,想到每年春天的必有的爱鸟周……你看:将军崖岩画上的鸟头图,太阳石岩画上的三足鸟刻画,云台山间出土的鸟头形鼎足,桃花涧汉画像石上的凤鸟栖树……这些古物刻画牵绕着历史上少昊人及其遗民对祖先敬祀的虔诚,蕴含着少昊先民浓郁的乡情,是一种执着的鸟王国的思念。

从早期的编年史《左传》到清代乾嘉学派的著述,都众口一词地认为少昊的中心在曲阜,海州的地方志居然也自认海州只是“少昊氏遗墟”。

借助中华文化里的煌煌史籍,依靠家乡的文物遗存,我把得天独厚的少昊中心鸟王国向今天的人类展示:1981年,《少昊之虚辨》发表,全国最大的资料中心转录;1982年,《少昊氏稽索》刊出;1983年,专门研究云台山鸟类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动物馆馆长周本湘教授主编的《博物》,登出我的《云台山中的鸟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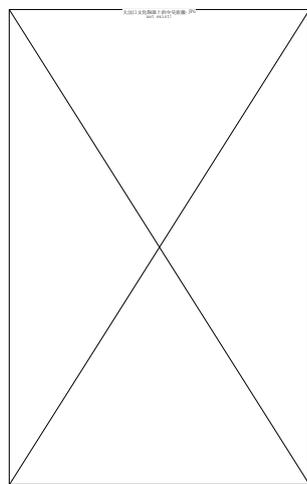
通过对鸟王国分支的稽索,我提出了朝、日民族是少昊氏东迁分支的论述,观点和论据在朝鲜半岛发表后,我很担心在异国的报纸上指述人家的先祖族源,会引起不快和反感。然而,事隔三月,我接到了去韩国讲学的“诚恳邀请”。

到了汉城,疑虑全消。我竟然能领略到更加浓烈的少昊鸟王国的风采和遗韵:传统舞蹈的表演者头上插着巨大的羽毛,少昊鸟族敬祀土地的社神石到处林立,一家专办中国业务的旅行社取名“鸡林”,一位研究古代农史的学者名叫“金圣昊”……满目的鸟族风情,我几乎忘却了身在异国,当我面对着汉城博物馆展厅中的鸟头形鼎足时,我的思绪又飞向了云台山海,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对鸟王国的思念。

多年来,鸟王国在我的心目中,一刻也没有淡忘,每当春花烂漫时,思念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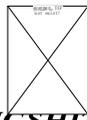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有这种思念,但我知道:这思念,就是东方文化的呼唤!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少昊族徽





板浦盐业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姚祥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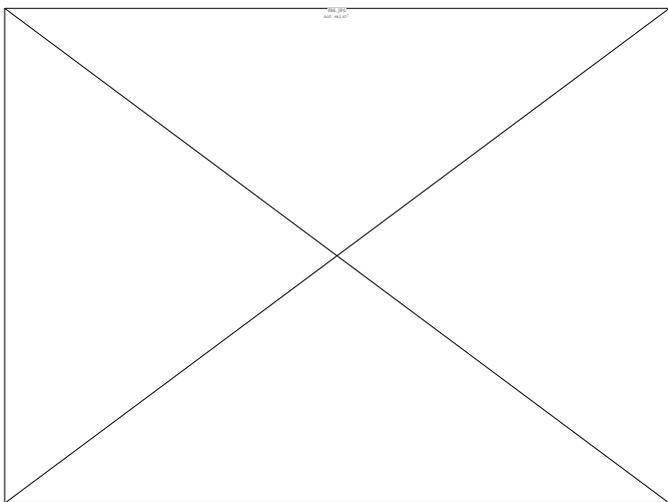
《云台新志》中写道：“东海物华，当以盐为上珍。”小镇板浦之所以能在苏北一带声名远播，究其原因即在盐业。

自西汉时到清末近两千年内，板浦这儿“鱼盐夙号饶”，盐业生产一直兴旺发达，号称“盐池汇宝”、“岁产百万金钱”，为历代朝廷财政赋税的重要源地。民国初年到日寇占领前，板浦仍是有名的淮北“盐都”。“盐兴镇兴，盐衰镇衰”，可谓是对板浦过去两千年兴衰史的高度概括。然而，正是深远厚重的盐文化这个龙头，牵引着板浦的饮食文化、醋文化、名人文化、《镜花缘》文化等本土文化的联动发展，从而谱写出古镇灿烂并富有特色的历史长卷。

在板浦近两千年悠久的盐业史上，能人多多，建树累累，丰碑座座，而尤以明初盐业督办丁永、清道光时两江总督陶澍、民国初年两淮盐运使缪秋杰三人最为突出，业绩最著，贡献最大。可以说，他们在板浦盐业生产发展史上树起了三座不朽的里程碑。

丁永——改煮盐为晒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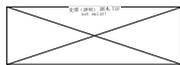
西汉初年，因海岸变迁，板浦一带逐渐现滩成陆，有人居住，他们“靠海吃海”，多以渔盐为生。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文中即载有“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有海盐之饶。”此东海即古海州地区，当然包括灌云板浦一带。1993年4月15日至26日，市、县博物馆人员在板浦城西丁庄一带，对西汉中期“贤良廛”、“三合墩”两座土墩墓进行了发掘，



清理出西汉文物二十余件；近两年，当地村民也多次掘拾到西汉文物。这些证明了西汉时此地即有先民生存繁衍。

武则天垂拱四年开凿的“官河”（明朝后改称盐河），即从产盐区板浦西郊穿过，“盐课所经，官舫估舶，帆樯相望。”宋真宗天禧元年始建板浦场，此时这儿的盐业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板浦场进行了扩建；元惠宗至正六年，黄河夺淮后，淮南暂不宜产盐，板浦场进一步发展壮大，建立“运盐使司”；明洪武二十五年，朝廷设盐课司大使衙门于板浦。

不过，一直到明初，产盐都是原始而传统的“煮盐法”。盐民称为“煎丁”或“灶丁”，煮海为盐，经历引荡刈草、摊灰淋卤、





锅煎釜煮等工序,工艺落后,工作繁重。直到丁永来板浦,才逐步改变这一状况,开始采用先进的滩晒生产方式,使盐业生产有了突破性进展。

丁永约生于明宣德十年,为明初胸阳西海所镇守使丁德兴之侄,他“通商贾兼鱼盐”;明成化三年,三十二岁的丁永被海州府任命为盐督办,便携家小来到板浦场,在城西郊盐河西岸建宅定居。他“创业治家,克开厥后”,率领灶丁兴办盐业。他看到灶丁们“世服熬波之役”,艰辛异常,便开动脑筋,改革创新,在海盐生产工艺上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技术革命,将“炼海”煎熬的传统煮盐法,改为小型砖池(亦称晒格)滩晒方法,后又逐步过渡成以八卦式盐池(俗称“八卦滩”)为代表的泥池滩制盐,通过“引潮蓄水”、“落底积卤”,利用太阳辐射能量让海水自然蒸发结晶成盐,大大减轻了灶丁的劳动量。而且,过去熬卤煮盐法产生的是粉末状的小粒盐,滩晒法生产的却是色白、粒大的大颗盐,晶莹、洁净、干爽、品质纯正、调味特鲜,更为人们喜爱,因此声名鹊起,誉传四方。淮北各地盐场皆来取经习之,从此,“淮盐”更驰名天下了。《明史·食货志》上说:“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嘉靖盐法志》则记载曰:“淮北之盐晒于地,其形颗。”丁永改革创新,开海盐滩晒的先河,为板浦场乃至淮北整个盐业的生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名垂青史。

明嘉靖四年,丁永寿登九十而歿,葬于板浦西郊泊汪南寿星墩。后丁氏子孙在此繁衍,称为“丁氏老庄”(现名丁庄,属板浦镇菜园村)。丁永被尊为板浦丁氏一族的始祖。丁永当之无愧地可称为板浦盐业生产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陶澍——改纲盐为票盐

陶澍(1779-1839),清湖南安化人,字子霖,号云汀,嘉庆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升御史,历任户部、吏部给事中;道光时任两江总督。

当时,淮盐疲弊已成痼疾,盐商垄断,官引滞销,“盐务日坏”;“积盐高于山,求售苦无路;江岸距豺狼,场垣窜狐兔;商困民益穷,饥寒啼妇孺。”陶澍即委派幕僚魏源到海州视察盐业产销情况。道光十二年四月,陶澍首次阅兵海州,即“亲临盐池,谘取利弊”,多次上奏朝廷,要求“整顿嵯纲”,“筹票盐以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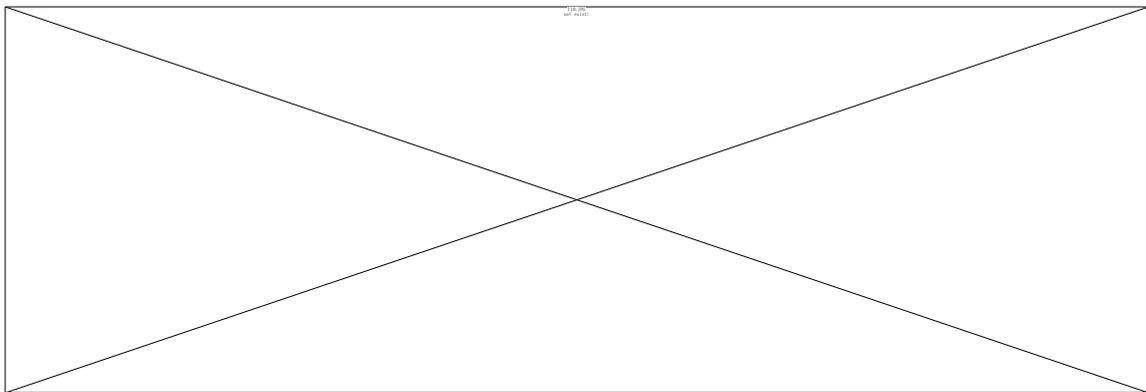
之。”道光皇帝准奏,加封陶澍为太子少保兼管盐政。陶澍在板浦“周览场灶”,深入调研,决定在板浦场试行票盐法,并委任魏源具体负责。因变革触动了一些贪官污吏和世代独霸盐纲大垣商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抵制和反对。陶澍旗帜鲜明地支持魏源,排除重重干扰,大刀阔斧地实施盐政改革,一年便初见成效。

1835年夏,陶澍再次来“校阅海州东海诸营”,一边讲武察吏,一边经划新嵯,推进改革进程,数年大见成效,“变私盐为官引,化泉匪为善良”,乃至“国课充足,民生乐利,而且兴复水利,培植学校,稗宜宏多,舆论允洽。”魏源曾赞颂此改革是“利国,利民,利商,利灶,为数百年前所未有。”许乔林则在《海州文献录》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回忆十年前之岌岌不可终日,今为乐土乐郊,皆改行票盐之嘉绩也。”

由于陶澍整顿嵯纲,促进了盐业生产发展,“销畅商力舒,民饱课亦裕”,振兴了地方经济,保障了社会稳定,用现在话来说,也就是优化了投资环境。于是,“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尤其是实力雄厚的皖南徽商和山西晋商,也纷纷涌入古镇,施展儒商才华,经营盐业,逐步成了海州盐商的中坚;一些外省外县流动商民看到这儿市井繁华,位置优越,也定居于此经商谋生,使板浦中心河(现新民路)、景阳河(现空心街)、孙家桥一带,商号林立,百业兴旺,真个是“招徕民贩如趋市,口岸随人更便利,十年积滞一朝通,枯鱼穷鸟皆生矣!”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促成了小镇一度时期空前的繁荣。

1839年,陶澍病逝的消息传来,板浦有名的名士才子许乔林、局商王恒源、票贩杨腾等,率绅士民众,上奏呈请将陶澍“入祀名宦并建专祠。”两江总督陈奎据情入奏,得朝廷恩准;海州分司童濂即“奉上谕亲来板浦相地,择于敦善书院之西(今板浦镇东大街东小区中间),建陶公祠,以顺輿情,以彰政绩。”

“陶公祠”庄严肃穆,为古镇当时的二十多座各具特色的寺、庙、宫、堂、院、祠诸建筑之冠。祠中“崇楼”(俗称御书楼)恭摹道光皇帝书赐陶澍的“印心石屋”金字匾额,四壁分嵌镌刻当朝宰相穆彰阿、廉访吴廷琛、尚书朱士彦、中丞乌尔恭等朝廷要员题写的序、赞、诗文;二进“享堂”中书“干国良臣”横额,供奉陶澍影龛;壁上彩绘陶澍的《初巡东海》、《再巡东海》两



盐池图





图;祠内外诸般列峙皆从一品,春秋两祭,每逢十一月三十日陶澍生辰则为官祭。

据说陶澍因为厉行盐政改革,“扫除积弊用良法,改纲盐行票盐”,扬州的一些大盐商“怨陶公入于肺腑,编为叶子戏,讥其家属;又一人以双斧斫桃树(陶澍谐音),妄立名目,以肆诋诽。”并且形成了除夕时伐焚桃树的“顽风”。王焕在《陶澍年谱》卷下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当时蠹商怨公之深,由此可见。”但是,板浦的盐商百姓却一直对陶澍感恩戴德,顶礼膜拜。盐官陈文述曾赋诗言及商民心声:“桓桓陶官保,经济本仁恕。……所荫悉慈云,所润皆甘露;瓣香祝长生,和羹绵福祉。”“饮水思源味始长,恩同再造莫轻忘;良臣第一陶官保,消得长生一瓣香。”

民国二十六年,板浦南郊建成的“秋园”内,在奇葩怒放的花圃和回环幽雅的曲廊中间,还建了一座风格独特的纪念陶澍的“景陶亭”。

缪秋杰——功留去思碑

缪秋杰(1889—1966),字剑霜,号青霞,祖籍江苏江阴。他毕生从事盐务,对中国盐业生产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贡献较大,与民国时的曾仰峰、张绣文、姚元纶一起被誉为中国盐务界“四大金刚”。

1930年,缪秋杰调任江苏淮北盐务稽核所经理,来到淮北盐都板浦。当时,两淮盐务凋敝,产销不畅,板浦这儿也逐步衰落。缪秋杰临危受命,充分施展才能,他坚持“裕国、便民、惠商、恤灶”的宗旨,从大力整治盐务机关作风和严究贪污腐败入手,雷厉风行整顿盐政。他恩威并重,严格而扎实地抓好场务、运务、销务、税务、缉务五大盐政管理,很快就使稽核所风气焕然一新。

1931年2月,两淮盐运使公署(后改称财政部两淮盐务管理局)从扬州移迁板浦,缪秋杰升任两淮盐运使。他相继采取了严办走私、建坨筑路、以轮船铁路取代木船漕运、改善通讯设施、改革装卸制度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多管齐下,务求实效。同时他也给地方上办了不少好事:首先,他将板浦市区原由死河1927年填平所铺的简陋马路,进行了一次彻底整铺,并疏通铺设了两边下水道,还组织养路队,使古镇的环境卫生、交通状况大为改观;接着,又以板浦为中心,整铺好通往中正、临兴各个盐场公署驻地以及通往新浦的公路并通车。此外,还疏浚了运盐河道。1935年,在板浦开通了10门磁式交换机,架设了场区电话线路,线路走向北至新浦17.5公里,南至阜宁101.3公里。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板浦城南淮北盐务首脑机关稽核所,规划营建了一个公园,后被当地文人按缪名字中“秋”字起名为“秋园”。该园自民国十九年动工,到二十六年方具规模,共占地一百多亩,既吸收江南园林的建筑艺术,又有别具一格的海属特色,人工天然,浑然一体,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被誉为“淮北第一名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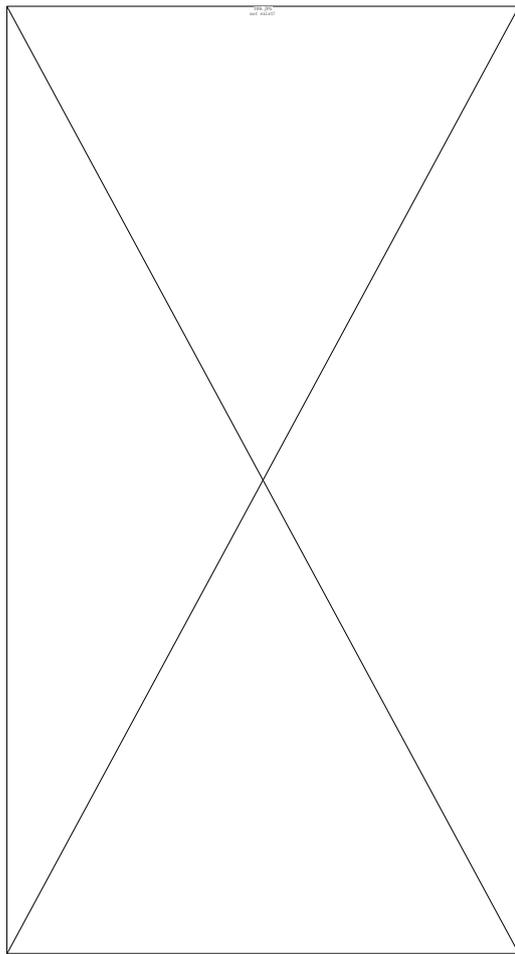
缪秋杰主管淮北盐政期间,功绩卓著,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促使了淮北盐业生产走出困境,再度实现了洼地崛起。淮盐的振兴,也带动了板浦地方经济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发

展,在当时,小镇内商贾辐辏,店铺济济,京广布杂、饭馆酒楼、熟食粮店、中西药房、银行钱庄、旅社货栈等等,星罗棋布,繁华异常。(据统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板浦镇上汇集了6家银行、17家钱庄、两家大银楼、一家大当铺,还有8家保险代理处……)板浦成了当时海州地区最繁华、最富庶、最引人注目的城镇,成了闻名遐迩的“小上海”。这当然少不了缪秋杰主持盐务的功劳。

1935年9月,缪秋杰调任四川盐运使,板浦的绅商各界同仁有感于他对振兴淮盐的建树和对繁荣古镇的贡献,在秋园内“花径”路南的芳草坪前树立了一座“去思碑”,刻上由清末举人、板浦垣商汪乐安(系汪德耀、汪德昭的大伯父)手书的“泽被淮漕”四个大字,以纪念缪氏的功绩。

丁永、陶澍、缪秋杰——这三位历史上的杰出盐官,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善于管理,敢于创新,真抓实干,克难攻坚,对于板浦盐业乃至整个淮盐的生产发展,对于板浦乃至海州甚至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进步,都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板浦盐业史上继往开来的三座“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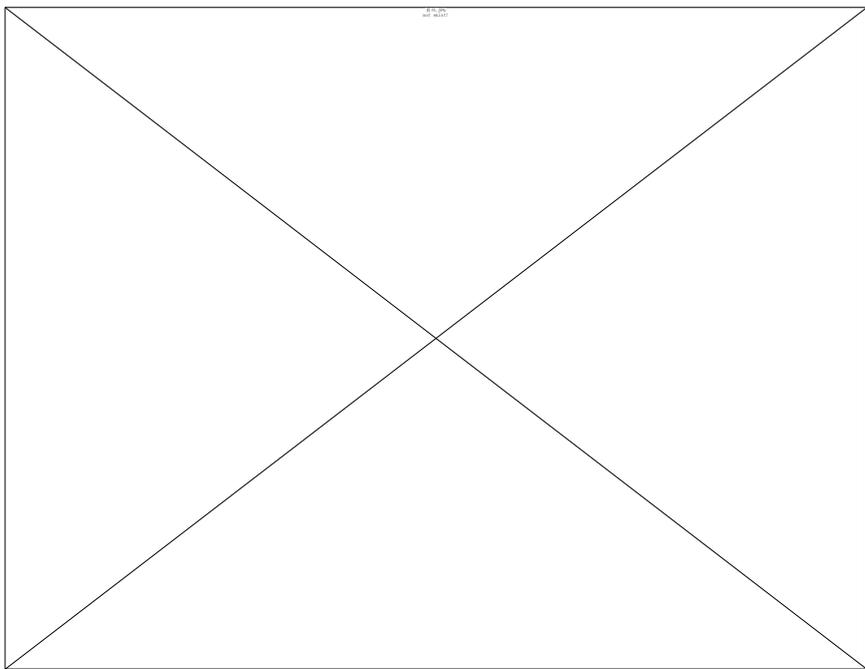
(作者单位:灌云县板浦镇政府)





淮海戏的名丑名旦——杨云发和朱桂洲

※王士娥



名丑名旦在演出

地民间曲调相结合而形成了海州地区的小戏(即淮海剧)和童子戏。海州小戏由于历代老艺人和名演员的改革和发展,由个体挨门逐户卖唱,到组成班组,地摊演出,一直进入城市剧场,登上演出舞台,发展成为今天为全国名剧种之一——淮海剧,历经艰辛,来之不易,淮海戏中的名丑杨云发和名旦朱桂洲,就是淮海戏发展史上由地摊演出,后登大雅之堂舞台演出过程中的有功之人。至于老艺人口耳相传的二百年前的由王、葛、杨姓三人以农民所爱听的故事创造出海州的原始戏曲,又向山东诸城来乞讨的流动艺人学艺,这伙人便成了海州地方剧种的创始人的说法这是不符合文艺的发展规律的,因为一个地方剧种的形成是由本地区的民间文艺的内因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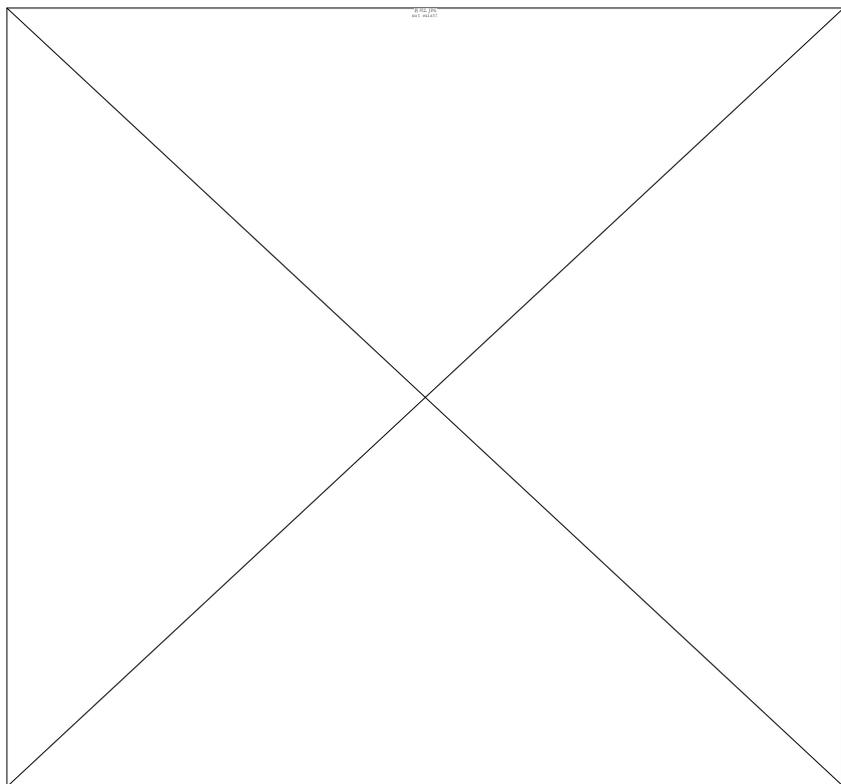
淮海戏,连云港地区的群众称为海州小戏,因为它是古海州地区群众喜闻乐见、观众基础深厚的唯一地方剧种。

淮海戏的形成及发展渊源也很久远,早在周朝末年周孝王、周平王,先后封诸侯于秦地即现在的陕甘宁地区,号称秦川,在这古老的平原上,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这一地区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精神文明。在秦地人民创造的古老文化中,有一种在民间音乐和民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曲调叫“秦腔”,沿着陇海古道(即今新亚欧大陆桥)向东西南北传播,形成了“中路秦腔”(即西安的乱弹)、“南路秦腔”和“东路秦腔”。东路秦腔传播到河南地区和当地的民间曲调相结合而形成了梆子剧种(即河南豫剧);传播到徐州地区和当地民间曲调相结合,形成了徐州梆子和柳琴戏;传播到海州地区和当

主要作用,外因只是起助长作用。不适宜当地土壤气候的种子,是不会发芽成长的,外来的曲调只有被海州人民能接受的东西才能被当地剧种兼收并蓄。淮海戏的乡土艺人,才是地方剧种创始发展的主人。

据淮海戏的研究专家记载,淮海小戏在“打门头词”阶段,就有薛鸿书、潘凤阶、毛殿友等老艺人,解放思想,向当地被称为大戏的京剧艺术学习,一跃登上戏剧舞台。在淮海小戏女角色还处在男扮女装的阶段,小戏中出现了古大娘、耿大扣等一批知名的女演员,对淮海小戏的发展起到很大的转折作用。由于淮海小戏有了女演员,女唱腔开始丰富起来,演员行当,开始专业化,生、旦、净、丑逐步健全,一改过去单一演唱曲调,多了剧情表演。但在创建时期没有服装、道具、音响效果,演员们





名旦朱桂洲

都穿着随身衣,就脚鞋,出场演出,给观众留下深刻的艺术形象。名旦朱桂洲就是穿着随身衣的花褂子表演,又因贫困没有换身的衣服,时间长了名旦朱桂洲就被观众称为“小花褂”,日久也就成了艺名。淮海小戏表演初期,未脱离说唱痕迹,有时演到驴叫、狗吠时,演员都会学驴叫,狗吠形容各种动物的叫声,以衬托剧情的效果,很受观众欢迎。因为这些剧情多是丑角的行当,演丑角的杨云发便成了观众的“名丑”。

淮海戏的名旦朱桂洲和名丑杨云发,都是出生在小戏世家,随着父母流动演唱,而成长,成名。由于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旧社会度过,旧社会小戏艺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不高,生活十分艰苦。朱桂洲的父母,顶烈日,冒严寒,走乡串村演唱小戏,养家糊口。1932年的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冒着狂风大雪,跋涉在近尺深的雪地里,朱桂洲的母亲忽然感到腹痛,即将临产,好不容易坚持到一个村庄,想在一户车屋内临产,被户主以不吉利拒绝,给了几捆高粱秆,簇成一个四面透风的草棚,朱桂洲就在这个地方诞生了。没等三朝,母亲就抱着她流动演唱,不到三个月小云芳(朱桂洲原名叫朱云芳)就折磨出了一场大病,无钱医治,全家在饥寒交迫中曾想把她抛弃,万幸又活下来了。朱桂洲有个姐姐叫朱云兰,也是淮海小戏的主要花旦,和小花褂齐名,叫“大花褂”,弟弟叫朱培鑫,是淮海戏音乐的创新人。为了生活,朱桂洲八岁就开始学戏,由于天资聪敏,十三岁就主演花旦。比她大两岁的名丑杨云发父母也是小戏艺人,常和朱家搭伙演唱。杨云发11岁开始学戏,13岁就主演小丑。因为二人从小在一起玩,学戏时

在一起唱,相亲相爱而结为夫妻,从此这对鸳鸯便在淮海戏中“戏水”了。他们多姿多彩的戏艺,成了淮海地区小戏观众心目中的名旦名丑,由于他们的成名,淮海戏的声誉也随之不断提高。他们和淮海戏的老艺人谷广发等一起从敌占区投入了解放区,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文艺宣传,成为人民的文艺团体,政治地位,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从农村地摊,跃进城市舞台,而且闯进了省城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多次参加省市的戏剧会演,使淮海戏荣立为国家剧种之列,个人也屡次获奖,他们成了淮海小戏发展史上的功臣。

名旦朱桂洲在淮海戏中先后扮演了淮海戏优秀剧目《周公赶桃花》中的桃花,《火烧洪门》中的伍翠红,《三拜堂》中的马婵娟、叶金莲;《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樊梨花点兵》中的樊梨花,《小书馆》中的张五姐,《机房教子》中的秦雪梅,《秋江》中的陈妙常,还有现代剧《红嫂》中的红嫂等角色,精心塑造

了这些剧目中各具特色的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中,朱桂洲既传承了淮海戏中的基本唱腔,又有发展创新。她先后创造了新板女腔“新的传十字”、“花腔抢七字”、“倒板”、“轻板”、“顶板”(即半板)、“紧打慢唱”、“抒情慢板”等,被观众通称为“花褂腔”,被新老淮海戏女演员广泛应用,同时发展革新了淮海戏的舞手绢要扇子,运用眼神等基本功,起到关键性的承传作用。朱桂洲和杨云发在生活上互敬互爱,互相关心、照顾,在戏剧事业上也是互相支持,互学互助,凡是朱桂洲演出剧目,其中丑角大都是杨云发扮演,配合默契,推陈出新。在共演的剧目中杨云发先后扮演了《三拜堂》的史荣,《四告》的皮盾,《柜中像》中的刘春等数十个丑角,塑造了淮海戏丑角行中的“大一丑”、“小要丑”、“奶丑”等各种丑角的艺术形象,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笑星。

杨云发是淮海戏承传事业中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才,除了钻研表演艺术,还钻研编导剧务等工作,因此对淮海戏行当和剧目都非常熟悉。由于淮海戏的源头是来自秦腔,秦腔音调激昂高亢,唱词多七字句,五字句,音乐是板腔体,以梆子击节,其传统剧目达2700多个。因此沿陇海路的地方剧团都是板腔体,用梆子和筒板击节,初期都是用当地乐器伴奏,如:胡琴、柳琴、三弦等地方民乐,后来发展到管乐伴奏,各地方剧种的传统节目都超不出秦腔的传统剧目,受其影响,很多地方的传统剧目大同小异。淮海戏的传统节目经整理,大戏有60多个,小戏30多个,共一百多个传统节目。杨云发从其中《大熬山》的传统节目中,挑出地主田半城的管家张福来到吴南庄催租





途中。企图调戏佃户双姐而被双姐戏弄的故事情节,结合农村的生活,创作了一出小戏《催租》。朱桂洲在戏中扮演双姐,杨云发扮演张福来,自编自导自演,使这对鸳鸯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了花旦、丑角的技艺特长,双双戏水于淮海戏的舞台上,不但使广大农村城镇观众眼花缭乱,百看不厌,也使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观众鼓掌称赞,轰动了整个文艺界。上海越剧院、沪剧院、南京扬剧院、东北的吉剧院都邀他们去讲学教戏。在华东和江苏省戏曲会演时,朱桂洲荣获一等奖,杨云发荣获二等奖,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南京的《新华日报》、《雨花》等报刊都发表了评价《催租》的文章。著名的京剧艺术家荀慧生,越剧艺术家筱文艳,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盛赞淮海戏的《催租》,并曾为刘少奇、罗瑞卿、杨得志、肖克、陶勇和著名戏剧家田汉等进行演出,受到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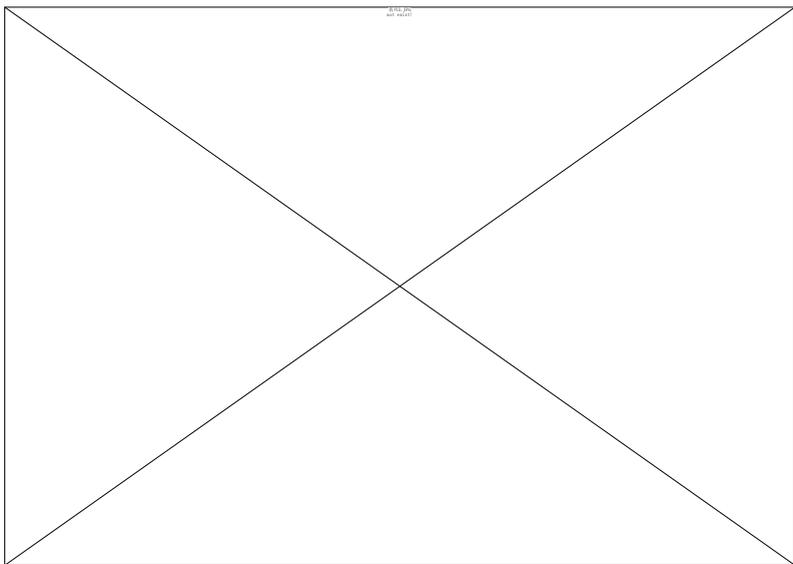
一出《催租》的演出,使名旦、名丑出了名,淮海戏升了华,是淮海戏发展史中一座辉煌的里程碑。他们的事业有成,个人成名,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坎坷。朱桂洲 13 岁开始演戏,成了全家的“摇钱树”,奔波四五年略有节余,就砌了三间栖身草房。刚住几天,一场龙卷风把三间房掀了个干净,从此一家又住进破庙,生活十分艰苦。有一次朱桂洲和父亲从涟水根据地回家探亲,被汉奸团长杀人魔王周发乾知道了,把他们父女抓去,说他们为八路唱戏,把他们拖去活埋,已经推进坑里正在填土,被群众中一位和周发乾有私交的人说情才得以获救。又有一次,到解放区演出,晚上开演不久,敌人扫荡来了。演员们来不及卸装都跳河逃跑,朱桂洲也和男人一样跳入河中潜入水底,机枪在河面上扫射出了一片水花,才逃过一死。事后有人问她怕不怕,朱桂洲风趣地说:“我为将来演水下游击队,体验生活呢!”有一次在云台山山东庄演唱《小磨坊》时,杨云发扮演毛驴,学着驴在转圈推磨,朱桂洲扮演赶驴的女主人,一鞭一鞭打得驴儿飞转,引得哄堂大笑,掌声不断,引来了驻地一个日本小队队长带着翻译来看。由于事先没有把他们接待好,当鬼子小队队长问:“这什么的干活?”翻译使坏说:“这是把皇军比作驴儿推磨的干活”,鬼子队长大怒,冲进场子用皮带劈打,朱桂洲夫妇被群众掩护从山涧逃了出去,但伴奏的老父亲被鬼子抓去了,吊打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卖了手推车,凑了十几块银元才把老父亲放回来。

朱桂洲夫妇和连云港地区有着不解之缘。解放前后,墟沟、云台、新浦地区就是他们演出的根据地,解放初期他们就在墟沟扎了根,把涟水县政府供给他们的粮草关系都迁到墟沟镇并在墟沟青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墟沟镇政府拨给他们经费添置布景道具,成了公家领导的文艺团体,固定演出场地在墟沟西街名叫观音堂的广场。每场演出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风雨无阻。因此朱桂洲分娩那天,老观众孙奶奶很疼爱她,特地做了鸡汤泡撒子送到后台,给“小花褂”补养,还认她做了干女儿。“小花

褂”的孩子的衣服都是女观众做好送给她的,她和墟沟观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墟沟便成了她的第二故乡,也是她艺术升华的沃土。1950 年春天她经常到连云港青年公寓演出,对门就是京剧大戏院,小戏和大戏唱对台戏,小戏场满满而大戏场观众不多。朱桂洲并不自满,虚心向京剧名旦学习唱腔和表演程式,使小戏大戏化,更上一层楼,登上了雅俗共赏的大舞台。期间,因为国民党黄安舰在连云港起义,敌军经常派飞机轰炸连云港,有一次朱桂洲正在演出,敌机飞来了,“小花褂”穿着戏衣跑出剧场,一颗炸弹就在她不远处落下,一位前来看戏的新四军战士急忙用军大衣把“小花褂”按倒在路旁,才免一场死伤。

文革期间,朱桂洲和扬云发受到了错误批判。前不久还是有功的红人一夜之间变成了黑线人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剧团大院和家属宿舍,造反派开始揪斗他们,挂牌游街示众,在街头站板凳,开批斗大会,叫他们认罪。种种折磨朱桂洲都置之一笑,而杨云发却认起真来,无罪也吓得畏罪自杀,曾服药、触电、悬树三次轻生,都被朱桂洲及时发觉解救下来。朱桂洲确认自己所做的都在立功而不是犯罪。在一次批斗会上,她拖了把椅子坐下,造反派大怒:“你敢坐?”朱说:“你们能坐,我也能坐。”她一度培养起来的一名主演,当了造反派的头头,也在会上批斗朱老师是黑线人物,朱桂洲反驳说:“你说我黑,你是我教出的徒弟,出于黑而胜于黑的人物,比我还黑!”说得造反派面面相视,哑口无言。

1980 年后,江苏省和淮阴地区都加强对淮海戏的研究和推广,并成立了省淮海戏研究会,杨云发和朱桂洲都成了研究会的会员。目前名丑杨云发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艺术生命永存,市淮海剧团名丑王同富,名旦常宗华就是他们的《催租》传人。“小花褂”虽然成了“老花褂”,但她仍然为培养淮海戏的传人贡献余热,还拜连云港市画牡丹的名人李学珍为师,学会画牡丹,画了不少牡丹画,作为礼品送人,晚年生活充实、愉快。



淮海戏研究会成员大会合影





港城历史名人(十一)

※ 本刊编辑部

杨天全

杨天全,原名杨汝豹,新浦区南城镇人。小学毕业后,到新浦三五印书馆当学徒,后考入灌云乡村师范(校址在板浦),毕业后留校工作。卢沟桥事变后,他去武汉参加“抗日青年同盟”,后考入复旦大学会计系学习,1942年毕业,到国民政府主计处工作,后任预算专员。

1944年,杨天全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算局工作。同时,考入纽约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算局先后任预算处处长、副局长、局长。

杨天全在海外工作几十年,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他立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参加联合国工作,多次回国访问。1973年,杨天全曾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来华访问,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1985年退休后定居上海,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6月24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83岁。杨天全为促进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年,杨天全用10万美金作基金,用每年利息4万元人民币作为捐资奖励连云港市南城镇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成绩突出的老师,十余年来,累计捐资50余万元。

谷牧

谷牧,原名刘曼生,山东荣成人,1931年加入共青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东北军第一二师工作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统战部长、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新海连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等职。建国后,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8年谷牧在东北军第一二师任中共工委书记期间,曾在本市新浦陇海公寓办公(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原址)。1948年11月新海连地区解放,谷牧任新海连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任中共新海连特区委员会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对接管新海连地区,建立民主政权,恢复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谷牧到中央工作后,仍然关心连云港的建设,多次来连云港视察、指导工作。1973年2月,周恩来总理发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后,时任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建港领导小组组长的谷牧视察连云港的港口、岸线,听取建港汇报,并就港口建设规模、条件、战略意义和今后任务作了指示。1985年6月,谷牧在江苏省省长顾秀莲陪同下视察了连云港。1988年11月、1996年10月他又两次视察连云港,对连云港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谷牧在连云港市留下了不少墨迹,花果山风景区刻有谷牧题词“花果神山,旅游胜地。”

汪德钟

汪德钟,籍贯灌云县板浦镇。沙龙电影(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20世纪30年代,他与吴印咸、郎静山、陈传霖共同活跃在上海影业界。1949年,他辗转到香港后,被香港足球总会聘为摄影师。1957年间,他在香港首家商业电视台做《丽的呼声》特约节目制作人。不久,被香港新闻处任命为特约片负责人,还是海外电影公司在香港首家制作代理人。他拍摄的电影有《苏丝黄的世界》,代表作有《八十日环游世界》、《华贵洋行》、《李小龙传》、《第一滴血》、《杀戮战场》以及《大将军》、《爱船》、《蝴蝶夫人》、《告别国卫》等。他涉足于美国的世纪霍士公司、雅朗制作公司、哥伦比亚派护蒙、环球、华纳兄弟、美高梅等蜚声国际的电影公司及CBS、ABC、VBC电视台。同欧洲、日本等国家、地区影视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制片关系,成为名气很大的华人制片商,香港影业界尊称其“汪伯”。

他热衷于祖国的电影事业,早在1984年就和一些专家访问大陆,并无偿提供了最新型、最先进的拍摄器材和高质量的拍摄镜头,还把世界影视设备和信息不断地介绍到国内。1990年7月,在沙龙电影公司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资成立北京技术服务公司的过程中,他做了许多工作,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玖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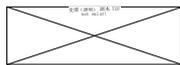
王玖兴(1916-2003),赣榆县海头镇人。1936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心理学系。1937年,转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学习。

1944年秋,王玖兴报考国立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任该校哲学系哲学史课教员。1940年春,王玖兴赴瑞士夫赖堡大学留学,进修哲学和心理学。1955年夏,取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就任夫赖堡大学讲师,讲授中国哲学。

1957年6月,王玖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工作。1976年,王玖兴任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研究室副主任。翌年,他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副主任,当选为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理事。并先后出席在南斯拉夫、美国、德国召开的国际康德哲学协会国际会和国际黑格尔联合会国际大会。当选为“国际辩证哲学协会”理事会理事,荣任第七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名誉主席。

王玖兴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西方哲学史副主编,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理事、顾问,上海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博士研究生导师,《德国哲学》杂志编委、《黑格尔全集》副主编、《康德哲学》(六卷本)主编。

王玖兴先后在中外刊物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出版名著《杜拉迈书目测验研究》(德文版);出版10多本译著,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与贺麟合译)、费希特《全部知识学基础》、卢卡奇《理性的毁灭》,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等。





李东主任在灌南调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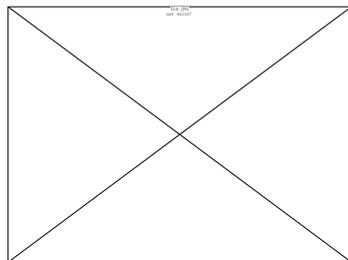
※王正中 李锦华

日前,市委党史工办主任李东、副主任董忠一行四人,到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调研灌南县史志工作。在听取了灌南县委党史办主任于洪景同志的工作汇报后,李东主任就搞好灌南的党史、地方志征编工作,提出了五点意见。在充分肯定灌南县委党史办在续修县志、强化基础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注重党史宣传等方面所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做好党史二卷的征编启动,要时间服从质量,充分发挥老同志多、经验丰富的优势,使灌南的史志编修工作再上一层楼。

在灌南期间,李东主任等还参观了灌南人民革命纪念馆,对灌南县在短时间内建成如此规格的纪念馆表示赞赏。

(灌南县委党史办王正中 李锦华)



市委党史工办获“知港城、爱港城、建港城”知识竞赛一等奖

在9月中旬举办的“知港城、爱港城、建港城”网上知识竞赛中,市委党史工办代表队精心准备,在参赛队员的共同努力下,该办在众多参赛队伍中力拔头筹,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此次活动是市级机关首届文化节的内容之一,目的是为了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进一步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进一步加深对省市党代会和市委王建华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理解,激发机关干部学习热情,提高机关干部素质,统一机关干部思想。

市委党史工办一直十分注重机关干部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着力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倾心打造专家型史志队伍,专门安排每周五下午作为全办的学习时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新一轮修志工作的扎实推进和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连史宣)

《东海年鉴(2007)》出版发行

由东海县人民政府主办,东海县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编纂的地方综合性年鉴《东海年鉴(2007)》于9月初出版发行。全书计7.3万余字,在我市率先采用轻型环保纸印刷,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2006年东海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全面反映东海地方特色,为社会各界了解东海、研究东海、发展东海,提供丰富、准确、实用的地情资料,为东海县各级领导进行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也为地方史志保存真实的历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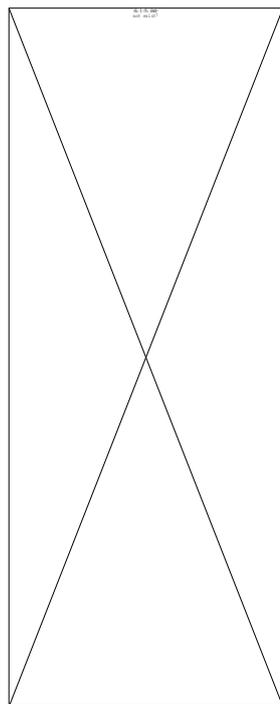
(东海县地志办王文岩)

张士杰书法作品入选市级机关首届文化节摄影书画展

在日前举办的市级机关首届文化节摄影书画展中,我办退休干部张士杰的书法作品从近千幅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参展。

张老今年已74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他自幼喜好书法,多年来一直坚持练习,并把书法当作修身养性的必修课。退休后,每逢春节,张老还为全办职工免费提供他亲手书写的春联,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

(连史宣)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诞生

1958年5月1日，矗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从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工程被载入史册，并成为了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主要象征。

每当人们漫步于天安门广场，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拔地而起的身影的时候，一定都想知道当初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些日日夜夜——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

任由国际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同志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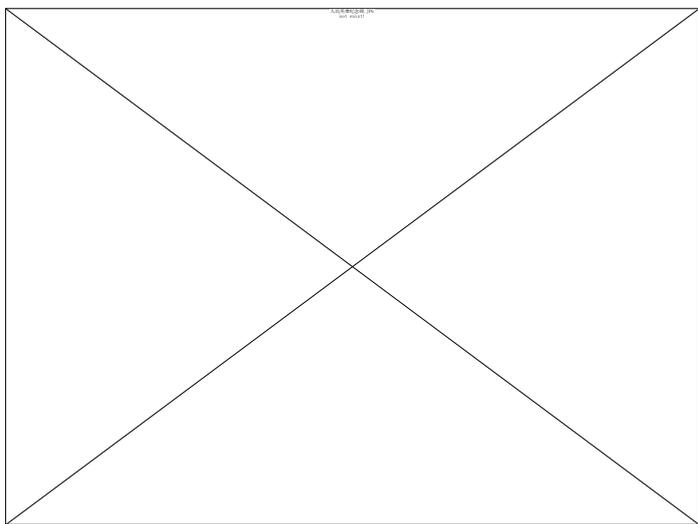
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1953年3月首都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设计方案中精选出8种，向专业设计人员广泛征求意见。这8种设计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设计，高而分散的典型设计，做成三座门的设计，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设计，有瞭望台了的设计，红墙上立碑的设计，碑顶立群像的设计和最后被采用的碑形设计。

在众多的设计方案构思中，设计意见有较大的差别。当时分歧较大的意见有：1、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2、下层台阶要不要作成检阅台。3、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顶部开窗，可供瞭望北京市容。4、意见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顶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宝顶歇山式，还是塑造英雄的群雕。因为这些意见不统一，使得工程难以启动。最后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初步协商，决定：1、台基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2、因为已有天安门作为大检阅台，下层平台决定不作检阅台设计。3、为维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顶不开瞭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肃穆。空筒碑身也使得碑体重量大大减轻，连地下的混凝土在内，总重量只有一万吨左右。（由于设计合理，当时虽然没有考虑抗震因素，但纪念碑却经受了大地震的考验。）4、最难确定的碑顶暂缓设计，选意见最为集中的设计方案中的三个制成1:5的模型，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就在底层按陈列室设计全部钢筋混凝土即将完成时，台基做成实体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他

们提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做成实体碑身显得庄重稳妥，如下设陈列室，碑身则有架空不稳之感，这对于一座烈士纪念碑是不合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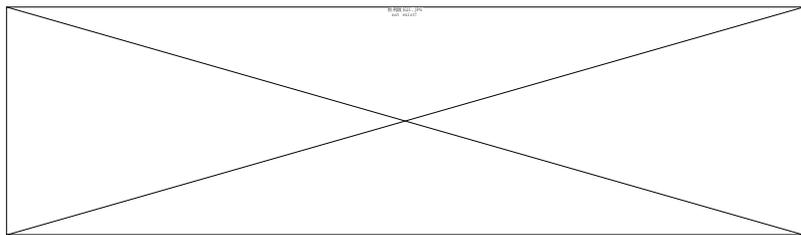
关于纪念碑建在何处，也经过广泛的讨论。开始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就中华门的原址建立，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将纪念碑设立在全国人民政治活动中心——天



安门广场。该委员会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到1951年，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止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程处。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担任，副主





胜利渡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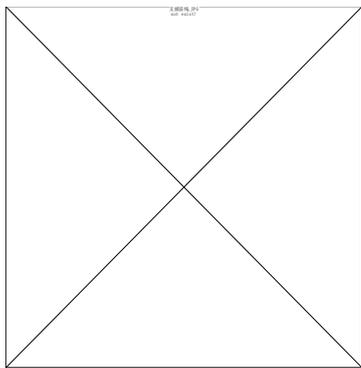
天安门广场。

纪念碑的位置在天安门南约 463 米，正阳门北约 440 米的南北中轴线上。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纪念碑总高 37.94 米，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 50.44 米，南北长 61.54 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浮雕高 2 米，总长 4.68 米，雕刻着 170 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

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毛泽东手书批示。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主席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毛泽东主席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毛泽东主席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于 1955 年 6 月 9 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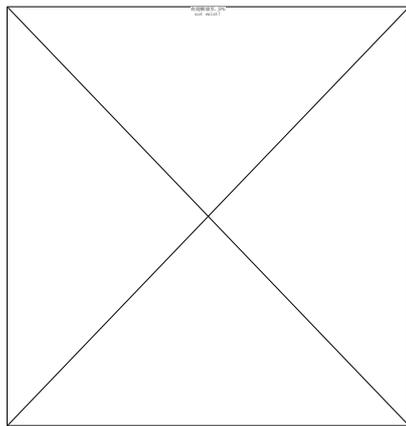
支援前线

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周恩来总理书写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

1952 年 8 月 1 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岗石，重达百吨，采自青岛浮山大金顶一带。采运工作历时七个半月，于 1953 年 4 月 1 日动工至 10 月 16 日大石料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7116 名工人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开采用打槽办法，运输用滚木及推土机牵引滚移。

1953 年 7 月开采出大石料荒料尺寸：长 15.3 米，宽 3.55 米，厚 2.1 米，重 300 吨。经过第一次加工，将石料上面做平，重量减为 280 吨。10 日大石料由开采地运至山场（半山腰平坦处）行走 60 米。次日下午石料放下山。经转向、翻身，第二次加工后，石料长 14.7 米，宽 2.92 米，中间厚 1.0 米，两边厚 0.8



欢迎解放军

米，重量为 102 吨。

8 月 19 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 4 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行程 15 公里，9 月 27 日安全到达车站（空军油库）。9 月 28 日，在青岛车站，采用铁道滑动方式，将大石料装上东北电业管理局丰满发电厂 90 吨车皮。根据铁道部规定，该车载重为 100 吨，因此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中间厚度改为 87 厘米，两端厚度改为 79 厘米，重量为 94 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 100 吨。以直线 20 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 10 公里/小时的行车速度开向北京，10 月 13 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站，一路平安。三个夜晚之后，碑心石奇迹般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工地。

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碑题、碑文共用黄金 130 余两。整个纪念碑用 1.7 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

（转自福建东南新闻网）

